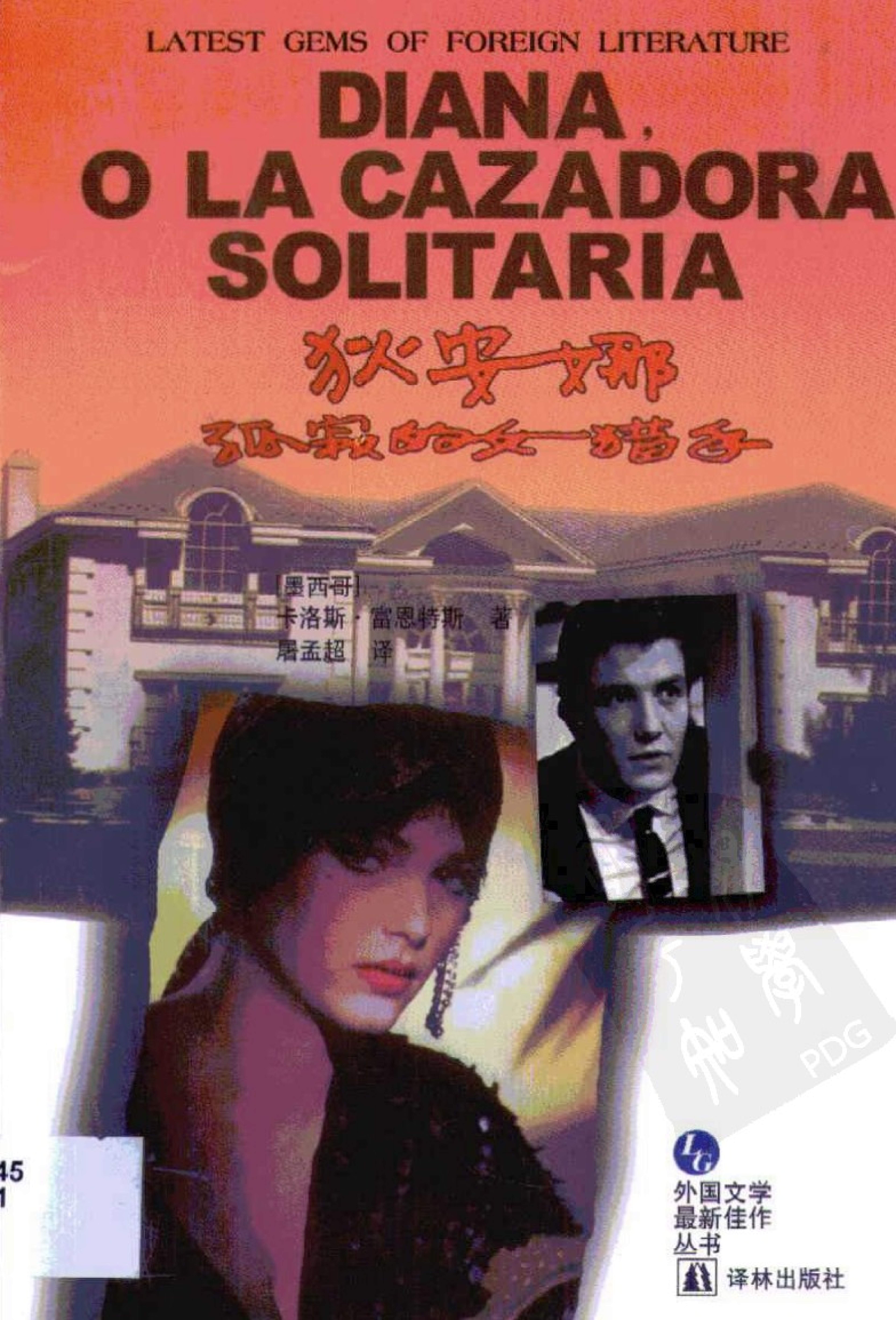

LATEST GEMS OF FOREIGN LITERATURE
DIANA, O LA CAZADORA SOLITARIA
狄安娜
孤寂的女猎手
[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屠孟超 译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译林出版社

DIANA, O LA CAZADORA SOLITARIA

LATEST GEMS OF FOREIGN LITERATURE

Carlos Fuentes



ISBN 7-80567-918-5
I·552 定价：10.00元

LATEST GEMS OF FOREIGN LITERATURE

DIANA O LA CAZADORA SOLITARIA

狄安娜

孤寂的女猎手

[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屠孟超 译





外国文学
最新佳作
丛书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墨西哥)富恩特斯(Fuentes,C.)著;屠孟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2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Diana, o la cazadora solitaria
ISBN 7—80567—918—5

Ⅰ.狄… Ⅱ.①富… ②屠… Ⅲ.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Ⅳ.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691 号

登记号 图字:10—98—78 号

书　　名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
作　　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　　者　屠孟超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LFAGUARA, S. A. Madrid, 199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印刷厂(地址:南京市孝陵卫)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2
字　　数　155 千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18—5/I·552
定　　价　1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卡洛斯·富恩特斯于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墨西哥一个外交官的家庭里，从小跟随父母去过许多国家。由于从小接受的是良好的教育，他对西方古代和现代文明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拉丁美洲的落后的原因也有较深刻的探究。看到欧美高科技的发展与拉美的落后的差距，他对自己的祖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当他成了作家以后，总是力图用自己的作品来抨击墨西哥社会的弊端，发掘并弘扬墨西哥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墨西哥民族的根。

富恩特斯一九五四年以短篇小说集《假面具的日子》初露锋芒。一九五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使他声名雀起。这部展现出墨西哥城各种不同生活的小说以批判的眼光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墨西哥革命中隐含的弊端。最能代表富恩特斯早期创作的是发表于一九六二年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这部小说以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克鲁斯的回忆，以及第二人称叙述者的讲述，将一九一〇年墨西哥革命后新的权贵的一生和他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出来。

在八九十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多部小说。一九八七年，他发表长篇小说《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这部作品通过一位未出生便有惊人记忆力、会说话的主人公的生活，讥讽了由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合并成“墨西哥美国”这一荒诞的构想。一九八八年发表的《老美国佬》是部雅俗共赏的佳作。这部小

说以美国一位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在墨西哥革命时期去墨西哥的经历，描写了他与一位可以当他的女儿的纽约女子之间的恋情，以及这位女子与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可以当她儿子的年轻的革命将领之间的罗曼史。小说描写了三个人在感情上、性上的纠葛，反映了墨西哥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剖析了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报复心理。这部小说于一九八八年由阿根廷导演路易斯·普恩索拍成电影，受到普遍好评。一九九〇年他又发表长篇小说《战役》。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十九世纪一位法律大学生把卢梭视为他的精神英雄，与同样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却更加冷静的朋友一起，想把理想变为现实，参加秘鲁革命军的故事。一九九〇年十月，富恩特斯发表了含有四个短篇(《康斯坦西娅》、《不幸的女人》、《拉斯洛马斯的囚犯和我的名誉》与《理智的人们》)的小说集《康斯坦西娅和其他几篇处女小说》。一九九二年发表《被埋葬的镜子》。一九九三年发表短篇小说集《橘橙树》，这部作品由五个故事(《两岸》、《征服者的孩子们》、《两个努曼西亚》、《阿波罗和妓女们》、《两个美洲》)组成。橘橙树不仅是联系五个独立成篇的故事的纽带，而且也是整部作品所表达的深意的象征。作者讲述的是与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有关的故事，力图用产地为地中海地区的橘橙树揭示墨西哥的混血文化。小说的文字优美，寓意丰富，酷似行文流畅的散文。

一九九四年他发表的这部新作《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是一次十分大胆的文学创作尝试。作者将自己隐秘的情感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让生活的一部分经受文学的检验。在小说中，作者有叙述有议论，似散文似小说，按照谈论“后现代”的人所提出的标准，这部作品可算作是“后现代”的了。然而，在拉美文坛人们却一直不同意这种划分。

狄安娜·索伦是美国女演员琼·塞贝格的化名，富恩特斯在六十年代曾与她有过激情似蜜似暴风骤雨的浪漫经历。

在小说中，叙述者首先借用了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堂璜”的形象，自嘲自喻为现代的堂璜。他追求激情，

追求情感上的刺激,并不顾道德的约束,把“爱情”放在一切之上,这就是作者在描述他与狄安娜的浪漫史中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作者将自己的性爱“厚颜无耻”地剖露在读者面前所必须经受的考验。作者与狄安娜的性爱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月,但作者对于爱情、性爱的态度,以及他对他与狄安娜在性爱生活中的存在于人的生理心理上的,而常常又不为人意识到的同性恋成分也作了描述。作者的大胆并不仅限于感官的刺激,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要用文学为性爱进行辩护,用性爱为文学进行辩护,”他还说,“文学才是我真正的情人,其余的一切,诸如性爱、政治、宗教(如果我信教的话)、死亡(当它来临时)都只是文学的一种体验。”此外,在叙述过程中,对狄安娜清晨打神秘电话的描述,不仅是作者暗铺悬念,给狄安娜这一人物增添些许神秘色彩,而且也巧妙地将狄安娜的内心世界剖露出来。

这部作品不仅是有关情爱与理想主义的自传体小说,而且是一部文字隽美的散文。它抒发了作者对时政、对人生的看法。在边叙边议的过程中,作者不仅以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和一九六八年墨西哥政府对学生进行的大屠杀为背景,鞭笞了当时美国当权者自我标榜的“无辜”,而且还通过对狄安娜这位孤独美貌的强女子在生与死等问题上的心态的剖析,力图更广泛地展现那个时代人们的理想与情操,他还试图从狄安娜之死探索死亡在人们生活中深层次的含义。

在作品中,作者还论及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谈到他六七十年代发表的几部小说时,颇有感触地写道:“这几本书的社会性的题材如果没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形式上的革新是不会有真正的价值的。我认为,用来表达思想的方式方法和所表达的思想一样重要,或者说更加重要。”用他的这段话来看六十年代以来的拉美小说,以及由此产生的拉美文坛的经久不衰硕果累累的繁荣景观,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启迪。而从他对文学与现实发表的独到的见解“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但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头脑的筛选,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主观给

无声的具有一致性的客观世界以现实性。对我来说,现实是一颗有三只角的星星:物质、精神和文化。物质现实、主观现实和我个人与世界相接触的现实"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现实进行的思索。可以说,富恩特斯不仅是位才华出众的作家,也是一位颇有见地的文艺理论家。这种对文学创作进行的深层次的反思,正是富恩特斯以及许多拉美作家的共同特点。

在作品中,他不仅对文学进行评述,而且还对人生发表独特的看法。他借前妻之口,抒发了他对普通人生活的向往:"做一个有人情味的普通人比成为一个光荣的作家更有意义。不过,有时做一个通情达理的普通人比在文学方面出名更不容易。"

这本小说是作者准备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他计划写的第二部小说题为《阿喀琉斯,游击队员》,讲的是哥伦比亚十九运动游击队的事情。第三部名为《普罗米修斯,自由的代价》,这将是作者对自己在智利度过的童年生活的回忆。通过寻找在皮诺切特独裁时期失踪的童年伙伴,表达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看法。

富恩特斯不仅积极进行小说阶作,而且还写评论文章。他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散文集《勇敢的新大陆》中,对西班牙美洲文化,即印第安古文化、非洲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交融进行了反思,并对拉美当代主要作家,如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莱塞玛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散文集《小说的地域》中作者进一步评述了博尔赫斯、罗亚·巴斯托斯和胡安·戈伊蒂索洛等西班牙语作家的作品。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他为哥伦比亚的《时间日报》的周日专栏撰稿,同时他还为美、英、法、意、德、西、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一些报刊撰稿。

近十年来,富恩特斯在文坛获得更多的荣誉:一九八八年获得尼加拉瓜总统授予的鲁文·达里奥文化独立勋章;一九九二年获西班牙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一九九三年获智利优

质勋章与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颁发的奖章；一九九四年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陈凯先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京大学

一

想过上幸福的日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上帝让我们生活在泪水的河谷中。不过,归根到底,这种苦日子终究是有尽头的。永生意味着永远的幸福。我们以叛逆、不满的态度回答上帝。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难道不能占有永恒的一席之地? 上帝的花招比拉斯维加斯[1] 赌场老板的花招还厉害。他答应给我们永久的幸福和在尘世间的哀哭。我们确信,认识生活,让日子过得好一些,是对上帝的泪谷最高的挑战。如果我们在挑战中取得胜利,上帝会对我们进行报复,他不让我们在他身边永生,让我们永远处于痛苦中。我们敢于和上帝讲理。我们自言自语地说:上帝不应该是人类贫困、痛苦、残酷和野蛮的制造者。不管怎么说吧,一个好的上帝是不会制造这一切的。制造这一切的只能是坏上帝、假上帝,带着假面具的上帝。对于这样的上帝,我们只能用他自己创造的罪恶的武器(性、犯罪,尤其是对坏事的想像)去战胜他。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坏上帝赐给我们的礼品吗? 所以,我们确信,只有杀了那个篡位的上帝,我们的身躯才会洁净,头脑才会得到解放,我们才能见到第一个上帝,即好上帝的脸。可是,那个"赌场老板"袖子里还有一张王牌。我们身心都十分疲惫地来到上帝身边时,上帝却向我们显示,他原来只是虚无。我们从上

① 美国一赌城名。

帝这里只能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上帝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连圣徒、神秘主义作家和教堂的神父也说不清楚。连上帝自己也不明白。他如果明白了，就会倒地死去。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 是最接近、了解上帝的人。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上帝是'无'，最高形式的'无'；要想到达上帝那里，必须先到摸不着、见不到，也无法用常人的方法进行理解的'无'那里。"圣胡安还说了下面一段令我们气馁的、骇人听闻的话："创造物的全部含义和上帝的无限意义相比，就毫无意义……创造物的全部美和上帝的无限美相比，就奇丑无比。"法国的圣徒和犬儒主义者帕斯卡尔[2] 也许是打赌拯救我们的良知和贪欲的唯一的人：如果你打赌说上帝是存在的，而上帝并不存在，你什么也不会输掉；可是，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你就会赢得一切。

我的看法介于圣胡安和帕斯卡尔之间。我给上帝以名义上的，即名称上的价值：上帝是将出生和命运一下子统一起来的速记上用的符号。将出生和归宿协调一致起来，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努力争取的目标。如果只选择出生，就会变成一种怀旧。这种怀旧开始是抒情诗式的，后来就变成专制式了。如果只注重归宿，就会陷入宿命论。出生和归宿不应该分开：回忆、愿望，此时此刻的过去，刚刚过去的将来……我就想将狄安娜·索伦这个被神灵邪恶地触摸过的女人安置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帕斯卡尔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之间，我想给她创造一个虚幻的语言世界，在天地之间伸出一只手，提出行乞般的问题：我们能在凡间相爱，而又能在天上待上一天吗？我们不做苦行者，不做自我鞭笞的赎罪人，也不做饥肠辘辘的深山隐士，我们要充分地参与生活，获得并享受人间的成果，却又不会因此而牺牲永生，也不须由于"not wisely but too

---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诗人。

②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作家。

well"[1] 相爱而请求原谅,这样行吗? 以仁慈反对《旧约全书》的残酷无情的审判的基督教神话没有世俗神话那种含糊不清的美。基督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要求信仰的行为,而信仰,特尔杜里亚诺[2] 说,是荒谬的。"它是事实,因为是不可信的。"不过,荒谬并不是含糊不清。玛利亚是处女,尽管她怀了孕;基督虽然死去,但又复活了。可是,偷盗圣火的普罗米修斯又是谁呢? 他为什么仅仅为了失去自由而利用自由呢? 他如果不利用自由,不失去它(尽管也不会赢得它),不就有更大的自由了吗? 自由难道不可以利用自由之外的别的价值赢得吗? 在人间,难道只有牺牲了爱情,只有失去了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疏忽所希冀的存在,我们才能相爱吗?

"一点点"难道比一切或一无所有要更可取吗? 讲完我下面将要讲的这段艳史时,我这样问自己。她给了我一切,也从我这里夺去一切。我请求她给予我比一切或一无所有都好的那"一点点"。我请求她给我那"一点点"。只有这"一点点"可以是我们非常幸福或自以为非常幸福的短暂时刻。我曾经有多少次对自己说:我将来能永远像现在这样吗? 我回忆、写作,为的是重现她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她将永远如此)的那一时刻。然而,爱情或文学的全部奇妙之处,以及回忆或愿望很快就被我们周围像一阵干火和燃烧着的洪水一样的浪潮卷走。我们只要离开我们的躯壳一分钟就会明白,万能的主的心脏在我们周围搏动。万能的主走在我们前面,不管我能活多久,不管她能活多久,主是永生的。

我恋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对储藏在那里但没有显露出来的巨大物质的短暂的胜利……我明白,这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相反,我个人的气质和特点(此时此刻和一生中其余时光不相一致的要做一点事情的气质和特点)却使我成为不

[1] 英文:不明智,但很恰当地。

[2] 一译德尔图良,公元二世纪迦太基基督教辩护士。

可战胜的人。想像和言词告诉我,为了让想像说话,让言词进行想像,小说不应该怎么写就怎么读。这样做在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中就更为不妙。作家应该不断地变更写作技巧和距离,就已经选定的主题保持形式上和风格上的多样性,让读者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当狄安娜·索伦这个电影女演员作为主人公时,这方面的要求就变得更严格了。

听人说,为了让布特·兰卡斯特在拍摄《豹猫》时,露出又惊又喜的眼神,卢基诺·维斯贡地[1] 将一只人们以为里面全是黄金的袋子塞满了丝袜。狄安娜是这样的人:由于她皮肤无比的光洁,人人见了都会感到吃惊,尤其她自己,发现如此受到人们的爱恋,深感惊异。难道她不喜爱自己,不赞赏自己,却想成为另一个女人吗?难道她不喜欢寄寓在自己的躯壳里吗?为什么会这样?

我和她只同居了两个月。我真想跑过去再次拥抱她,最后一次感受她的柔情,并向她保证,她会得到深情相爱,她寻求的爱情不会将她排斥在外……可是,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将情人抛开,回到一个已经不熟悉的女人身边。造型表演中的性爱就在于对肉体的向往。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事物一样,造型性爱的方式正在加速。许多世纪以来,一枚纪念章、一幅画就填补了情人不在身边的空缺。照片则更加速了对情人的思念。而只有电影的形象既促进了我们对她的思念,又使我们感到她就在自己身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就是她的形象。

她的形象、声音、举止、美貌和青春都是不朽的。爱神的教母死神,由于和已经撕毁了"你我至死永不分离"这一情感上的伟大协定,而不在我们身边的情人重聚而被战胜了,同时,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电影只给我们提供人的真实形象,她的情况也是这样。

---

① 卢基诺·维斯贡地(1906—1976),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

虽说克雷塔·嘉宝扮演了克里斯蒂娜女王，她还是克雷塔·嘉宝；玛尔莱娜·狄特里希扮演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却还是玛尔莱娜·狄特里希；玛利亚·费利克斯呢？尽管扮演了修女阿尔弗雷斯，都还是玛利亚·费利克斯。相反，文学解放了我们对形象的想像。在托马斯·曼[①]的小说里，阿申巴赫在威尼斯死去，在我们的想像中，这个书中人的脸谱可能有千百种；可是，在维斯贡地的电影[②]中，阿申巴赫这个人物就只有一张固定不变的脸——电影演员迪尔克·波卡德的脸。

狄安娜，狄安娜·索伦。她的名字唤起这遥远的模糊记忆。夜间的女神，不断地变换着形态的月亮：今天是满月，明天就是月亏，后天变成天上银色的指甲盖，几个星期后，还会发生月蚀……女猎手[③]狄安娜，宙斯的女儿，阿波罗的孪生姐妹；她是后面跟随着一大批仙女作为侍女的处女；但在以弗所[④]的庙堂里，她却变成一个有一千只乳房的母亲。善于奔跑的狄安娜，她只倾心于比她跑得更快的男人。狄安娜/夏娃在其永久的逃跑中，只在受到三个跌下来的苹果的引诱时才停了下来。在十字路口的狄安娜因此被称为特里维娅[⑤]。在"时代广场"、"比卡迪利"和"香榭丽舍"十字路口受到崇拜的狄安娜……

归根到底，文学创作这场游戏还是失败了。首先这和时间有关。小说中的事发生在一九七〇年，六十年代受到血的摧残，同时又受到血的鼓舞的种种幻想在那时并没有消失。那是对我们这个如此短暂、如此虚幻、如此令人厌恶的世纪之末社会的第一次叛逆。六十年代杀死了它自己的英雄人物。

---

① 当代小说家，美籍德国人。

② 指维斯贡地导演的《威尼斯之死》。

③ 根据希腊神话，阿芙洛狄特（罗马人称为狄安娜）系主神宙斯之女。宙斯允许她永不出嫁，并封为森林和狩猎女神。

④ 古代小亚细亚一城市。

⑤ Trivia，拉丁文意为三岔路口。

在群魔乱舞中，美国吞食了自己的儿子：马丁·路德·金[1]、肯尼迪兄弟[2]、吉米·亨德里克斯、贾尼斯·乔普林和马尔科姆·埃克斯[3]，并使自己残忍的后爹尼克松和里根上了台。我和狄安娜玩瑞普·范·温克尔[4]游戏：如果那个老人睡了一百年后醒来，发现一九七〇年的美国一只脚踏上了月球，另一只脚踩在越南的丛林中，那他会说些什么呢？可怜的狄安娜，她不会再醒来，不会看到国家在里根和布什执政的十二年时间里平庸无奇、丧魂落魄的情景；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将暴力推向越南和尼加拉瓜，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市郊的街道上犯下罪行的景象；不会看到小学校被窒息在毒品中，中学成了行凶杀人的场所；不会看到孩子仅仅因为偶尔探身窗外，而遭到杀害，而这样的事每天都有；不会看到在餐厅里用餐的人，汉堡包正含在口中，便饮弹身亡的情况；不会看到逍遥法外的成群的杀人凶手和盗贼；不会看到为了获得权力和荣誉而进行的诈骗、行凶等腐败行为。难道这不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吗？如果狄安娜见到了尼加拉瓜的儿童们受美国武器的伤害，断胳膊缺腿；见到了黑人被洛杉矶警察拳打脚踢，身受重伤；见到了大批自诩为自由解放的英雄，却阴谋反对伊朗的骗子们，她会说些什么呢？这个孤寂的女猎手又会有什么想法呢？她失去了亲生儿子，对一个自认为要严惩杀害儿童的罪犯的国家，她会说些什么呢？她会说，六十年代为了惩罚有色人种，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自己也退去了颜色，变成了白色。此书写于一九九三年。在本世纪结束前，熊熊烈火的洞穴、枯干的河流和泥泞

---

① 美国神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获一九六六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遭杀害。

② 这里指约翰·肯尼迪(1917—1963)和他的兄长罗伯特·肯尼迪。前者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一九六三年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后者曾任美国的司法部长，一九六八年在竞选总统期间，遭到了与他弟弟约翰·肯尼迪同样悲惨的命运。

③ 六十年代美国黑人运动领袖。

④ 瑞普·范·温克尔系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温克尔的妻子异常凶狠，他被迫离家栖居山上。一天，沉沉入睡，醒后发现已过去二十年，世界发生巨变。

的市郊都会充斥各种肤色的墨西哥、非洲、苏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和犹太的移民……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这个被时代的激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故事自行失败了,因为它永远达不到能想像得到的理想的完美无缺。其实,连想也不要那样想,因为语言和现实一旦统一起来,世界就完结了。宇宙是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因为它是不完美的。文学是个伤口,在这个伤口里,语词和事物必然会分离。我们的血液都会从这个洞口淌走。

就像开始时一样,最后我又成了孤身一人,回想起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神秘的隐蔽处挽救下来的幸福时光,请求幸福带来的奴役,却只听到戴着面具的审慎——这种不可见的脉搏最终显露出来,为的是喊出世界上最可怕的真理和不可逃避的时代的判决——的声音:

你不懂得爱情。你不会恋爱。

现在,我开始讲述故事,并试图表明,这个骇人听闻的预言是正确的。我不懂得爱情。我不会恋爱。

二

我是在新年的一个夜晚认识狄安娜·索伦的。我的朋友建筑设计师爱德华·特拉萨斯在自己家里安排了一次聚会,顺便也是为了庆贺我和妻子路易莎·古斯曼破镜重圆。在一九六九年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和爱德华在古埃尔纳瓦卡[①] 一起租用了一套不太大的寓所。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那里写作,他则和他的女友从墨西哥城去那里度周末:会友,请客吃饭、饮酒。不少年轻女人去那里。一九六八年我正好满四十岁,进入了整整拖了一年的“中年危机”,到我为我的朋友、美国小说家威廉·史铁龙组织的那次晚会才告终。晚会是在五月五日大街的歌剧酒吧间进行的。这酒吧是墨西哥的 belle époque[②] (也许这东西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遗留下来的玩意儿。由于多米诺骨牌玩得太多,痰盂边上痰迹斑斑,显得相当破旧衰败。

史铁龙刚出版了长篇小说《耐特·特纳的忏悔》。此书的出版反响巨大,同时,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我邀请了所有的友人对史铁龙表示祝贺。这次轩然大波是由几个黑人团体掀起的,他们认为作者无权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即借助书中人黑人之口说话。耐特·特纳是个具有反叛精神的黑

---

① 墨西哥一小城镇,离首都墨西哥城不远。

② 法文:美好时期。

奴，他于一八三一年发起六十个奴隶的暴动，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烧杀。后来，被围困在一座森林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还坚持了两个月的斗争，最后遭到了杀害。从此，有关奴隶制度的各项法规变得更加严厉了，但奴隶起义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上，黑人的斗争曾遭受十三次以上的失败，史铁龙书中说的是其中的一次。

比尔[①] 觉得自己在本国待腻了，就打电话告诉我，准备来墨西哥。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墨西哥待烦了，就到我朋友在大西洋北部的玛尔塔斯—比纳亚岛上去。我知道，在他的岛上我可以清闲地待上几天。自从我和路易莎·古斯曼分居后，我就租了一幢小楼，眼下我和比尔就一起住在这幢小楼里。它坐落在圣安赫尔城一个砖石铺地的小区里。圣安赫尔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是让首都市民去度假的。眼下这座城市仍保留下来，只是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城市的周围和革命大街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我这个新单身汉住的这幢楼房全是用旧房子拆下来的材料建造起来的。这房子的设计师也是墨西哥的建筑师，叫卡科·巴拉。他善于利用从被国家征收的庄园房屋拆下的大门、国有化了的教堂和总督府拆下来的旧的柱子、房梁、祭坛等已属历史遗迹的东西拼造起一幢幢房屋。巴拉能用这种种旧材料建造起一座座奇妙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房子。它们显得神秘莫测，住在里面的人像消失在迷宫里一样，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玛尔塔斯—比纳亚岛正好相反，是个非常开放的地方。每年有三个月时间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其余时间则受到像巨大的鲸鱼一样的大西洋北部寒冷刺骨的北风的吹袭。现在我想史铁龙一定蜷缩在他的海岛里，还想像着梅尔维耶[②] 海岛的阿哈勃船长出去捕杀的不是鲸鱼，而是海洋，是海神，就

---

① 比尔为威廉的简称或爱称，这里指的是威廉·史铁龙。

② 位于加拿大北部。

像康拉德[①]《黑暗的心》中的那些比利时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开枪扫射的不是自己的仇敌黑人,而是整个非洲大陆)。史铁龙住的那个海岛,即使在气温相当高的夏天,也总是雾气沉沉。每天夜里,从海里升起的大雾使你想像起夏天只是瞬间即逝的一层薄纱,最终会被漫长的冬天这件巨大的黑色斗篷覆盖。从海上升腾而起的雾慢慢地沿着海滩过来,爬上盖依海特海岸和比纳亚海港码头,侵入草坪和住宅,一直到达海岛的中心,弥漫滞留在岛内那几个死气沉沉的与大海相通的湖泊上空。

冬天大海就在海岛四周咆哮,只是声音还没有我在歌剧酒吧请来的那些宾客的叫嚷声大。我这次有些冒失,不分青红皂白,将我当时所有的女朋友全都请来了,并使她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们试图掩盖对我的感情,但忌恨却又促使这种感情和嫉妒不断增长,几乎要流出来,就仿佛乳头出血时,伤口弄脏衬衣一样。这一切使我看清了女性的脆弱,也使我看清文学的力量。我不仅邀请了我的女朋友们参加了歌剧酒吧的聚会,还邀请了几位"新潮派"[②] 的年轻作家:何塞·奥古斯汀、巴尔梅尼德斯·加西亚·萨尔达涅阿和古斯塔沃·塞因斯。他们均比我年轻十五岁,但完全有资格戴上桂冠,就像我一样,只是我的花冠已经枯萎了。他们的创作极端自由,无所顾忌,幽默风趣,最讨厌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他们以摇滚舞的节奏写作。他们自然是这次聚会的明星。这次聚会还想告诉独裁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进行了大屠杀的政府:你们只有六年生命[③],而我们能活一辈子。你们的狂乐是沾满鲜血的、强制的。我们的狂乐是令人欢快,使人自由的。

这种种想法只能表明我并不粗野,但却无法为我行为的

---

① 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

② 指六十年代崛起的一代作家。他们以描写墨西哥城青少年生活著称。

③ 根据墨西哥宪法,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

轻浮和淫乱进行辩护。尽管如此，我却认为，文学——我的福音书——能原谅我的一切。也有一些搞文学的人在吸毒、酗酒、当政客，甚至吵吵嚷嚷地搞起体育文学来。我沉湎于情爱之中，不过，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还保持一种距离、主动和残酷的权利。我高高兴兴地穿上贝尔特纳佛罗斯的外衣，这是个披着骑士小说主人公阿马蒂斯·德·加乌拉的闪闪发光的道德甲胄的魔鬼。阿马蒂斯一失去他英雄的本色，向情感投降，便变成了他的对立面：邪恶的美男子唐璜。唐璜的引诱尽管属文学的描写，却是色情方面的诱惑。唐璜这个人物能活到今天，是因为什么都不能使他满足，或者就像与魔鬼相嫁接的唐璜在当今最完美的化身所唱：You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①]。是塞维利亚这个骗子的不满足给他打开了永远变形的大门。他是个贪得无厌，欲望永难满足的人。所以，他不会死，只会发生变化。在蒂尔索[②]的笔下，他初次面世。当时，他是个年轻人，只诱骗过少数几个(两三个)女人。他很快地变老了。在莫里哀的笔下，他的欲望虽得到了满足，但仍感不满。他是个残忍的劣绅。索尔索描绘的这个年轻、邪恶、天使般的美男子在路易·儒威[③]的笔下，却变成了致人死命的面具，是个不再相信青春期是无限长的理性主义的高卢老者(“你许诺得太早了。”)。他认为，他自己就戴着濒临死亡的面具。拜伦为了避免竞争，将唐璜加以驯化，让他在“六月结束，八月就开始”的英国冬天里和家里人坐在一起喝茶。拜伦给这种驯化以清亮的语言。唐璜发现，他爱的不是爱情，爱的却是他自己。唐璜对唐璜的爱情是个强烈的骗局，比对爱情的骗局还强烈。

所有这一切都是梦幻。戈蒂埃[④]写的唐璜是个从天堂

---

① 英文：你不能得到丝毫的满足。

② 蒂尔索·德·莫里纳(1583—1648)，西班牙剧作家。在他的作品《塞维利亚的骗子》中，塑造了唐璜这个对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人物。

③ 当代法国剧作家、导演(1887—1951)。

④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

驱逐出来的亚当，脑子里还铭记着夏娃。这使他一门心思永远地寻找自己的恋人，寻找道德沉沦的始祖母。缪塞① 描绘的唐璜是个酒色之徒，成天泡在酒馆妓院里，期望找到那个“不相识的女人”。其实，他弄错了，他是在寻找唐璜。尽管每个女人都像他，但没有一个女人“是他”。不过，也许真正的唐璜(由于是最秘密，实际上却是最公开的)是雷纳② 画笔下描绘的那个人。他承认，他想同时占有所有的女人。这是唐璜最后的胜利、他的最有保证的欢乐。同时占有所有的女人。

“今天晚上我就是要享用她们，每个女人都要享用。”

除了无处不在外，唐璜的欢乐靠的是伪装和东奔西走。他很像鲨鱼。为了不沉入海底死去，鲨鱼得不停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唐璜也是这样，脸上戴着面具，东奔西走。面具掩盖了他那种内在的多变的气质。他东奔西跑，变化快得连他本人的形象也赶不上，连阿喀琉斯③ 和战车都撵不上。唐璜是伪装者的象征，他无时无刻不在伪装自己。他是赤裸裸的。赤裸裸地寻欢作乐。但是为了奔走，他得穿上衣服，戴上面具。旧的面具被猜中识破了，在戴上新面具前，他就将旧的扔在一边。杜尚④ 描绘的唐璜赤身露体，不戴面具，爬阳台，下楼梯，这时的唐璜就是唐璜，但历时短暂，随即又改变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形象改变快得惊人。他的形象不分国界，瞬息万变。他在飞速的改变形象中感到愉快。唐璜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创始人。莫扎特告诉我们，唐璜在德国、土耳其和西班牙的情妇有一千零三人⑤。他在性爱方面不择手段，一直在伪装着自己，以逃避父亲们和丈夫们的报复。不过，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不感到厌倦……而我就暗暗地、荒唐地、痛苦地想成为这样的人……

---

①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② 奥地利画家。

③ 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

④ 法国当代画家，有名画《走下楼梯的赤裸男子》。

⑤ 出自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唐乔万尼是唐璜的意大利文写法。

在这墨西哥的夜晚，我这个刚满四十岁的最年轻的唐璜也想东奔西走，改变自己的形象。不过，我特别喜欢以作家的身分这样做。不管是谈情说爱，还是写作，承认我们对他人的吸引力和他人(不管是男是女)对我们的吸引力的互相抵制，这是最具有刺激性的，或者说，是最美好的。在互相吸引或抵制——由于渴望权力，渴望简单的幸存，或者也许是渴望邪恶，我们以这种抵制来对抗他人的吸引，——的难以捉摸的风暴中，其余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在这场斗争中，最美好的当然是屈从于这种吸引力。如何屈从？屈从谁？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这是性爱和文学共同探讨的问题。走过来一个有着灰色翅膀的天使，唐璜就是这个黑色天使，污迹斑斑的厄洛斯[1]，烈焰中的丘比特，自恋自爱的男妓，他将微笑和目光投向被爱的人耳朵上、眼睑上、鼻孔上、嘴上、屁股上和后脑上(如果需要的话)。贝尔特纳佛罗斯对着我的耳朵轻声地说："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的滋味，以及由于害怕，由于妥协，由于怕走上不该走的一步，由于缺乏想像力和不能像唐璜一样变成另一个人而失去了的男人的滋味，这一切是最伤心的。"

在这本书里，我准备袒露心迹，将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伤害自己，但却没有权利伤害除我以外的任何人，除非我首先将和另一个女人共同享用的爱情的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我得开宗明义说一说自己的顾忌。我要用文学为性爱进行辩护，用性爱为文学进行辩护。不过，作家(不管是情人还是作者)到头来还会消失。如果他大声疾呼，他会四分五裂；如果他叹息，他会熔化。在肯定地说，慷慨的生命不可能有第二次之前，应该首先意识到这一点。

那天夜里，在歌剧酒吧，维斯贡地式的舞台，也就是说在"歌剧"[2] 舞台上，我觉得自己常常拿匕首往自己胸膛刺，除了伤害我试图加以控制的那些女人外，也伤害了自己。我心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罗马神话中称丘比特。

② 维斯贡地导演过一些歌剧。

里非常明白，她们也会对我以牙还牙，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我。我只选中了她们中间的一个，这引起了其他几个女人对我的怨恨。我和史铁龙、特拉萨斯于次日来到瓜达拉哈拉[1]，来到太平洋岸边。我的朋友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巴耶尔塔港“大道”宾馆就在那天正式开张。

就在那里我接受了一次预先料想到的教训。跟我一起上瓜达拉哈拉去的那个姑娘一天下午无意地将一封信丢失在我们床上。这是一封写给她另一个男友的信，信中约他在新年(她当然不会和我一起过新年了)相会。信中说：“亲爱的，和作家不能长期相处。他们奉承我，反使我更爱你了。这些老家伙有自己寻欢作乐的方法…… 比如说，他们成天喝香槟。想到这点，我就觉得嘴里发酸。你得给我准备好冷饮。记住，如果可口可乐没有给我喝个够，我就不高兴……”

读了这封信，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一回到墨西哥城，我就去找我妻子，向她提出我们一起过新年的要求，并结束我们之间几乎历时一年的分离状态。与她和解使我再次胜利地摆脱了那些短时间内相好的女人的纠葛。这也是必然的。

---

① 墨西哥哈利斯科州首府，位于西海岸。

三

路易莎·古斯曼当年曾经是(眼下仍然是)个美貌绝伦的女人。棕色的皮肤略显苍白,又大又黑的眼睛几乎像东方人一样,眼梢细长,这使她的皮肤不但没有显得更黑,反而更闪闪发光;颧骨像亚洲人一样,看起来比较高,时常微微颤动。富有幻想的眼神忧郁自怜,露出无可奈何的悲伤和自责的神情。她也是一个演员,总想得到比墨西哥的观众能给予她的更多的东西。十五岁时她就是个皮肤黝黑,亭亭玉立的少女,有着一双惊奇的眼睛和一对不死的骷髅的颧骨,开始投身于墨西哥电影事业,试图成为墨西哥电影界的女神。

无论是新闻界,还是评论界和电影的导演们都没有对她表示青睐,让她最低限度地创造奇迹,使她成为所谓的明星。她积极地在电影界和戏剧界寻找良好的时机。她非常喜欢自己的职业,但她的职业却反而葬送了她的前程。她和狄安娜·索伦一样,只拍过两三部好的电影。之后,只要有事干,让她干什么,她都不加拒绝。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渐渐地变老了,虽未到中年,中年却提前到来了,当然,也就轮不到她担任主角了。她寻找适合自己性格的角色,寻找显示自己的机会。

我们相识时,路易莎已是有夫之妇。我呢,一直想体体面面地找个对象结婚,但总是未能如愿。那些与我家景相般配的姑娘,一个个到头来全都离我而去,因为她们都听从自己父

母亲那句冷冰冰的话:我不是个有钱人;虽说我是个正经人,但我不是出自财经方面或政治方面的大家庭;尽管在写作方面我颇有些才华,而且这点已得到证实,但充其量我只不过是个作家,而当作家是个很冒风险的职业,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的国家里,有谁是靠写作为生的呢?回忆起年轻时谈情说爱的情景,现在只留下与一张张年轻新鲜的嘴接吻的滋味和随着岁月而增大的疑问:当这些嘴唇失去了鲜嫩,当它们成为一道道裂缝时,它们会说什么?与我接触过的众多姑娘中,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喜爱。她已在一次空难中死去,变成了灰烬。我一生中只觉得这个姑娘的嘴唇最新鲜。她变为灰烬后,我又和另一个女孩子相好,而且,差一点就要结婚。她拒绝和我成亲的原因是我天主教信得不够虔诚,用她父母亲的话来说,我是个"无神论者",是个共产主义者。后来,她嫁给一个双腿粗壮、因为过多喝啤酒而脑满肠肥的美国佬。此人是德克萨斯中西部一个加油站的老板。我过去接触过的女友是未知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种顾忌(表现在对尚未表露出来的储藏在内心的事物的猜测)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了解我们能够相爱的每一个人,有的在我们了解之前就已经死去了,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我过去的那些女朋友(我跟她们接过吻、爱抚过,偶尔也有过两性关系)都属于那种未知或未言的因素,她们也有可能和我言归于好,这一切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的第一部小说取得成功之前,我就认识了路易莎·古斯曼。我认为,路易莎爱我,是因为我人品好。就如我爱她是由于她天生丽质,为人朴实。她的美貌一眼就可以看清,她的朴实则为众多的表象和传闻所掩盖。除了在电影里见到她外,我还在报刊上见到她。她总是抱着一只长毛绒熊猫在飞机的扶梯上上下下。这是她注了册的商标。她这个形象十分稚气,但却比媒体上宣传的要真实。

路易莎有过不幸的童年,父亲不在身边,说得更清楚一点,父亲是被专横、傲慢的母亲赶出家门的。母亲是个具有叛

逆精神的作家，是普韦布拉[1]一个“有身分的女人”。她总是将性爱和文学的利己主义置于任何家庭义务之上。父亲是个高个子的印第安人，生性粗野，发现妻子和女儿将他关在门外，便永远消失在雾气沉沉、弥漫着辛辣气味的高山密林中了。路易莎自小被送进孤儿院。到她开始长大成人，凭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姿和美貌，以及她母亲的职业，终于使她崭露头角。

幼年时即受到伤害的路易莎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一样，从苏依万街的戏剧舞台上飞到了我的怀里。我张开双臂焦急地等待她。从事创作我感到十分孤寂。她来后，这种状态得到了改变。几个月来关门写书，使我脱离了家庭的关怀。她的到来，使我许久没有拥抱过的双臂再次有了拥抱的对象。她满腔激情、柔情脉脉，然而，她的眼神却像个女俘一样充满忧伤。我自己心情愉快，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又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她的忧伤又使我深感不安。

后来，我终于明白，路易莎忧伤的眼神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一辈子也不会消失的。谁知道呢，也许它来自她父亲居住的雾气沉沉、充满辛辣味儿的高山密林，来自那里的那些凄凉的茅舍和居住在其中的那些经常是桀骜不驯、不说真话的居民。在那个产生酋长和修女、产生极富野心的男人和极守戒律的女人的苗圃，人们具有这样的眼神，也是非常自然的。不过，从我妻子那混血儿的美貌中我就认出了她父亲居住的雾气沉沉、充满辛辣味儿的高山密林。那儿忍耐和恩惠跟仇恨和复仇积聚在一起。

---

[1] 墨西哥一中等城市。

四

现在我们就在爱德华·特拉萨斯家里一起欢度新年。路易莎今天特别漂亮:高高的个子,棕黑的皮肤,黑色的外衣袒露着前胸;发髻高耸,睫毛和眉毛闪闪发光;黝黑的皮肤就像当地的仿佛雕塑而成的明月那样发着亮光。月亮本身是无色的,但它却为自己看起来更加醒目而努力不已。或者说,她在给一块满是激情、情节和事件的调色板提供颜色。而这些激情、情节和事件则同时与这个女人深沉的坚定和可怕的犹豫相符合:她的不幸命运就形成于这两种品质之间。

她感到自己永不衰老,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她一切全都原谅我了。我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她是一汪清静的水,平静的湖泊,在她身边我能安静地写作。我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文学才是我真正的情人,其余的一切诸如性爱、政治、宗教(如果我信教的话)、死亡(当它来临时)都只是文学的一种体验,它是我一生中其他各种经验的过滤器。她明白这一点。她像一团火一样热情地在家里给我准备和保持我进行写作的条件。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她总是等待我回去。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是我情人们的朋友。他们提醒她们:"他永远不会抛弃路易莎的,这点你们应该明白。相反,你永远可以将我看成自己的朋友。"

这就是说,各个时代的所有的唐璜最普遍的一条规律,用墨西哥人的话来说就是"看你是不是口香糖,能不能黏住"。

我的情况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香糖,尽量想黏住对方。有时黏住了,有时未能黏住。有的妻子不允许丈夫这么干,有的妻子则装作视而不见。我和路易莎之间似乎有明确的协定。尽管我的口香糖能黏住,但是,我会回到她的身边。我总是会回去的。也许这是我最糟糕的一种欺诈吧。我时刻准备着她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我。也许她真的这样做了。当代的女性(那些最优秀的女人)善于保守秘密,不像旧时的女人喜欢散布流言蜚语。我认识的那些最有意思的女人对谁也不谈自己的性生活,就连她们最要好的女友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女人比男人更能保守秘密;能使男人激动起来的事物,不一定也会使女人激动起来。像唐璜这样的男人总喜欢宣告自己取得的胜利,让人们知道他已取得了成功,好让他们羡慕他。路易莎是很会保密的。我是个在两性关系方面很不专一的、应该受到蔑视的人,所以,不配像路易莎这样一个在信仰方面不断更新的女人对我保持忠诚和坚定。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正因为她对我守口如瓶,今天晚上我才和她在一起。她比我更坚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圣西尔维斯特雷[①] 节。那天夜里在爱德华·特拉萨斯家聚集了许多朋友:何塞·路易斯·古埃瓦斯(他是个非同寻常的艺术家,他力图将欲望的所有边缘的、排除在外的幻觉揽入自己的痛苦的怀抱之中)和他的妻子贝尔塔,费尔南多·贝尼脱斯(他是我坚定的老朋友、小说家,是个在墨西哥报刊上大力推动墨西哥文化和探求墨西哥潜能的人)和他妻子赫奥尔希娜等。古埃瓦斯三十五岁时就是一只山猫,但他装作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只是很难掩饰他那野蛮的、难以平静的、随时会向某一热血猎物扑过去,将它撕裂,吞而食之的本性。能将他看成酷爱艺术的狂徒吗?我是一直这样看的。我认为,贝尼脱斯也是这样的人。他是个好色之徒,是女人的崇拜者,但同时却又是个厌恶女人、消

---

① 公元四世纪罗马教皇。

极遁世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像个方济各会的修士，印第安人的救世主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①]，也像征服墨西哥战争一结束就来到墨西哥拯救灵魂、保护躯体的那些耶稣会教士。人们可以想像他如何驾驶着敞篷跑车朝阿卡布尔科[②]疾驰而去，在那里狂欢，度过周末；人们同样也可以想像他骑在驴背上，朝着不安全的山上走去。在那里等待他的不仅是那些很快就会消失的土著部族里的人，而且还有即将摧毁他的肠胃和胰脏的细菌。

新年到来了。由一九六九年过渡到一九七〇年的这一天是值得好好庆贺一番的，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年代的结束，新的年代的开端。当然，人们谁也不会去注意计算年份的数字上这个“零”究竟意味着什么。六十年代结束了，七十年代即将开始。六十年代难道还会要求再延长一年吗？这种垂死的延长既意味着欢庆，也意味着犯罪、反叛和死亡。六十年代是个多事之秋。在这时期发生了许多见得到、摸得着和见不到、摸不着的事情，内幕和梦想，傻瓜与回忆，血和欲望。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了越南战争、马丁·路德·金被杀害和肯尼迪兄弟遇刺身亡；五月份巴黎出现了游行示威，还有芝加哥黑人暴动和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屠杀事件[③]以及玛丽莲·梦露之死……十年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事情充实了贫乏、空洞乏味的电视节目，使它们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使奇迹变得尽人皆知，使那小小的电视屏幕变成了我们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面包一样受人青睐。这里面有的事是人们意料到的，有的事是想像不到的。当六十年代行将结束，人类的足迹第一次登上月球时，对真实的摹仿几乎达到至高水平。听到这一消息，人们立即产生疑问：飞行月球的整个过程是不是在电视摄影棚里拍摄

---

①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74—1566)，西班牙神父，曾任美洲恰帕斯教区主教。所著《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屠杀美洲土著人的暴行。

② 墨西哥一滨海旅游城市。

③ 指一九六八年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血腥事件。

出来的？接着，人们又产生了扫兴的感觉：让那个登上月球的美国佬拉了屎后，月亮还能继续被称为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狄安娜吗？

更多的客人来了。拉吉娜·门多萨是个记者，也是作家。她在六十年代是一位打扮人时，具有自我肯定意识的女郎。六十年代时装的式样有些肆无忌惮，她穿的衣服好像全由她自行设计，不是从哪一本时装设计杂志上抄来的。那天夜里，我记得她戴一副形状像两只蝴蝶一样的银白色眼镜，下身穿的超短裙实际上只是一条床上用的睡裤，上身是一件玫瑰红的满是白色花纹的衬衣，超短裙里的短裤一目了然。

罗莎是艺术家米盖尔·科瓦路维亚斯非常漂亮的遗孀，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贩卖艺术品的纽约商人，模样儿很像演员西特尼·格林斯特里特，也就是说，长得大腹便便、苍老、秃顶，两鬓染霜，两道箭眉又黑又浓，嘴唇的颜色像猪肝。罗莎穿一件她最喜爱的由时装设计师福杜尼设计的服装。这种服装卷起时像一块毛巾，摊开来像一面旗子。她宣称：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身躯。虽说已不久于人世，但是，罗莎·科瓦路维亚斯总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她是墨西哥漂亮的老年妇女中的一个。用狄埃戈·里维拉[①] 的话来说，她们是“不死的头盖骨”。狄埃戈·里维拉是在描述多罗莱斯·德尔·里奥时说这样的话的。情况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脸部的骨头是永远不会衰老的，它们导致了一种无法以年龄——这被当作美丽及其价值的秘密标志——做决定的死亡的自相矛盾。路易莎·古斯曼(我刚才见她离开，走上楼梯)也是这样的人。脸上的骨头越是贴近皮肤，脸庞越是显得好看。不过，死亡也好像显得越来越近了。这就是说，美似乎和死亡的临近有关。

和罗莎、格林斯特里特一起来的还有三个英国marchands de tableaux[②]，他们见墨西哥人互相拥抱，互拍肩

① 墨西哥当代作家。

② 法文：画商。



膀，还搂住对方的腰部，感到又惊讶，又不高兴。英国人是讨厌捏捏摸摸的，也不愿直接接触他人的皮肤。他们对气候和气温的观念也非常与众不同。三人中有一人模样儿很像哈罗德·威尔逊[1]，我刚刚想起他吟诵了拜伦的诗：

英国的冬天在七月结束却又在八月开始。

他说，天气很热，便打开了窗门。

特拉萨斯用不少气球来装饰他的房间。这些气球都用绳子系着，悬挂在天花板上。它们也仿佛等待着从这一年过渡到另一年的那个时刻的到来。每只气球都有一张面孔，那脸谱是爱德华·特拉萨斯根据一九六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亲自设计的。午夜十二点钟快敲响时，为了宣告新年的来临，贝尔塔·古埃瓦斯将点燃的香烟伸向那一大串气球（特拉萨斯将十二只气球巧妙地串成一串葡萄的样子，这是庆贺新年的传统习惯）。她不知道气球里面充的是瓦斯。气球轰的一声全爆炸了，像发生地震一样，气浪将我们每个人都推倒在地，脸部对着墙壁；桌子上的东西全都掀到地板上，椅子也被掀翻；墙上的画被掀得东倒西歪，其中的一幅十七世纪的彩画落到了格林斯特里特的脑袋上。其他的人，像罗莎、贝尼脱斯、古埃瓦斯、贝尔塔、拉吉娜和我本人这时已顾不得别人，一心只想着自己，心想可能会因此送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大伙儿都只想着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还活着。接下去的问题便是抱怨、生气和疼痛。人人都惶惑不安，个个都张口结舌。当三个英国人（他们已不像刚来时那样刻板了）对着镜子照一照自己的模样，看看哪里受了伤，见到他们脸上黏贴着带有六八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精神的气球的碎片时，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三个人很像探险者，他们被土著部族人的妖术变成三个根据行将消失的礼仪而文身的牧师。其中的

① 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任商业大臣和首相。

一人(当时我已完全恢复知觉)打开了窗子,让显然是从苏格兰高地上吹来的凉风吹进房内。这样,总算救了我们的性命。

路易莎没有遭到这场劫难,她漂亮的外表完好无损,因为她刚才上楼去梳妆室了。这时她慌慌张张地从楼上下来。此刻,临街的那扇门打开了,爱德华·特拉萨斯和狄安娜·索伦一起走了进来,他刚才出门在另一家的聚会里将她请了过来。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吧?"主人见我们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来,问道。

五

是不是有可能摆脱一种恋爱境地，进入另一种恋爱境地而同时又不伤害任何人呢？当人们发现某种即将开始的情景（而这种情景的出现是以另一种即将结束的事情为代价的），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刚才的这个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例。狄安娜·索伦身材矮小，金黄色的头发，修剪得像男孩子那样短；她皮肤白皙，甚至有点苍白；眼睛是蓝色的，也许是灰色的，非常活泼可爱，笑容可掬；脸颊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她的服装不十分显眼，上装是一件希腊-加里福尼亚式的夜礼服，很长，与她的身材不相配，使她看起来比原来的样子更矮小了。我在两部重要的电影里回想起她的形象。这两部电影里，狄安娜·索伦都利用自身像孩子一样矮小的身材，穿上男装。首先她扮演了圣女贞德，身穿甲胄，行动灵便，伸展自如。她穿着士兵的服装，像一个士兵一样，在战场上厮杀，比扮演戴着裙撑和白色假发的宫廷角色更加得心应手。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火堆上，她被指控施展妖术[1] 但也许（尽管没有说出来）被认为是同性恋，是男女同体的畸形。相反，后来在法国拍摄的唯一的一部好电影里，她演的是个只穿短袖汗衫和牛仔裤的女孩儿，手里举着一份《先驱论坛报》，在香榭丽舍大道奔跑叫卖……总的说来，狄安娜·索伦是个自由自

① 圣女贞德被判处火刑，罪名是行妖术。

在、无拘无束的女人，既像奥尔良的女战士①，又像拉丁区的少女。她其实是个真正的女性，但达到这样认识前，人们往往以为她是个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阴阳人”，是个搞同性恋的人。见到银幕上的狄安娜·索伦时，我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想法：有的爱情是不敢说出它的名称的，而更糟糕的爱情是没有名称的。在一九七〇年新年聚会里，经过瓦斯爆炸后，见到了狄安娜·索伦，应该如何称呼这种纯属偶然的爱情呢？

我对她看了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路易莎看到我们互相看。她来到我的身边，突然对我说：

“我以为我们该走了。”

“可是，新年聚会还没有开始呢！”我对她表示不同的意见。

“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是不是由于爆炸？我一点事也没有，你看。”

我平静地伸出双手给她看。

“今天夜里你可向我作过保证的。”

“别那么自私嘛。你看刚才谁来了，我们很敬佩她。”

“请你不要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好吗？”

“我想跟她说一会话。”

“别回家太晚了，”她皱了皱眉头。作为一个墨西哥女演员，这样的反应几乎是必然的、条件反射的、遗传的。

那天夜里我没有回去。我坐在狄安娜·索伦的身边，跟她交谈电影和巴黎的生活情况。我发现，有不少我的朋友她也认识，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背叛者。和平常一样，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背叛文学，就不背叛自己，其他方面的事我都不在乎。然而，当我的手触动了狄安娜的指尖时，我感到，如果真的背叛了，那么这种背叛具有双重性。不管怎么说吧，狄安娜是法国一个很有名望的、还得过奖的作家的妻子，他叫伊万·格拉威，曾经写过两本很有价值的书，是谈有关他青年时

---

① 即圣女贞德。

期的情况。首先，他从东欧逃亡出来；随后又作为一名战士，参加过战争。他最近写的几部小说好像专门用来拍摄电影的，所以，都被好莱坞摄制成电影了。不过，综观他写的东西，总有一种失望的情绪，而且，越来越严重。我真怕他最后会做出绝望的事情来。他是我的同行。他也会背叛吗？如果他和我相像的话，那他一定比重视他的妻子更重视他的书。……我开始对狄安娜产生了兴趣。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发生的事往往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外部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用摄影机拍摄下来的，这主要牵涉到个人的表情、姿态、眼神和动作。最有意思的是内部的那一层。男女接触后，内心立即会产生种种感觉、问题、疑问，心潮翻腾，还会出现各种想像，尤其是女方。她会想像对方在想些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对她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狄安娜那一头金黄色的短头发像中世纪打仗时用的头盔，或是本世纪六十年代进行巷战（那天夜里，我突然觉得六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就像百年战争[①] 一样，异常遥远）时用的钢盔一样，边缘参差不齐。看着她那一头令人愉快的头发，我觉得狄安娜仿佛在邀请我，欢迎我，她好像在对我说：想像一下我的身躯吧，我命令你这样做，你看一看我头上、脸上的每一个细节，便可以设想在我的身躯里也有相应的表现。这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身上找到我嘴上露出的微笑，找到脸上的酒窝，找到我那向上翘的鼻子呼出的空气，找到我容易激动的眼神；还可以在我身上找到我那金黄色的、柔软的、洗得干干净净、剪短了的头发（它有时梳理得整整齐齐，有时被风吹得乱蓬蓬的）的相应的东西。离我的毛发最近、最隐蔽的、最见不到的东西，就是我的肉体。

我脑子里就带着这样的才产生的欲望和狄安娜坐在爱德华·特拉萨斯家的沙发上聊天。我不应该将这种欲望表露出来，因为根据男女相聚的经验，男的不应该给女的提供炮弹，

---

① 指一三三七年到一四五三年发生在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

让她有朝一日需要的时候(总有一天会需要的)向你发射过来,对你进行攻击。下面这一点是女人固有的特性:她们会将我们干的坏事积聚起来,然后,在她们需要,而我们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铺天盖地般向我们头上倾泻下来,使我们无法进行自卫。女人们有非常高超的手段,能使我们感到自己犯了过失,做了错事。为了掩盖我那种自己特有的、想立即得到满足的欲望,我有意将女人想像成爱惹是非的人,将她们想像成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有意将钱财储备起来的联邦储备局一样,将平常产生的怨恨积储起来,然后,慢慢地释放出来。这些释放出来的东西像毒箭一样,能伤害人,并且最终都是成功的,而我们这些男子汉却慷慨豪放,从来不会干这样的事情。……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背叛。从我的情况看,这已是既成事实。虽说眼下我和狄安娜·索伦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让路易莎单独回到圣安赫尔,这已足以说明我背叛了她。今天夜里我如果自行其是,为所欲为,那她也会干背叛我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认为,背叛应该是双重性的,其后果我们应该共同承担。这样的背叛会使我们重聚,具有刺激性……

路易莎和伊万虽不在场,但他们像悬在空中的两个天使一样似乎见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他们没有鄙视我们的背叛行为,因为说到底,他们还是爱我们的,还是以愉快的心情记挂着我们,同时,没有失去和我们团聚的希望。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们谈到去世界各地的观感,谈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我觉得将我们联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东奔西跑、周游世界的共同特性,而且是这种共同特性产生的情谊的价值。我们说,周游世界的人就是不属于某一固定的地方的人……她觉得什么地方过得最舒服?她对我说,在巴黎和马略尔卡[1] 过得最自在。"洛杉矶呢?"她笑了笑。这个地方不但从外形看,十分可怕,就是从其内在情况看,也是十分恐怖的。

---

① 西班牙东部一岛名。

“‘smugness’这个英文词形容好莱坞最合适了。它用法文和西班牙文该怎么说?”

“自满,沾沾自喜?”

“对,”她笑着说。“你知道吗?他们自以为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是世界的中心。那里发生的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世界上其他的城市都是‘hick’①。”

“一些乡村小镇……”

“只有好莱坞是国际性的,全球性的。如果你向他们证明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就讨厌你,憎恨你,让你付出代价。”

“你怎么会知道呢?他们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上好像都戴着面罩似的。”

“就和你一样!”她又吃惊、又带有某种嘲弄的神情张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从巴耶尔塔港带回的被阳光晒黑了的脸,笑着说。这么一来,我才想起自己的皮肤被晒黑了。

她的微笑使我心醉。她可以再笑一次,我对自己说。她可以这样微笑无数次,就是笑几个世纪,我也不感到厌倦。墨西哥新年之夜狄安娜·索伦的微笑和她像唱歌一样的纵情欢笑太活泼可爱了,我怎么会不对她一见钟情呢?我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我正在崇拜一个十五年来被看、被追求、被爱怜的形象,……我的虚荣心促使我采取行动。我想和一个受成千上万男人喜爱的女人睡觉。我想和许许多多淫乱好色的男人一样,让她骑在我的脖子上喘气。但我突然又决定不这样做。她会怎样和我分享这份骄傲和虚荣呢?

那天夜里,我自始至终一直低估女性的征服力和诱惑力。我们男人总不肯承认女人的毅力和运气,我们只认为自己有运气。我们的虚荣心(或者说盲目性)是很大的。而这也许表露了我们暗藏在内心深处的谦逊(这点可能是每个人具有的最大的吸引力)和隐秘的难以抗拒的弱点,这弱点在无意识地招唤着母亲的拥抱,因为她是我们的爱人、保护者和我们如此

① 英文:“乡村”的意思。

小心地美化、掩盖、否认的脆弱品质的谜的发现者……

狄安娜对我多次谈及她的家庭和流亡国外的情况。她问我是不是认识流亡法国的黑人作家詹姆斯·保尔德文。我说不认识，他是比尔·史铁龙的挚友，但我不认识他，只读过他的作品。

"这说明一个问题，"狄安娜的两只眼睛注视着殖民地式的枝形吊灯，那几只刚才烧坏了的新年气球(它们的模样像几颗死亡的凄凉的行星)就悬挂在枝形吊灯上。"一个男黑人和一个女白人，由于都是美国人，对自己就比较了解，他们相互之间也比任何一个欧洲人对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更为了解。"

"你以为自己眼下能回家吗?"我问她。

她摇了几次脑袋，又抬起双腿，随后又合起来，将前额靠在双膝上。

"不，不能回去。"

"那你永远不能回故乡去了?"

"能回去。正因为这样，我知道，眼下不能回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是我制造的一个骗局，我得装作喜欢他们。"

她抬起头来，对我那种怀疑的目光看了一眼，好像为了摆脱尴尬局面似地迅速地加了一句："我是指我的父母和我学校里的朋友，还有我那些男友。我厌恶他们。"

"是因为他们留在那里吗?"

"是的。不过，他们留下来倒比我好，不像我那样得扮演各种角色。也许由于我嫉妒他们，才恨他们。"

"你是演员嘛，扮演角色，这有什么奇怪的……"

"衣阿华，衣阿华，"她有点绝望地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们美国人是不是都应该像我和保尔德文那样流亡国外，还是应该全都留在家里，就像我的父母和我的男友们那样。也许我们的错误，也就是美国的错误，在于走向世界。我们从来不了解发生在家园之外的事情，我们都是一些乡下人，就像你说的

那样，是 hicks 的人。好莱坞！你设想一下，如果你连一些小事情也不明白，比如，谁跟谁睡觉，给每个人付多少工钱，那人们一定会认为你是个残废，是个文盲。好莱坞的故事都是乡下的事情，发生在当地的事情，也就是家庭的故事，你知道吗？他们不了解像我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兴趣讲述和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的爱情。”

“保尔德文也说，欧洲有你们缺乏的东西，即悲剧感和极限感；反过来说，你们也有欧洲人缺少的东西，即对生活无限可能性的感觉……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我喜欢，这我喜欢，我喜欢。”

聚会结束时，狄安娜那只滚烫的手捏在我的手心里。房子里只留下她、特拉萨斯和我三个人。狄安娜邀请我们去她住的那家旅馆的套间喝上几杯。爱德华说，他要出去一下，让我们留在家里。他要去将住在改革大街安德逊饭店的一个女友接回来。然后，再和我们在离他家不远的希尔顿饭店相会。

爱德华走后，一直没有再回来。我和狄安娜在一起给我们住在巴黎的那些朋友草拟电报稿子。我们继续交谈有关好莱坞的话题，她也谈有关墨西哥的事情。我喝着香槟，我们便开始戏耍，但我心里却暗暗地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爱上她。爱情的天地太广阔，根本不必为之牺牲爱情，那天夜里，我也可以找许多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与她恋爱只是情感的冲动，但事后我从来不问自己，能不能离开她生活下去……那天夜里，我说行，我能离开她，能随便找个借口，离开那幢注定要在不久后发生的墨西哥大地震中倒塌的旅馆的那间套房。那套房看上去就像米高梅公司的布景一样。

她脱光衣服的同时，我却透过房间的窗户，注视着阿兹特克国王瓜乌特木克[1] 的雕像。他高举着长矛，正在监视着他那座已被占领的城市的欢乐。

---

① 墨西哥土著居民的首领，十六世纪西班牙远征军占领墨西哥城时被俘，遭杀害。

六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这美好而漫长的一天时间里，我们在希尔顿饭店的套间里没有穿衣服。饭店的侍者来给我们端茶送水时，我们只围一块毛巾。我们发现有许多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细节。比如，我们都生于十一月，同属于天蝎星座。我叫她 gamine[①]，她不喜欢。相反，我们都喜欢使用 désolé 这个法文词，意思是“凄凉”、“遗憾”。于是，我们便一个劲地使用这个词，遇到这件事，就说“désolé”，遇到那件事，又说“désolé”。尤其是想跟对方接个吻什么的，就说声“désolé”，意思是“对不起”。虽然是“对不起”，但是，我还是得吻你。你也可以过来嘛……

我真的过去了。每次过去和她接吻时，其余的一切便烟消雾散，就像新年的晨曦出现在改革大街和起义者大街[②]的交叉口后，黑夜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墨西哥城是一座美丽而邪恶的城市。它既是种种美好事物的中心，也是种种恐怖事物的中心。我回到自己出生的这座城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过分孤寂，想回到这座大城市热闹热闹，访亲问友。墨西哥城的性生活往往以收入的高低来决定的。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残酷的阶级差异。有钱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

① 法文：调皮的女孩。

② 改革大街和起义者大街都是墨西哥城的主干道。

长期沉湎于酒色,最后导致死亡。当人们发现自己行将死去时,才发现自己原来就是行尸走肉。

狄安娜就不是这样的人。在墨西哥这个城市里,女人和男人睡觉,从来不知对方是什么人,也不知对方姓甚名谁,而这里所有的女人还公开宣布这种事,这是令比弗利山[①] 的娘儿们感到恼火的。狄安娜就是如此,她立即向我表明,她和我睡在一起是完全自愿的,并非偶然的。不过,我也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样做有些危险。天晚了,当我回想起和狄安娜交欢的情景时,我对自己说,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应该抱什么幻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持久。她是来这里拍电影的,我呢,是被朋友请来参加新年聚会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临时的,不过,倒也不会是毫无理由的瞎凑合,不是 pis aller[②],不是 falta de otra cosa[③],就像墨西哥人说的"peoresnada"[④]。无用之物,什么人也不是,无人先生,身无分文的人。我们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喜欢否定或贬低他人的存在价值。在这方面,美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比我们要强一些。他们比我们更能关心他人,体谅周围的人。因此,他们也许更能成为了不起的慈善家。我们身穿黑衣,将一只手放在胸口上,这种乡绅式的冷漠看起来很潇洒,实际上却很无聊。我了解的狄安娜是个表面冷漠,内心仁慈的女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狄安娜是个能帮助他人,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自由主义崇高事业的人。她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反对种族主义、争取人权、反对美洲国家组织、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法西斯将军们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各种宣言上……她甚至有一块汗巾,上面别着六十年代人们崇拜的偶

---

① 美国洛杉矶市的一个主要城镇,与好莱坞相邻,电影业的很多名人居住于此。

② 法文:万不得已的办法,权宜之计。

③ 毫无选择的作法。

④ 意思是"毫无用处","无用之物"。

像切·格瓦拉[①] 的头像。切·格瓦拉在一九六七年突然死去后,便成了欧洲和美洲各种怀有良好愿望的激进分子的救世主,变成切克[②] ·格瓦拉。西方人有一种本领,他们善于在第三世界找到革命的天堂,找到用来洗去他们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犯下的种种罪孽的圣水……对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疑问。

已故的恩纳斯托·格瓦拉[③] 的遗体就像曼泰涅亚[④] 画笔下的耶稣基督像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遗体。切·格瓦拉是欧洲人第二次(或者说,第若干次)发现新世界的圣托马斯·摩尔[⑤]。从十六世纪起,我们拉丁美洲就是欧洲人用来洗刷他们以鲜血、贪婪和死亡犯下的罪孽的乌托邦。好莱坞是美国的索托玛[⑥],它高举革命的旗帜,为的是掩饰它的种种恶习、虚伪和对利益贪婪的追求。狄安娜是与众不同的呢,还是也是加里福尼亚乌托邦军团中的一员呢? 由于她丈夫的关系,她已经通过了法国革命伤感主义的筛选。

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然而，狄安娜迷人的诱惑力和无穷无尽的床上功夫令我陶醉，使我感到舒畅，以至失去了思考能力。我对自己说，我既然不能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怎么还能去对她进行评头品足呢? 狄安娜·索伦是个和我相似的女人，像我的妹妹，是个表里不一的女演员。

我感到嘴里有一种桃子味。我承认,在那天夜里之前,还从来不知道人使用过水果味的阴道油膏。之后的那几个夜

---

① 阿根廷人,生于一九二八年,原是医生,后参加古巴革命,成为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在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战过程中被政府军击毙。

② “Chic”,英文的意思是“义士”。

③ 即切·格瓦拉,他的全名是恩纳斯托·切·格瓦拉。

④ 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雕塑家。

⑤ 十六世纪英国首相,《乌托邦》一书的作者。

⑥ 巴勒斯坦一城市,位于死海边,根据《圣经》的说法,城中人民罪恶累累,遭天火焚毁。

晚,我又尝到了草莓、菠萝、橘子的滋味,这使我回想起小时候在一个叫萨拉曼卡的城市里一家非常好的冷饮店吃过的种种我爱吃的冷饮。一些墨西哥当年罕见的水果制成柔软的冰淇淋,吃进嘴里,一接触舌头和上颚,立即化掉。我根据儿时吃过的各种水果的滋味将狄安娜的阴道想像成曼密苹果、番石榴、人心果、山番荔枝和芒果……她用含水果味的阴道膏这一着棋真妙。现在想起来,我这个富有想像力的人认为,那些有水果味道的阴道油膏真是一种奇妙的商品……相反,我对她放置在旅馆衣柜里的那些内衣却想像不出什么来。我不想对她穿的内衣进行描述,因为它们是无法进行描述的:非常刺激,非常疯狂。那些花边和丝绸的料子以及千奇百怪的交织、裁剪的方式和我发现的她这个具有男孩子气的女战士的简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狄安娜是个神圣的战士,也是个巴黎的gamine。我批评了自己,因为她讨厌这个词。Désolé。

我为什么想看看她放在衣柜抽屉里的那些内衣呢?我是想看看它们,触摸一下(尽管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触摸它们,感受它们的质地),并设想一下穿上这些衣服的那个女人的肉体。身穿无袖衬衣和蓝布裤子这样具有浪漫色彩的年轻女子居然有一副像女神一般的好心肠,这真是异常奇妙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交欢的第二个夜晚,她就对我说出了她的奥秘。头一天晚上,她坐在我的膝盖上,暗暗地让我的一只手伸进她的内衣里,改变了她原来的声音,对着我的耳朵,稚声稚气地说:“撩起我的短裙,你真的要撩起我的短裙?你为什么不碰一下我的内裤?碰一碰我的内裤吧,亲爱的,我请求你啦。你可以随意地撩起我的短裙,脱去我的内裤,不用害怕。我就像个十岁的小姑娘,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告诉我,亲爱的,你碰到什么了吗?你撩起我的短裙,触碰到我的阴部,脱去我的内裤后,再告诉我,你有什么感觉。”

第二天夜里,她赤身露体地躺在床上,对我谈起了她的往事。这件事发生于她在衣阿华的中学高中部的礼堂里。那是

在夜里，外面下着雪。人们整天在练唱村夫谣[①] 和牧歌，准备在圣诞节晚会上演出。她和他等大家走出礼堂，又留了一会，打算再练唱一会。十二月的夜晚特别长，夜幕很快就要拉开了，天上露出蓝色和白色的微光，透过天窗，射进礼堂。他们仰面躺着，眼睛朝上，通过天窗，看到天上的云彩在移动。云彩很快消失了，只见到一轮明月，照射到他们身上。那时，她十四岁，还是个处女。这是她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发生两性关系……

于是，我明白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女神，或者说，她是哪些女神，因为她像好几个女神。她像阿波罗的妹妹处女猎手阿尔特弥斯[②]，她的箭使那些不敬神的人的死亡提前到来；她也是月亮女神。她又像饮酒纵欲的人们的守护神西贝莱斯。这些纵欲的人为了对女神表示敬意，在月光下对自己进行了阉割。女神的两边有好几只狮子。她以此对大自然进行统治。她头上戴着塔形王冠。她还像叙利亚的夜间女神阿斯塔尔黛。月亮听她的使唤，她驱动着出生、生育、衰老和死亡的力量。归根到底，狄安娜最像和她同名的女神。这位女神只以某一湖泊为唯一的镜子，她和受她庇护的月亮便在湖中照见自己的身影。狄安娜和银幕、摄影机紧密相联。狄安娜以自己作出的牺牲和名望使票房收入不断地升降。

这便是狄安娜·索伦，一个美国女演员。她来墨西哥圣地亚哥城附近的几座景色宜人的山上拍摄有关牛仔的影片。这部电影就在明天（一月二日）在墨西哥楚鲁布斯科制片厂六号摄影棚开机。

到了电影制片厂，她就不属于我了。那些替她梳头的、化妆的和穿衣的人团团围住了她。不过，她真正信得过的化妆师还得数她的女秘书阿苏塞娜。这个加泰罗尼亚女人也是她的女伴、厨娘和按摩师。那天上午，我第一次去那儿。在摄影

---

① 西班牙民歌，一般以耶稣降生为题材，在圣诞节演唱。

②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

棚里受到冷落的我却尽情地享用着阿苏塞娜为了使狄安娜更加光彩夺目而使用的油彩。我的嘴里总有一种桃子的滋味。人们给我的圣女贞德涂上了那么多油膏,那样子活像中世纪即将被送去火堆活活烧死的巫婆。那种厚厚的果冻一样的油膏像日常用来涂在肚皮和屁股上的减肥药,这种减肥药能完全渗透进皮肤的表层;也像用来去除皮下脂肪,渗入皮肤后,能很快地进行扩散的药膏……

狄安娜尽管脸上涂满了香脂和油彩,但还是希望我吻她。吻我吧,她对我说,我要让你好好地享用,就只让你享用。我是不是在思想上需要有个界限呢,免得超过了这个界限,由享用变成了滥用。她没有能让我知道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狄安娜那样苛求,却又那样投入的女人,浑身涂着令人麻醉的,芳香美味的油膏,我知道,没有这一切的狄安娜是不存在的。

爱情就要忘掉一切,非常投入。爱情要忘记丈夫、妻子,忘掉父母、子女、朋友和敌人;爱情要去除所有的忧愁,去除各种打算,去除喜好和厌恶。

她开始回忆起昨天坐在我的膝盖上,脱去她内裤的情景;接着又回想起当年在礼堂发生的事。地上积了雪,月光透过天窗,照进礼堂。

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情绪极好地笑着说道:

“我总有一天会处于停止思维的状态,也就是说,死了。你现在爱我吧。”

“或者说,只要我……”

她邀请我住到圣地亚哥她租赁的一套房子里,住两个月。那套房子是电影制片厂给她租的。我没有见过那套房子,不过,我如果跟她去那里,我们会过得很愉快的。

我们分手了。她先走,我决定跟她去。我问自己,有了文学、女性和一腔热情,是不是会感到满足了。我给路易莎留下一张便条,请她原谅。

七

"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我到了狄安娜在圣地亚哥的家后,她笑着对我说。她拉住我的手,将脸凑过来让我亲吻。然后,赤着双脚,回头轻捷地朝她的卧室跑去。"阿苏塞娜,将这位先生的行李拿进去,"她对与她作伴的那个女人说。接着,她又对我说:"你看,这整幢房子我全都熟透了。就是闭上眼睛,我也能跑个遍。这房子不太大,闭着眼睛跑遍也不难。不过,它并不漂亮……"

她又笑了笑,我同意她的说法。从机场来的出租汽车里,我由眼角见到市中心的大教堂,有两个高耸入云的豪华的塔楼;顺着塔楼的楼梯,建有三个平台。我再一次地问自己,西班牙人为什么为永恒而建设,而我们现代墨西哥人只为"六年"[1] 而建设……圣地亚哥从来不是一座大城市,它只是那些寻找金银的胆大无畏的探矿者在边境栖息的场所。这些寻找金银的人后来找到了铁矿。为了开采铁矿,他们得和当地人数不多的印第安人打仗。这些吝啬的印第安人其实并不真的想杀死白人,他们只是想练一练自己的箭法。我本想见一见我国另一个时期的城市建筑的式样,但未能如愿。那个时期的建筑是新古典主义的,甚至是波尔菲里奥·迪亚斯[2] 时

① 这里的"六年"指六年总统任期。

② 一八八四年任墨西哥总统。

期的巴黎的式样，我认为比较高雅，但我却一无所见……我只见到扁平的水泥建筑，玻璃裂了缝，真是建造得快，损坏得也很快。一个生下来就已死掉的现代化。那种“雀巢咖啡”式的建筑式样从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电影制片厂给狄安娜租用的那套房子。这座两层楼的房子是什么式样，也说不清楚，只像一座现代化的洞穴。一进门是个车库，再进去是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把铁制的椅子和桌子；客厅相当宽敞，里面的陈设是什么模样，也难以说清，反正座椅和沙发都套上套子。另外，还有几个卧室。别的还有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全都忘了，这是一套临时居住的房子，不值得被人记住。

狄安娜居住在这幢房子里，使它充满了生气。朝气勃勃，正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她情绪这么好，使我感到惊讶。现在我们住在这座完全被上帝遗弃的小城。人们的行为使上帝感到十分失望。上帝仿佛为了对人们进行报复，才让他们住到这干燥、满是石头的高原小城里来的。这里白天热得像开了锅，夜里则冷得结冰。山顶都是坚硬的毫无用处的火山岩，两边则像用刀切过似的陡峭的悬崖。上帝好像除了那些犯了过错才被判定上这里来的人外，谁也不让来这里似的。

“人们都说，这里与外界隔绝，显得特别无聊，”狄安娜一边将我带来的衣服整齐地放进壁橱里，一边说。“谁也不知道在这里究竟拍摄了多少部‘西部片’。看来，这里的外景对拍摄这类影片特别合适。再说，这里的工资很低。这两点对好莱坞来说，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她说得对。那星期六我们就发现，当地没有酒家，尽管药房倒有不少。除了不可缺少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外，任何外国报刊都到不了这里。就是上面说的这两种刊物每次也得晚到一个星期，新闻早已变成了“冷盘”。在墨西哥的这座山城里，不但没有夜总会，就连对娱乐设施进行投资的打算也没有。只有几家酒吧，里面弥漫着难闻的啤酒味和龙舌兰酒味。法律上禁止士兵、神父、未成年儿童和妇女进酒吧。小城里只有一家电影院，专门放映克拉维亚苏的喜剧片和其他

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片子。电视还没有将它具有象征意义的翅膀伸向全世界每个角落。墨西哥的电视连续剧一分钟也不放,就连黑白片也没有。而在这里的美国人倒可以以怀旧的心情看看美国的广告片。仅此而已。

狄安娜的那个女理发师说要给我理发,免得我让小城里的理发师将我的头发剪得太短。圣地亚哥男人的头发都理得很短,因为这里最新的时尚是每一个男人都戴一顶帽子,露出软帽外面的头发都要毫不留情地剪去。因此,当地男人后脑勺上的头发都被齐齐地削去,就像当地的悬崖峭壁一样。那个叫贝蒂的女理发师想要,正如她所说,使我躲开这种恐怖。

"你来这里太好了,"她一边给我洗头,一边说,"你使狄安娜摆脱了那个演特技的演员。"

我不理解地朝她看了一眼。她取出剪刀,叫我别摆动脑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人。他有很高的专业技巧,干得相当出色。他上马的姿势,尤其是从马上跌下来的姿势十分高超,常常请他来拍西部片。上次我们在俄勒冈拍电影,狄安娜对他开始感兴趣。不过,那里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

贝蒂哈哈大笑,差点将我剪成一副梵·高的模样。

"你说话可得留点儿神。"

"他说,他准备在墨西哥城将她搞到手。可是,你出现了。"

她叹了一口气。

"住在这套租赁的房子真是够乏味的。年轻姑娘没有一个男朋友日子多难过啊,我们都快发疯了,只好随便找个男人。"

"谢谢。"

"别这么说。大家说,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也很有文化。你的确很帅。"

"再次谢谢你,贝蒂。"

“如果你去那里，你就会见到他。他是个矮个子，但很有强性，皮肤黑得像马鞍，黄头发，长着一双不信神的眼睛……”

“那你为什么不将他留给自己呢？”

贝蒂高兴地笑了，她的欲望显得十分强烈。

女理发师对发生在俄勒冈拍摄现场的那些事情的议论引起了我的联想。我不怀好意地试图使自己相信，爱上一个女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知道人们是如何爱上她的，对她有什么样的说法，在我之前爱过她的男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还不想对狄安娜进行评论，因为为时尚早。这个问题我暂时予以保留，到我认为必要时再谈。不过，我可以告诉她，今天她如果想作爱，那她只能跟我干。但如果她今天去世了，那她将为所有爱过她的男人而死。他们认为，他们和我有同样的权利爱她。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将这些都对她说了。刚刚洗过的被单没有晒干，有点发潮，睡在里面很不舒服，周围的一切也不舒坦，使我们难以入眠。但是，我们准备战胜这一切，先从冰冷的被单开始，我们打算用自己的体温将被单焐热。我们的爱情将是不可战胜的。

“狄安娜，只要你活着，我就单独跟你在一起。你要是死了，我当然就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不过，你爱情的影子还会伴随着我。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唉，我亲爱的，我最害怕的是想到我们中间有人会先死。那样一来，另一个人就会感到孤单。想到这里，我就很难过。”

“你得向我起誓，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之间会非常怀念的，狄安娜。你会非常怀念我，我也会非常怀念你。”

“会非常怀念的，我向你起誓。”

“非常怀念，非常怀念……”

接着，她说，真正的尸床是我们单独睡着的时候。我早先曾对她说过，死亡是巨大的通奸，因为那时我们就无法避免让他人占有自己的情侣了。相反，在生活中，出于经验，我想要避免自己露出丝毫占有的目光。尽管我们说了这么一大堆情

意绵绵的话，但我仍不得不看到，我们的关系是不会长久的。我怕真的会爱上了她，真的会把自己这颗心交给狄安娜。虽说我并不想这样，但我却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在这座墨西哥的荒凉的高原小城里，我们相处的第一天夜里，我掩盖住了这种担心，只是说了下面的话：

"我们大家都在组成三角形，"我对她说，"男女一对只是一个不完整的三角，只能算一个角，是一个不完整的图形。"

"诺尔曼·梅勒[①] 写过，现代的男女一对就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再加一个精神病学家组成。"

"早年在斯大林的俄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下的定义是由两个斯达哈诺夫[②] 式的工作者和一部拖拉机组成的永久性的三角形。狄安娜，我们还是说说正经的吧。告诉我，你认为我的看法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在组成三角形，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三角形。"

"我认为，你和我，还有你老婆就是一个三角形。我丈夫、你和我也是一个三角形。"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过，还应该有更具有刺激性的、更秘密的东西……"

她对我看了一眼，仿佛欲言又止，好像对我的看法深表赞许，但同时又一时难以接受……我确实感到（或者说，我试图设想到）她并没有完全摈弃我的那种想法。我觉得，男女双方各自想到自己都有情人，这样更有刺激性。如果我们再找一个第三者（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来同床，那刺激性就更大了。我们或许可以交替着进行：第一夜找个女的和我们同睡，第二夜再找个男的，第三夜又找个女的……

那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真浪漫，但很快我们又转入了两人世界，不再需要找个第三者来加以补充了。我们又回到了那种她曾经表示过的令人喜爱的感情。

---

① 美国当代作家，生于一九二三年，善于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写小说。

② 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想到有些人没能结成一对，真难过。"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这样的。有些人本来可以结成一对，却失之交臂，就像迎面相遇的两条夜航船一样，les couples qui se ratent①，你知道吗？这种情况使我很不好受。你知道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吗？这种事是常有的。"

"这种情况多极了，"我抚摸着她偎依在我胸口的脑袋，说，"这完全是正常的。"

"我们真幸福，我亲爱的，真走运……"

"Désolé，不过，我们的情况是完全正常的。"

"Désolé。"

① 法文：相互错过的伴侣。

八

我们发现中心广场旁边的那家药房，就像福楼拜的那些有关外省人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圣地亚哥社会生活的中心。为了消遣排闷，我们常常去那家药房，看看哪些东西那里有售，而别的地方却没有卖的；哪些东西欧洲或美国有，而那里却没有。那里出售的香水糟极了，完全是本地产的，香气像廉价夜总会散发的气味那样难闻。闻到这种气味后，真想到教堂去闻闻烧香的气味，以净化自己。狄安娜喜欢的那种麦克兰牌牙膏这里有吗？想也不要想。我喜欢的百慕大王家洗发剂呢？我们不得不用福尔汗斯牌和米鲁尔希亚牌的东西。我们这两个习惯于使用外国品牌的消费品的人在这里相遇，真暗暗发笑。墨西哥是个高物价的国家，它的企业全靠国家保护，才免除了国际性的竞争。

一天上午，我单独一人去药房买刮胡子的刀片和用来治疗习惯性便秘的甘油栓剂。一些在圣地亚哥上大学的年轻人在药房门口相遇。其中一人向我走来，对我说，他看过我写的几本书，并认识我。他想告诉我，圣地亚哥的州长和一般的政府官员都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的，而是由革命组织党[1] 在首都任命的。所以，这样一些当官的根本不理解当地的问题，更不了解学生中存在的问题。

① 墨西哥执政党。

“他们以为，我们都是打短工的，好像我们还处在堂波尔菲里奥的那个时期似的，”他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变化。”

“尽管经过了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我说。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他们还是老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样。我们的父母亲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和商人。他们辛劳一世，我们才能进大学学习知识。我们对父母亲说，我们拥有比他们想像的更多的权利。农民能组织合作社，也能叫母亲去磨坊干活，累得要死……”

“不管怎么说吧，她总也能磨不少玉米粉吧，”我的话丝毫也没有引起那个学生发笑。

他继续往下说(我知道他没有任何幽默感)：

“……或者派她去卡车主那里干活。这些人是最凶狠的剥削者。收获的庄稼什么时候送去市场销售，每次送去多少，全由他们决定，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收获的庄稼就这样霉烂掉了。每个工人都有权组织起来，没有理由非要受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那些俗不可耐的头头们的管束。”

“这些话你们要对在这里干活的那些人说说。”

他回答说是。

“也要有人专门跟他们谈谈，提高他们的觉悟。您正好在这儿，但愿您能……”

“我正在写一本书。再说，我也不能连累我的那些美国朋友。他们在这里拍摄电影，不能让他们卷进政治，这样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应该尊重他们。”

“行，那就下次再说吧。”

我跟他握了握手，叫他别送我了。我说，在最近几天找一天空余时间，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喝一杯咖啡。他笑了。他的牙齿很糟糕。不过，他身材高大，举止潇洒，目光忧郁；上唇留

着萨巴塔[①]式的胡子，只是没有往上翘，而且，还是稀稀拉拉的；下巴的胡须也很稀少。

"我叫卡洛斯·奥尔蒂斯。"

"啊，那我们是同名了。"

我这么一说，他很高兴，还对我笑了笑，表示感谢。

晚上，狄安娜和我继续构筑我们的爱巢。我不敢问她，以前跟什么人相好过；她也没有问我，过去有过什么情人。我只是跟她谈过两种想法，一种是我们两人中，一人死后，另一人会不会想念；另一种想法就是三角关系。实际上，在我们关系的这个时期，我们都希望对方是自己唯一的情侣，过去没有过先例，往后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相聚的头几个夜晚都是在先谈后干，或先干后谈的情况下度过的。有时，先交谈一会，再作爱；有时正好相反，但很少两者同时进行。性交时说的话很难进行重复，而且，往往非常粗俗、幼稚，甚至十分肮脏，只有情人才感兴趣。

相反，在圣地亚哥那几天在干那事之前或事后交谈时说的话，却常常道出了我们对身边发生之事的喜悦心情和不同寻常的意义。当我怀里搂着狄安娜·索伦时，我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过去似乎什么也没有写过，爱情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她促使我增强了这样的想法，她仿佛在对我说，我们在创造万物时已认识了，这就是说，早在过去以前，早在衣阿华和衬裙和月亮之前就认识了。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最后，都变成一种愉快的感觉。有时，肌体似乎在呼叫：这一切为什么不同时发生呢？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欲望，是我抱着的强烈的欲望。我要成为捍卫她的肉体和言论的战士。对，但愿一切同时发生……

这一切只在我们身上发生，一切从我们身上开始。这时，文学介入到我们中间。我回忆起普鲁斯特的话："……重新认

---

① 埃米里亚诺·萨巴塔(1877—1919)，一九一一年墨西哥革命领导人之一。

识吉尔贝特，仿佛就在万物创造之时，仿佛根本不存在往事。”普鲁斯特的话和有时从窗口传进来的唱波莱罗舞曲的人（此人的歌喉像鲁乔·加迪卡，歌声是从佣人房间里传过来的）唱的歌词的含意仅仅相差一步：

请别对我发问，
让我细细思忖；
往事并不存在，
我们生下之时，
已经互相认识。

狄安娜一定还没有读过她丈夫伊万·格拉威写的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男女一对能存在下去，是因为他们具有创造精神，或甘于寂寞。如果丢失了创造精神，男女之间就会出问题。

我真愿意将自己设想成为孕育在狄安娜躯体内的胎儿，怕自己出生后，会失去给我提供过营养的母亲。狄安娜像阿尔特弥斯，像西贝莱斯，也像古怪的女神阿斯塔尔黛……

“我喜欢你额头上布满皱纹的样子，”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情时，狄安娜总是这样说。

“可你正好相反，额头一点皱纹也没有……”

“嗨，”她大声地说，“如果你看到我受一天罪，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九

我一到狄安娜租赁的那套新房子,就像十六世纪西班牙的探险队员那样要求给我一间空房间,我就在那间空房内安放了手提打字机、纸张和书。狄安娜微笑着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

"你不打算跟我去摄影棚了?"

"不去了。每天早上八时写到下午一时,这是我的习惯。"

"我想带你去那里让大家看看。我希望让他们见到我和你在一起。"

"很抱歉。每天下午拍完电影,我们再见面吧。"

"跟我相好的男人总跟我去制片厂,"她笑容可掬地说。

"我不能陪你去,狄安娜。一天二十四小时内,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夜里我跟你亲热,白天你就让我写书。否则,我们之间就没法沟通了。就这样吧。"

那时候,我确实出现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克服的创作危机。我早先写的几部小说取得了成绩,因为得到了墨西哥的一批新的读者的承认。他们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或者说,我们不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开头的三四部小说他们都很感兴趣,有时甚至引起强烈的反响。这几本书都被读者们看成是由一个剧烈动荡的、缺乏生气的、以农村为主的封闭的国家,通向城市化的、开放的过分舒适的新社会的桥梁。墨西哥现实中的一个幽灵消失了,代之以另一个幽灵。哪一个幽灵更

好一些？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我永远感谢你，”我第一部小说出版时（当时我需要政府发给我薪金），在外交部工作的一个女同事对我说，“因为你在书中提到了我居住的这条街。过去从来没有在铅字中，在小说里提到过这条街的名字。谢谢你了。”

说真的，在我看来，这几本书的社会性的题材如果没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形式上的革新是不会有真正的价值的。我认为，用来表达思想的方式方法和所表达的思想一样重要，或者说，更加重要。每个作家和从自己周围环境选取的题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和作家自己创造、继承、抄袭或生硬地模仿的各种形式的关系更为密切。每部小说都包含着这样一些特点，它总是从这些喷泉中汲取营养。所以，小说和不纯是姐妹俩，小说和独创则像两亲家。我不想重复开头几部小说取得的成绩。也许我对形式特别喜爱，对题材的选择不太注意。这样的做法犯了错误，因为我有一天终于发现，我的生活底蕴和文学表达手段明显地枯竭了。

我在巴黎、伦敦和威尼斯生活过几年，试图在自己的创作方面找到新的灵感。也许被我找到了，但只是临时性的，那就是对我们大家来说，对欧洲人和对美洲人来说，都已枯竭了的对现代化唱的挽歌。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都得换皮。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大动荡没有对我提供帮助，只是提醒我，青年一代已在另一边，不在我这个于一九六八年这一关键性的年头正好满四十岁的墨西哥作家这一边。这一年在墨西哥城的三文化广场和特拉特洛尔科之夜发生了大屠杀。几百名学生被武装部队和特工人员杀害，而凶手却逍遥法外。这件事使所有的墨西哥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不仅使我们因悲痛而团结起来，结党成派，而且，也根据我们对政府行为是反对抑或赞同，而将我们分成各个集团。何塞·莱布埃尔塔斯[①] 由于参加了革新

① 墨西哥当代作家。

运动进了监狱；马丁·路易斯·古斯曼[①] 则在报刊自由节的一次聚餐会上赞扬了对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总统古斯塔伏·地亚斯·奥尔塔斯。奥克塔维奥·帕斯[②] 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萨尔瓦多·诺沃[③] 则高唱凯歌，对地亚斯·奥尔塔斯和政府机构表示感谢。我在巴黎组织对莱布埃尔塔斯的声援，要求放他出狱，同时，谴责政府使用暴力，对学生的游行示威不作政治上的答复，却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些青年学生都是我在头几本书里探讨过的墨西哥革命[④] 的不折不扣的儿子。这些年轻人受了革命的教育(革命教育他们要相信民主、正义和自由)。现在他们只是要求得到革命教育他们的这些东西，而自诩继承了革命精神的政府却以死亡来回答他们。直到现在为止，官方对屠杀的理由仍然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使国家保持和平和稳定，因为经过二十年的战乱和一个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和专制独裁，国家已被搞得七零八落。我们要发展教育、通讯、医药卫生，促进经济繁荣。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你们应该允许我们将民主往后推延一段时间。今天先取得进步，明天再搞民主。我们保证做到这一点。这仿佛是个协定。

一九六八年被杀害的那些年轻人则要求今天拥有民主。这一要求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它又将生命还给了墨西哥。

我一直希望新一代的作家能将这一切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我却难以使自己避开人们投来的严厉的目光，总认为自己起了帮凶的作用，恨自己眼睛不亮，不能更好地、更直接地参加作为墨西哥现代生活分水岭的一九六八年的那一次运动。我夜里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在那家给受伤的学

---

① 墨西哥当代作家。

② 当代墨西哥诗人，一九九〇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③ 墨西哥当代作家。

④ 指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

生进行治疗的医院里。政府不允许受害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的亲人进入这家医院,没有任何人给受害学生的尸体的脚趾上系上表明他们身份的卡片……

“我们可不允许明天在这里举行五百次葬礼,”一个墨西哥将军说,“如果允许这样做,那我们政府就会下台……”

结果,没有举行任何葬礼,只有一座公墓。我妻子路易莎·古斯曼从墨西哥城给我寄来几封信。从这些信表面看来,她很平静,但内心却暗暗地流露出忧伤。“……当时我在特拉特洛尔科对面的美术联合会的科莫福特剧院排练节目。我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还见到政府军的几架直升飞机在对学生和老百姓进行扫射。屠杀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走出剧院时,学生们朝我身边跑过来。他们对我和其他演员叫叫嚷嚷地说:‘他们在屠杀你们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充满如此恐怖和绝望的呼叫声。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个最恐怖的夜晚。次日,报刊对这件事作了报导,但没有提到使用直升飞机,并只说死了三十人。谁也不明白枪击是如何开始的。年轻人都肯定地说,是那些夹杂在游行队伍中的人先开的枪。之后,还有人见到这些开枪的人和士兵们交换了命令和武器。总之,对这件事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大家心里越来越害怕,不但害怕暴力镇压,而且,害怕这次施行暴力后,以后不知会发生什么。人们如果不为黑暗势力效劳,那又能干些什么呢?……”

我给她回信说,自己准备回墨西哥,以便作更多的参与。我还说,不久前访问了布拉格,世界已改变了面貌,我得做点什么。

“墨西哥可不是布拉格,”路易莎·古斯曼在回信中说,“这一点你是清楚的。中产阶级受了惊,害怕了,现在和政府站在一起。我跟一些司机和地位低下的人交谈过。他们的无知和无动于衷和过去一样,很难说得动他们。他们完全相信电视台和新闻媒体散布的种种谎言,并继续相信那些咄咄逼人的共产主义宣传。我知道,尽管如此,而且,

正因为这样，才要进行斗争。如果中途倒下了，那只能怨自己运气不佳。但是，来到这里自投罗网，落进用来捕捉理想主义者的陷阱里，我觉得也是荒唐的，可悲的，甚至是非常可笑的。学生运动的领袖们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另外，一些领袖被当局用酷刑打个半死。你要回来参与，唯一的可能是转入地下。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背信弃义和贪污腐败已深深地扎下了根。也许有少数年轻人还能经受得住金钱这个糖衣炮弹的轰击，但多数人只能退却。请原谅我的悲观主义，我并不想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只是想让你冷静点，因为你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后，太激动了。这里每天有人在口头上，或写文章指责你是祖国的叛徒。你不应该回来。你是英雄也好，叛徒也好，我觉得都一样。我对谁也不想说什么，这种轻浮地下的结论我已经听够了……”

我是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回国的。一天早晨，我拉着路易莎·古斯曼的手，怀着满腔怒火，眼中噙着泪，走遍了特拉特洛尔科广场。我没有发挥过多的文学想像，只开始准备写一部有关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清唱剧，并准备将对我们所说的祖国（或叫国家、民族）所造成的野蛮的创伤写下来……我们国家的这块土地总是受到了宰割。艾莲娜·波尼亚托夫斯卡和路易斯·冈萨雷斯·德阿尔瓦就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发生的悲剧写了几本重要的书，我只是对他们表示钦佩，并感到他们也替我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这次有幸和一个叫卡洛斯·奥尔蒂斯的学生在圣地亚哥的广场上相遇，再次激起了我在这方面的全部感情。看来，并不是像路易莎·古斯曼说的那样，人们全都隐退了。退避三舍的是我，背叛的也是我，我不能给我妻子的忠诚和耐心以应有的价值。我回到了墨西哥，我想通过爱情的更新来补偿对政治的恐惧和文学的枯竭。我对路易莎的爱情将不会有深入的发展（也许永远不会这样），我准备跟眼下可促使我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有更深入发展的这个女人加深爱情。

我拧断了阿里阿德涅[1]的那根线。我的轻浮是难以原谅的。我多次离开了路易莎，在我的余生中定将为此遭到报应。其实，我也不想给她沉重的打击。也许我过去就应该重建我们之间的爱情。我们之间的爱情能重建吗？或者已经成了巨大的真空，成了谎言，成了周而复始的东西？我曾经拉着她的手，走过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当时我的内心既充满柔情，又感到恐怖。难道我这么做，仅仅是一种借口，为的是确认自己能容忍这种抽象的、一般的、没有具体内涵的爱情？难道我不能真心相爱？难道我制造了这么多桃色事件，只是为了虚假地使自己相信，我能相爱，而实际上却使我感到惶惑？我为什么没有认清她给予我的爱情？她就在我身边。我是了解她的。这种爱也许有些平淡，但是真实的。

特拉特洛尔科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标志（也是我作为作家和恋人的创伤），表明我作品中表达事物本质的东西和文学表现形式已经分离。眼下在圣地亚哥我又打算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出自己的墓穴。尽管内心感到惆怅，但也觉得幸福。和狄安娜在一起产生的激情可以成为我新的起点。如果我文学创作的源泉枯竭了，我从哪里能找到新的源头呢？爱情能给我新的源泉吗？回答取决于这种感情的深度。为此，我离开了家，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准备着再一次遭受到失望的痛苦。现在她请我跟她去摄影棚，整天地看着化妆师给她化妆，理发师给她做发型。看人家拍电影是最烦腻的了。我不想去浪费时间，以我的名义，也以她的名义。

“你和我共同享有一样东西，”一个寒冷的令人生厌的夜晚我对她说，“我们失去了开始的那段时光。无论在电影、文学，还是在爱情上都会失去，你知道……”

“你是在跟一个已经过了二十岁，或者说，不再是二十岁

---

[1] 又叫阿里亚娜，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给雅典国王忒修斯一条线。忒修斯牵着这条线进入克里特迷宫，杀死牛头怪，又沿这条线走出迷宫。

的女人说话，"狄安娜回答说，"I was a has-been at twenty[1]。"

我对她说，英文里"曾经是"，或者"已经不是"这样一些表达方式非常引起我的注意。这些词组表示的意思是大局已定，无可挽回。可是，我比较乐观，并不认为事情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认为，我们的大局还没有定，事情还没有完结。我曾一次次地读过我最喜欢的诗人盖维多[2] 写的一首了不起的诗。狄安娜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盖维多，倒是她的女秘书阿苏塞娜听人说起过，还请我将这首诗重念一遍，并将它译成英文。我们三人便在圣地亚哥那套租赁的房子里，坐在一张用白色铅皮包起来的吃饭桌子边，我念起了诗：

> 昨日已逝，明天未至，
> 今朝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驰；
> 我是一个"既往"，一个"将来"，和一个疲惫的"现在"
> ……

我心情很好地对她说，也许对美国人来说，缺乏的是对死亡的严肃的态度，他们只注意名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看重名誉。早在几百年前，人们就吹吹打打，大肆宣扬不仅个人的，而且集体的名誉和名声。当年安迪·瓦罗尔说过："十五分钟后，我们都可以出名。"我问过狄安娜，她是不是真的相信，二十岁时她的名声已经完结了。她将长着一头金黄色短发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将一只手放在我的心口上，说：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演员，是这么回事……"

"那你就错了，"我安慰她说，"你想不想听我说说作为一个作家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的情况没有明显的不同。"

---

① 英文：我是个早已过了二十岁的女人。

② 戈迈斯·德·盖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诗人。

"如果我们非常相爱的话,能重新开始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狄安娜,"我真的非常感动地对她说。

但这样的时间不长。我倾全力爱狄安娜,对她的感情会持续很久。我相信,她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回报我。对我们两人来说,爱情总是重新开始的机会,尽管就她而言,活下去只是意味着过完那段还没有过的日子,而我却想再过一次过去的日子。不管过得比现在的日子更好还是更坏,我总不想放弃自己过去那种独来独往、四处奔波的生活。狄安娜开始时,电影方面成绩卓著,但很快就不行了,最近拍的几部片子都属一般,平淡无奇。这样,作为一名女影星,她的职业之门就关上了。可这是她每天大清早起来都在从事的职业啊。我躺在床上,看她一听到闹钟响就起床,喝下阿苏塞娜(她是西班牙人,喜欢干眼下的工作;她感到自豪,干得很出色)用精美的托盘端来的咖啡,穿上背心和牛仔裤,就像她在影片中扮演的那个奥尔良少女[①](她发现,对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女人来说,最舒服的时装就是穿得和男人一样)那样,头上包一块三角围巾,在我额头上啪地吻一下后,就走出门去。她走后,我在床上又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回笼觉。醒来后,带着昨晚和狄安娜在一起的美好的回忆,起来洗了个淋浴。在刮脸时,我在思考着自己该写些什么。淋浴器和刮脸刀(就像阿拉伯人和卡斯蒂利亚人一样)是我创作的最好的动力。我看着自己的情人为她的职业严守纪律,作出牺牲,而这个职业连她自己也看不到有什么前程。我就怀着这么个又大又不大的疑团坐下来开始一天的工作:如果狄安娜·索伦干的事并不是她自己想干的,那么,她究竟图的什么?

① 即圣女贞德。

十

圣地亚哥的日子过得非常单调乏味，这已成了我们交谈的共同话题。无论是狄安娜，还是我和女秘书，以及跟我们在一起的其他的人，都一致地认为，圣地亚哥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城市，这似乎已成了众人不可推翻的共识。

过去常常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发电报祝贺新年快乐，眼下她却发了两三个凄凉的电报，内容都一样，归结起来，一个词：HELP![1]

摄制组的人住得比较分散。影片的男主角和他的女伴住在圣地亚哥市郊一座又大又豪华的别墅里。男主角在一系列的电视片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很有名气；电影导演尽管前程似锦，但性格忧郁，他也是通过拍电影成长起来的。摄影师住在市中心一家凄凉的旅馆里。他是英国人，对奥南非常崇拜。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三十年代在演工人戏剧方面很有名望的演员。摄制组的中心人物是男主角和他的女友，以及导演。

"他们为人和蔼可亲，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狄安娜说，"只是我们住得很分散，不可能和他们常常见面。晚上他们爱喝啤酒，打扑克，消磨时光。"

我们却从来不干这些事。我曾问过自己，除了我们亲热亲热外，晚上还能做些什么。狄安娜说，她已邀请影片中扮演

---

① 英文：帮帮忙！救命！

老年人的美国演员莱夫·库伯来和我们一起住。

“你别介意，他已经七十岁，人很聪明。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这个演员的情况我相当了解，因为首先他三十年代演过克里福德·奥德兹的剧作，四十年代演过阿瑟·米勒[①] 的作品，是个很了不起的演员；其次，他是六十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②] 残酷迫害的受害人之一。我最讨厌向当局对自己的同事进行告密的人，害得这些同事砸碎饭碗，没有饭吃，甚至自尽。相反，那些像利里安·赫尔曼说的，不昧着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的人，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库伯的情况很怪，他介于上面说的两种人之间。有人说，他是个完全不问政治的人，他在反美活动委员会上发表的言论没有产生什么危害，因为他提到的那些人的名字早已被别人提到过，或者说，这些人本人早已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这就是说，他在黑名单中没有增添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不过，尽管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出卖什么人，但从道德标准看，他还是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或者说，他至少重复了这些人的名字。当局对他的这一举动作出什么样的评判？反正他在继续拍电影。其他一些人拒绝开口，就再也不能走进摄影棚。我这个人跟美国政界人士毫不相干，但和超越政治的道德界人士看法相一致。我既具左派的信念，却又具有和摩尼教[③] 的教义相对立的个人伦理原则。要区分进行告密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主动的、嗜血成性的、具有报复性或妒忌性的；另一种出于本性的软弱，犯了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实属不易。库伯的态度在道德方面是模棱两可的，他的情况值得进行研究，但不能说他有罪。其实，让我遇到这样的情况，谁也没法保证我本

---

① 克里福德·奥德兹和阿瑟·米勒都是当代美国剧作家。

② 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推行的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法西斯主义。

③ 公元三世纪在波斯兴起的宗教，因其创始人摩尼得名。其根本教义被称为“二宗三际论”。

人就不会干出他那样的事情来。从我本人的智力和道德标准看，我是不赞成他这么做的，但我这个人感情比较脆弱，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你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原谅库伯，就像哪一天别人也得原谅我一样。有些人承认自己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就对我们的弱点表示同情。库伯不应该受到我的指责，相反，应得到我的同情。

不管怎么说吧，我对摄制组的人确实怀有好奇心。狄安娜见我对她提出这方面的问题，说道：

“好莱坞喜欢重用个人经历简单的人。他们要节省时间，我们倒也免得思考问题。他们装作十分客观的样子，实际上，还是稀里糊涂的。那个叫玛丽莲·梦露的姑娘，孤独，忧伤。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母亲发了疯，她自己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像她这样的人结局就像诺尔曼·金·巴克尔那样，吸毒、酗酒、死亡。洛克·赫德森是德克萨斯非常漂亮的卡车司机。他喜欢夜间在公路上自由自在地驾车游荡，碰到小伙子，就谈起同性恋来。好莱坞的人发现他后，就培养他成了明星。他那同性恋就只好暗地里搞了。人们让他进入一间满是摄影机和反光镜的房间里。大家都认为他演技高超，极富有男子汉气概。谁能让人们看清事实真相？死亡，只有死亡。”

她笑了笑，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她没有叫我给她斟酒。

“你不要相信我的个人经历。别人对你这样谈起我的简历时，你不要相信：狄安娜·索伦，是个无足轻重的乡下姑娘。她为了在电影里扮演萧[①]的圣女贞德这个角色，在竞赛中获得了胜利。她是在有一万八千个参赛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她一举成名。她的导演是个真正的性虐待狂，他侮辱她，试图通过残忍的手段使她的演技达到高水平。然而，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却反而使她确信，自己永远当不了大明星。情况确实是这样。狄安娜·索伦不是个了不起的演员。电影制

① 即萧伯纳。

片厂让她演什么角色,她就演什么角色。让观众们相信,她只是个一般性的演员。这么一来,她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免得别人去干扰她……”

我举杯对她说:

“你还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这房子的租赁期还有两个月,”琥珀色玻璃杯后那双灰色(或许是蓝色的吧?)的眼睛消失了。“两个月租赁期到后,请你告诉我。”

十一

有几个夜晚,我们去演主角的那个演员住的房子里吃晚饭。他和自己的女友以及导演住在一起。狄安娜不喜欢那种法伦斯泰尔[①] 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意思是在远离好莱坞的地方过着好莱坞式的生活。这是美国人喜欢离开美国,在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过家里一样的生活这样一种打算的高雅的、却又值得蔑视的、肆无忌惮的翻版。一个普通的美国游客见到完全和自己的家相同的假日旅馆(连毛巾和肥皂也完全一样,放在平时常放的地方;有关情况的介绍和赠阅的杂志也一样)和好莱坞的艺术家会有不同的反应。前者首先会感到吃惊,嘴里会一个劲地说“wonderful[②]”;最后,他会觉得这个世界太迷人了,太难以置信了……美国游客只要能住在家外之家,即使在假日旅馆里每天晚上让他吃同样的饭菜,他也无所谓。对电影艺术家来说,正好相反,因为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司空见惯。见得多了,见怪不怪,已不会使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租房子住(尽管里面的陈设和家里没有两样)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希望这样的日子快点结束。他们只有通过和异性接触、饮酒、聊天等方式来消除内心的烦恼。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不感到吃惊。和异性在一起,表明我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试图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

② 英文:太奇妙了。

们还活着,尽管我们是住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性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性,而酒精却可以对生活起弥补作用。喝醉了,就会有似梦如幻的飘飘然的感觉,就像演主角的那个演员说的那样:“仿佛一切全都浮现在眼前,你们感觉到了吗?只要喝上两杯,往事全都历历在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他女朋友说。

“你喜欢一辈子幸福吗?”演主角的演员托起他女友的下巴,注视着她的双眼问道。

“谁会不喜欢呢,你听到了吗?”

“可你觉得不幸福,是不是?”

“听着,谁觉得幸福了?”

“可你喝酒时,你是幸福的……”

“对,尽管明天早上我要为此付出代价,”她傻笑着说。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喝酒时,不光觉得很舒服……”

“是吗?”

“你还能将所有的幸福的时刻全都集中在一起,仿佛此时此刻你体验到了过去的全部幸福。你发现了吗?”

“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因为谁也没有像你那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

演主角的演员用喉音哈哈大笑,旋即将女友一头红发的脑袋按到他毛茸茸的胸口。他穿一件像斗牛士的披风一样的红衬衫,胸口敞开着,露出一条粗粗的项链。他女友大叫起来:“啊呀,痛死我了,你的项链把我的眉心都快划破了……”

演主角的演员那双眼睛像制成标本的动物眼睛一样。他看着她时,她有些发晕,说她只在乡村俱乐部作为装饰品的鹿脑袋上见到过这样一对眼睛……

性、酒精和闲聊。如果饮酒能使我们感到幸福,那么,同样也使我们能开口说话。例如,谁跟谁睡觉了,睡了多久,为什么;给理利分配了什么角色,从谁那里剥夺了扮演角色的权利;谁将离开摄制组,谁像泡沫一样往上升;谁将流芳百世。

"你以为理利会一直这样干下去?"

"不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他也只比别人干得久一些而已。"

"当然,不会比蒙德·鲁什摩尔干得久。"

"那么,比谁干得久呢?"

"嘉宝干得很久,后来,她急流勇退了。安娜·斯登几乎没有干什么,就被辞退了。路贝·佩莱斯干得倒很久,可是,她不知道该急流勇退。巴伦蒂诺干到三十岁就死了……"

"我认为,最要紧的不是占据了什么位置,而是占据了多少位置。干了多久算不了什么,起作用的是干了些什么。一个人干的时间虽短,但干了许多事,就会名声大噪;相反,如果干的时间很久,但老是担任某一角色,只能是个可怜虫。"

"这也得看媒体给不给你宣传,当然,也取决于个人的才华。"

说到"才华"两字,大家的眼睛变得像玻璃一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不在那里,或者像塞万提斯笔下的玻璃学士一样,成了玻璃人。于是,再次得想到性的问题,以便弄清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重新开始性、酒精、闲聊和流芳百世这样一轮话题。大家又谈起谁能幸存下来,谁能一直干下去。"我们拿起酒杯喝酒吧,我们来聊天吧,我们能一直这样干下去吗?"

我低声对狄安娜说,这一切使我想起美国一种叫"鸡尾酒会"的聚会,实在是太令人讨厌了。参加这种聚会的人每人只允许说两三分钟话,不管你是陌生人,还是亲人、老朋友,都不例外。第一个人还没有讲几句话,大家就看着他,好像他是个玻璃人,透过他可以看到下一个有幸轮到讲两分钟话的人。第二个人还没有开口说话,人们就以冰冷的蔑视的目光看着他,因为第三个人在等着他。说话时,都是一只手拿着酒杯,摇晃着,另一只手拿一根维也纳香肠,香肠外面裹着一块肥猪肉。这就是说,说话的人只能用两个手指头对参加聚会的人挥手致意,而他的嘴像吹喇叭一样鼓鼓的。

“你是怎么去好莱坞的?”我给自己改变了话题。

那天夜里,狄安娜的身上没有闻到油膏的香味,只闻到香皂的气味,身上穿着短裤和白背心。只有我知道在这一身简朴的打扮里隐藏着的激动人心的美好的东西。

她对我讲述了许多事情,有的我已知晓,有的我还不知道。

她是在演萧伯纳的圣女贞德这个角色时被选中的。当时参加竞争的有一万八千人,采用淘汰制(美国喜欢采用这种方式)。就像接力赛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姑娘们全被否决了。有的因为身高不合格;有的鼻子太长,有的又太短;有的脖子太长,有的又太短;有的在银幕里看起来身体太高大。

“一进银幕,人就会显得高大一些。最理想的身材应该是个头小一点,瘦一点。如果你个子长得高,就要苗条点,动作要滑稽一些,就像爱华·加德纳那样;或者神秘一些,就像嘉宝那样;或者像英格丽·褒曼那样很可信。有的女孩子两只眼睛长得漂亮到了极点,可上帝给她的脖子上的皮肤却像吃了可的松那样。有的姑娘身躯长得像维纳斯,可脸却像月亮……”

“你是狄安娜,是月亮的猎手……”

她笑了。

“我进摄影棚的第一天就听人说,一个小个子姑娘在演一个个子高大的角色。人们都在这样议论着。一个著名的英国演员对我非常同情。他对我说,你要先当好演员,才能当好明星。听了这话我很震惊。他是出于好心,出于对我的同情,不像导演对我穷凶极恶,严格得吓人。说到底,导演自以为心里很清楚,萧喜欢什么样的女演员。他只是要求我依照作者的意图办事,将角色演成圣女贞德。至于我是演员,还是明星;我个人就角色而言,是太大还是太小,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你还记得萧是怎么描述圣女贞德的吗?”

我说记得,这部电影我非常喜欢。

“萧将中世纪看成是行为古怪的人的鱼池,圣女贞德则是他最喜爱的一条鱼。她惹得大家都生了气。这是个身穿男装

的女人，这就激怒了封建社会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人。她又自称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又激怒了主教们，因为她认为自己比他们崇高。她给法国国王发号施令，还想侮辱英国国王。她和将军们随意开玩笑，说自己是比他们更优秀的战略家。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不遭火焚呢?”

狄安娜抬起头，接着又说：

“导演对我说，如果圣女贞德对众人，对各国国王、将军、主教和封建领主们有礼貌一些，她就能享受高寿。她是个不会让步，不会妥协的女人，是个色情受虐狂患者。她受罪是想升入天堂。”

她抱着我的脖子，异常激动地、几乎哭泣着对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女人该怎么办呢？退让还是保持自己的完整性？是打算享受高寿，还是年纪轻轻就让火烧死？怎么办？请告诉我，亲爱的。”

我想以幽默的口气对她回答，因为当时我十分激动，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我缺少神圣的精神。我用一个手指做了一个能让众人明白的表示谨慎的手势。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们。我带她走到用木板搭建的露天平台上，下面是悬崖。从沙漠吹来的寒冷的夜风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

“要是让你来给我作导演，那该有多好啊!”她对我微笑着，露出两个小酒窝。

“萧说，圣女贞德像苏格拉底和基督。她被杀害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她说话。”

“我要求让我看看特雷耶导演的《圣女贞德的受难》这部影片，但他们(电影制片厂)不同意。他们怕我受这部电影的影响；也怕一比较，就把我给比下去了。法尔科内蒂演的这个贞德太悲凉了。我没有她那么悲伤，我没有这种感受……”

“你是想让圣女贞德和现实生活贴近一些。”

她探询地对我看了一眼。

“不，我是想让她发疯，应该被火烧死。”

我吃了一惊，问她为什么这样认为。

"是的,所有为正义而进行斗争的人都是疯子。基督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自由、社会主义和为消除种族主义和贫困的斗争也都是疯狂的行为。如果你去为这一切进行辩护,你也发疯了,你也是个巫婆,最后也得被烧死……"

她从来没有用这么悲凉的目光注视过我。仿佛从她那无比明亮的夜间的目光里映现了特雷耶导演的那部黑白影片的各种人物形象:法尔科内蒂在影片中剃光了头,充血的眼睛大得像葡萄;白色的墙壁,穿着黑色长袍的主教;安托宁·阿尔陶那毫无血色的嘴唇……

"安达卢西亚有个年迈的哲学家,名叫玛丽亚·桑布拉诺。她说了下面的话:革命是一种宣告,它活力的大小由它遭到的失败和挫折来衡量。贞德是个革命者,也是个基督徒。"

"糟糕的是,"她突然痛苦地说,"导演并不懂得这一点……这笨伯认为,贞德成为圣徒,是因为她受了罪,不是由于她遭到了众人厌弃,反而感到高兴。"

"是应该烧死她,"我未作过多的思考,便下了结论。

"从理论上说,是应该这样做。导演将我捆绑在木桩上,下令纵火,这个场面都没有拍摄下来。他见到大火慢慢地朝我烧过来。他想见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这样,我就真的成了圣女贞德了。这婊子养的差一点将我活活烧死。大火快烧到木桩时,技术人员将我救了出来。导演感到十分得意。我已受了大罪,成了圣徒。他不让我成为叛逆者。我们都失败了。"

作了这样一番表白后,狄安娜又恢复了平静。

"为了摆脱导演残暴的统治,我和一个有名的作家结了婚。他能镇住那个导演,也能镇住好莱坞的所有电影制片厂。"

"他也使你感到满足了?"

她对我看了一眼,仿佛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成了玻璃人,成了又一个玻璃学士。

"你永远不要说伊万的坏话。"

"我非常敬佩他，"我和颜悦色地笑了笑，说道。

"你讲到他时，永远不要发笑。"

她转过身去，回到了客厅。我跟她回去。那个演主角的演员已喝得酩酊大醉，嘴里不断地重复着"I'm very cross in Vera Cruz, I'm very cross in Vera Cruz"。[1] 他的女朋友在问自己，理利这个正在青云直上的明星会不会继续走红。摄影师说，他有解决住在边远租赁住房里的人们性寂寞的便捷方法，边说，边脱下裤子，露出像巨大的烂梨子一样的生殖器官，嘴里还不停地呼叫着："自尊心万岁！"演主角的演员还在说："very cross in Vera cruz。"他的女友请他不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否则，"我就会离开你。我向你起誓，我会离你而去，另外找个男人。只有做出成绩来的人才会使我相爱……"

"你都看到了吧，"小车将我们送到圣地亚哥市中心时，狄安娜叹了一口气说，"好莱坞什么人都有。不管维生素，还是毒药，你都可以在药房里买到。"

① 英文：在韦拉克鲁斯我真倒楣。

十二

阿苏塞娜是个捉摸不定的人。一开始我就觉得有关她的情况全都是个未知数。首先,当然是她的年龄。她个子又矮又瘦,背像男人一样有点驼。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工作过分紧张造成的。在狄安娜·索伦身边干活,她的工作是没有准的,阿苏塞娜实际上什么活都得干。狄安娜出门,她得给她整理行装;到了目的地,又得给她收拾好行李,将衣物放在适当的地方。她要保证让狄安娜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整整。每天她要负责叫醒狄安娜,给她送来早点,还要给我们安排好每天的饮食。她还要打电话,取机票,预订客房;回电报,邮寄电影明星事先拍摄好的相片(光是照片,每个月不知要寄出多少张);接电话,填写各种申请表。她既是秘书,也是女伴、高等女仆、同事和保镖,怎么叫她才好呢?

阿苏塞娜。她长得不漂亮。她的脸是加泰罗尼亚人的脸,像是用斧头劈出来的,或者像是生在山区里,仿佛用岩石凿成,硬硬的,有棱有角;薄片嘴,嘴角往上翘;长长的鼻子,鼻尖颤抖;眼睛小得只有一条缝,但目光炯炯,露出睿智;下面的眼袋很大。人的模样跟眉毛和发型有很大关系,她的眉毛又浓又弯。头发的形状和颜色很奇特。她的发型既不像男,也不像女,是中性的;头发是黑的。她似乎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信息:我到老也要保持这种头发的颜色和这种发型。我到老也不会让人注意到我在变老,直至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一直就

像我死时那么大年岁。

我总认为，在为拍电影而租赁的这套房子里，只有她和我知道盖维多是什么人。“昨天已逝，明日未至……”我怀着很大的好奇心，总想了解一下她眉毛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人工的样式是一个疑问，它不像发型那样是个中性的宣告，而是一种争论性的挑战，它排除了弯弓形眉毛的惊讶，而只一直留下疑问。

她是西班牙人，所以，我们之间沟通并不困难。这不仅仅由于我们都讲西班牙语，也由于她的气质（关于她的气质，我开始时作了估猜，后来得到了证实）。她整天忙忙碌碌的样子，动作敏捷，下身穿裙子，上身穿衬衣和毛线衣。这是从事她这样职业的女人通常的打扮。从她那两条西班牙人肌肉发达、强壮有力的大腿和粗壮的脚踝，我猜想阿苏塞娜家族的人有不少是务农的，他们有着体面的、值得自豪的劳动传统。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一天，她对我说，她的祖先几世纪前就是埃布罗河（就在波弗莱特修道院边）下游的农民。她的父母亲移居到巴塞罗那，在那里开了一家出售食品的小商店。父母亲让她去学速记，但由于当时西班牙经济状况不佳，年轻人都得干活，养家糊口。阿苏塞娜起先当餐厅侍者；后来，美国人在西班牙拍电影，她被雇用。她认识狄安娜的丈夫……

她似乎有着这种在工作中的尊严感，这尊严感虽然令我们难过，但我们将它与欧洲顽固的阶级系统联系在一起。它也许还要归因于中世纪给职业、职务规定的古老的尊严。当人们知道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世纪和在我们之后的许多世纪里，我们曾经是或将要是车夫、铁匠、泥瓦匠、银匠、客店老板，我们就会给予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工作一种自发的尊严。这种自信（或者是这种天命想法？这种骄傲？）截然不同于社会好动性的现代迷信，截然不同于 upward mobility[①]。“向上方

① 英文：向上方的好动性。

的好动性”使我们变得永远不满于我们所占的地位，永远对那肯定是靠着夺取应当属于我们的位置而已到达高于我们的地位的人怀着嫉妒……阿苏塞娜没有说过这些事，但毫无疑问，她经历过战争和专制独裁，看见过人们被投入监狱和死亡，也知道国民警卫队凶残的大棒的滋味和他们制造的恐怖。然而，人们还是忙着干自己的活儿：耕地、播种、出售莴苣……阿苏塞娜尊重自己的工作。如果她不尊重自己的工作，那谁也不会尊重自己的工作了。她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高高兴兴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发现了差异。我有时也会去拍电影的地方，我在那里不仅见到狄安娜，还会和女理发师和特技演员相遇。我发现他们和其他的演员、技术人员、制片人和导演都心情异常忧郁，但他们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的，将烦恼藏在笑脸的后面。他们好像有开不完的玩笑，这好像是美国人的一个残酷的特征。说俏皮话，插科打诨，幽默诙谐，这似乎是一张巨大的但又是很薄的覆盖在美国广阔无边的土地上的假面具，以掩盖它的居民们的烦恼。这种烦恼的表现是不停地搬迁，不安心居住在一个地方，总是想到别的地方去干这干那。他们看不起眼下在干的事情，每个人无一例外地想干点别的，以表明自己有更大的能耐。美国没有中世纪这个历史阶段。这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巨大差异。当然，也和我们墨西哥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墨西哥人的祖先是阿兹特克人[①]。当然，我们有的祖先也来自地中海，他们有的是腓尼基人，有的是希腊人、罗马人，也有的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都是中世纪西班牙公民。也有的人是从圣地亚哥这条道到达墨西哥的。当然，这不是指眼下在拍电影的这个圣地亚哥，那是指经过拉克泰阿到康波斯特拉的那条道上的圣地亚哥。往后，如果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怪我在解释当代拉美时，对过去的传统追溯得太远，那我一定会反问他们：

“那么，在你们看来，历史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

① 生活在墨西哥土地上的印第安人。

他们一定会回答说，从一七七六年，美国诞生时开始。

美利坚合众国就像从朱庇特的脑袋里生出来的密涅瓦[1]一样，一出世就全副武装，完整无缺，有学问、自由、受人羡慕……它还被赋予社会好动性，总是向上移动，总想多干一点，总想比自己的邻国强。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家。这是它伟大，也是它咄咄逼人之处。

阿苏塞娜既是狄安娜的管家，也是她的看不见的、体面的、平静满足的女佣。有时，人们很难知道她是不是在家里。在圣地亚哥的家中，她走起路来像猫一样轻。一天早晨，她双手捧一只托盘，上面放着早点，走进房间，准备叫醒狄安娜，却发现我们正毫不掩饰地拥抱着。她一时控制不住，托盘掉到了地上。我们听到了声音，笨拙地脱离开。我翻了个身，无意中我的目光与阿苏塞娜的目光相遇，发现她的眼神中有一种想像自己被爱的惶惑。

---

①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十三

每当我跟狄安娜在一起，感情上显得特别难舍难分，特别缠绵，因此失去了戒心时，我会对她提出建议，让她丢开这里的一切，跟我一起去美国大学里工作，因为美国大学有时会聘我去任教。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美国大学里教过书。我把美国大学想像成周围是湖泊，有布满常春藤的图书馆和良好的文具店的田园诗般的地方。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1]能吸引我去的主要原因。在拉丁语国家[2]里，我感到职业上的苦恼。那里纸张的质量很差。纸是我的劳动工具，没有好的纸张等于画家没有颜料，或者说，画家只有画笔，却没有画布。在墨西哥生产的练习本上写字，墨水会渗开；西班牙生产的纸则像老古董，比佩莱斯·加尔多斯[3]写小说时的纸好不了多少。它和羊皮纸算得上是兄弟，只能跟算盘配合着使用。在法国，纸店里缺乏教养的女售货员遇到好奇的作家想摸一摸纸张，闻一闻它的气味，会不让他靠近。

相反，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纸柔软得像丝绸，品种繁多，有各种颜色，而且，作了很好的分类。走进伦敦或纽约的文具店里，仿佛进入文具的天堂，里面各式文具、纸张，琳琅满目，

---

① 即指英语国家。

② 指西班牙语国家。

③ 十九世纪西班牙小说家。

美不胜收。这几年我回墨西哥总带去不少用亮光光的纸做成的记事本,送给我的朋友费尔南多·贝尼脱斯,让他舒舒服服地写他的有关土著居民生活情况的大作,让他写得又痛快又顺畅。麦卡锡主义思想上的排外法律阻止贝尼脱斯进入美国,就连去买几本质量好一点的写作用的记事本也不允许。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了。墨西哥诗人何塞·艾米里奥·巴切科说,买书前,要先将书随意打开,伸长脖子闻一闻书的气味。这奇妙的气味可以和女人乳房和大腿间的气味相媲美。在美国大学巨大的图书馆的书架上,这种书香味儿就扩大成千成百倍了。眼下我邀请狄安娜(我承认,我这样做不太严肃),我带着一种毫无防范的热情一再对她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的一所大学,你还可以出来拍电影……”

她打断我说:

“这样准比在圣地亚哥强。”

我在房间里进行写作时,狄安娜每天告诉我在山上拍摄电影的情况。对此,我很感谢。我最爱听她说的一句话(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是:“我亲爱的,我们要是能在这样的地方活下去,那就成了常胜将军了。还有什么东西能将我们分开呢?我爱你。”可是,现在她却说愿意,住在美国的大学城里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她每年都要回到自己在衣阿华的家乡去过感恩节。这是只有美国人才过的节日。他们过节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追忆自己的祖先,回忆建立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那些清教徒式的人度过的岁月。他们是在英国受到宗教迫害于一六二〇年到普利茅斯的。我戏称他们是美国的首批偷渡者,引起朋友们一阵哄笑。他们哪里来的签证?哪里来的绿卡呢?这些清教徒是移居来美国的劳动者,就像今天偷越美国南部国境寻找工作,迎接他们的是棍棒和子弹的墨西哥人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墨西哥人呢?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宗教、两条胳臂和性侵入了专为白人文明保留的地盘,抢食他们的食物。他们是回归的野蛮人。相反,那些清教徒却受到了文明者的怀念。他们抢夺土地,屠杀印第安人,下令男女隔离,不

许混血通婚。他们实行的是比自己在英国遭到的更加残酷的宗教迫害。他们捕杀自己想像中的巫师、巫婆，实际上这些人却是清白无辜和富足的象征。每年十一月，一只里面填满苹果片、核桃和各种佐料，浇上浓浓的卤汁的火鸡表明，美国对自己的双重目标——清白无辜和富足充满信心。

"你每年是为这个目的回去的吗?"

她作了肯定的回答，说这是她能充当的最好的角色。她想继续成为朴实无华的农村姑娘。她不费劲地怀抱中产阶级价值观，她是怀抱着这样的价值观成长起来的。

"我父母亲就盼我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不费什么劲。我对你说，这是我最好的角色。我扮演得太好了，完全可以获得奥斯卡奖。我又成了农村姑娘了，成了普通百姓了。你说得对。"

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思乡的眼神。

"不管在什么地方，每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过感恩节。"

"他们怎么招待你呢? 我是指你父母亲。"

"他们给我喝葡萄酒，只这么一次。他们认为，让我喝酒，我就会高兴，就不会想念巴黎了。他们将我看成陌生人，是个口心不一的女人。我让他们相信，我还是那个乡村小镇的女孩子。他们拿法国葡萄酒给我喝。他们这样做是想告诉我，他们知道我已和过去不一样了，而他们却还是老样子。"

"他们相信你吗? 你认为他们相信你吗?"

"我们还是来做游戏吧。现在还才晚上八点呢。"

我们自己创造了几种在客厅里做的游戏，消磨晚上的时间。平常做得最多的是说真话游戏。不过，说谎也是很有意思的：给说谎的人亲吻一次。当然，最好还是说真话。说真话的人就在夜里接吻。老演员库伯孤身一人，他不想吻别人，也不想被别人吻。

那天夜里的问题是我提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激情?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我们如果不控制自己的感情,那不就成了山里的野人了? 这点我们是知道的。”他吸了一下鼻子,又歪了歪嘴。这是他在影片里扮演角色时特有的表情。

“不是这个意思,”我解释道,“我是请你们完全根据自己的情况坦率地说说自己的看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遇到能表示个人激情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装作傻瓜随意失去它,或者面对更好的机会,我们就装作没有看见,而这种更好的机会能给我们提供更大的满足……”

“也可能是更大的不满足,”狄安娜插言道。

“你这样说也对,”我说。“我们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说吧,莱夫。”

“好吧。我并不认为,一遇到感情上的冲动,我们就会回复到动物的本性,违反文明社会的法律。但这种情况也确实随时会发生的,无论在性爱问题上,还是在政治问题上。也许最令人害怕的是盲目的未加思索的冲动,它会使我们脱离自己所属的团体,成了背信弃义的人……”

老人说话时,显出很沉痛的样子。我打断了他,却没有发现我已违背了自己的先决条件。我是不想让他这么激动,因为我发现他谈这个问题时,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结合得太紧了……狄安娜好奇地对我看了一眼。她估计我这样做是出于礼貌,避免争论……

“你刚才说这话是指两性方面的事吧? 你是指爱情吧?”

库伯却通过他的眼神告诉我,这不是光指爱情。

“是的,我认为是指爱情。爱情可以使我们离开家族,也会使我们违背部族内部通婚的习俗。部族内部通婚和异族通婚是男女婚配的两种基本习俗。跟本族人相爱,还是跟外族人相爱;保持本族人的血统,还是使血统呈游离状态,我们需要一个准则,即使并非明文规定。这个准则需要肯定、明确:或者你跟本族人通婚,或者和异族人结合;你的子女或属本族人,或者成了异族人;你或者留在父辈的家里,或者出去

闯荡。”

“你们都是出去闯荡的，”我对两个美国人说，“我们墨西哥人都是留在家里的。我们已经将半个国家送给你们了，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向这些地区移民。”

“这你就不用烦心了，”狄安娜笑着说，“加里福尼亚很快又是你们的了。那里的人全都说西班牙语。”

“别扯远了，”我对她说，“回答游戏中的问题吧。”

“你先说吧，女士最后说，”她像只安哥拉猫一样蜷缩起来，脸颊上的两个酒窝从来没有这么深，这么具有暗示性。

“坦白地说，我怕爱情会占去我写作需要的时间。我放弃了不少寻欢作乐的时间，因为我预见到，这么一来，会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什么样的影响呢，你倒说说看，”她的酒窝更深了，几乎显露了轻浮的神情。

“吃醋呀，猜忌呀，误会呀，误解呀，幽会呀，这一切都是很浪费时间的。”

“这么一来，激情也就消失了，”狄安娜摇了摇金黄色的头颅。

“你要是舍得花时间，会献殷勤，那么，没有女人你搞不到手的。上面说的这两条比金钱和美貌还重要。时间啊时间，女人就会吞噬男人的时间。就是这么一回事，得交给她们很多时间。”

“我们之间可没有浪费时间，我们已预见到了这一点，”狄安娜说。她好像端着一只见不到的酒杯在饮酒。

“我真怕最后会没有时间进行写作，”我接着说。“写作是我的爱好。每个作家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自从他坐下来写作的那一刻起，他就和死亡进行斗争。每天死神对着我的耳朵说：‘你又少了一天，你的日子不多了。’”

“还有更糟的呢，”库伯说，“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科学家。他对我说，将来会有这么一天。到了这一天，人生下来后，首先就会有人告诉他，他将会生什么病死去；接着，又告诉他，会

在什么时候死。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另一种游戏了,莱夫。这个问题我们明天谈吧,”我笑着说,“反正在圣地亚哥我们要过好多个漫漫长夜,既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更没有一家正经的饭店……”

我对着狄安娜的眼睛看了一眼。我在乞求她,而不是向她肯定地说,我们还要过好多个夜晚。然而,我的目光未能消去她已洞察一切的眼神。我认为自己说了真话,今夜能得到她一吻吗?狄安娜会吻着我,对我说,你撒了谎吗?她会说,“你喜欢我,你为我放弃了一切。你每天早上进行写作,都是瞎胡闹。你来这里主要是想在晚上和我亲热亲热。我明白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你在这里写的全是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因为你的激情不在那里,它在我的床单上,不在你的书页里。”

“我们是应该这么干,”狄安娜说。

莱夫和我不解地望着她。莱夫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

“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们的激情,绝对没有。给我点饮料喝喝吧。”

我给她斟了一点酒。她说,人生只能潇洒一回。爱情的力量只能出现一次,不会再重现。是力量,而不是机会。她点了几次头,眼睛注视着两只赤脚上那几个涂了颜色的脚趾。这种力量指的是爱情、政治、艺术创作和体育等。它们只出现一次,失去了,就无法将它们找回来了。由于我们不理睬它们,它们就生气地走了。我们不喜欢激情,激情自然也不喜欢我们。

她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将她搂在怀里,抱到床上。她个子小得像个女孩。

十四

我轻轻地将她放在床上。她累了，继续哭泣着。她已习惯于我对她的照料。她认为这是她的要求，我也非常愿意照顾她。她真像个孩子，侧身躺着，轻声地抽噎着。瘦小的身躯微微地摇晃，仿佛在寻求庇护和爱抚。我愿给她庇护和爱抚。我让她翻过身来，仰面躺着，拥抱着她，替她驱除沙漠地区的寒冷。我抚摸着她的头部。我已习惯她演圣女贞德时梳的那种发型(圣女贞德随时准备上战场，准备遭火焚，所以，总留着短发)。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让自己脱落的头发留在枕头上。她的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非常纯净，异常清新。这一切我全都感觉到了，看到了。我想，那天夜里她哭泣的原因是她想到已失去的爱情的机会。这种机会和时刻到来了，但我们却不理不睬，它们便一去不复返了。你想将它们找回来是办不到的，因为这种机会和时光永远地失去了。它们没有变成反复出现的东西。

然而，在她进入似睡非睡状态时，我却抚摸着她的头部，对自己说，凡是我们接受的事物，包括爱情，都是会反复出现的。我微笑着，抚摸着她那一头剪得短短的头发。演了圣女贞德后，她就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惯。狄安娜将永远是这样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像只麻雀，像个黄花闺女，像奥尔良少女、神圣的女战士；小巧的身材，金黄色的头发像个军人一样剪得短短的，免得人们怀疑她的战斗意志，也为了方便地戴上

头盔；剪短了的头发也免得在大火中烧得太久。我默默地对她说，她的光环将献给上帝。夜间燃烧的头发看起来像魔鬼的尾巴。

圣女贞德……激情也好，死亡也好，爱情也好，甚至是神圣的事物，都会变成反复出现的习惯。在圣地亚哥这短短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住的这个房间已成了我的熟悉、习惯的地方，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我的衣服在这里，她的衣服在那里。浴室不大，我们将它进行合理的分配。这就是说，百分之八十的面积归她所有，让她放置各种豪华的化妆品：护肤膏、眉笔、凡立水、油膏、香水、洗发剂、发蜡……我呢，只需小小一块地方让我安放刮胡子刀、刮脸用的油膏、梳子和牙刷就行了。我抱怨墨西哥城卖的高露洁牙膏。那里各种进口牙膏价格昂贵，没有选择的余地。

"为什么？那你喜欢哪一种牙膏呢？"狄安娜问道。

我半当真半开玩笑地对她说，我喜欢在威尼斯用过的"上尉"牌牙膏，这使我回想起当年在哈拉帕时，我祖母在家里自制的那种牙膏。我祖母不相信外面买来的东西，特别像牙膏这样的东西不知在什么地方制造的，也不知是谁制造的，放进嘴里她不放心。她什么东西都喜欢在家里做，不但自己烧菜做饭，连木工活儿、缝缝补补……全都自己动手。"上尉"牌牙膏使我想起了祖母。这种牙膏里面是红色的，外面是白色的，牙膏皮上有个留着本世纪初那种八字胡子的很神气的先生的头像，也许此人就是上尉本人。这样做给产品的传统和质量的可靠性都作了保证。我对自己说，我祖父一定很像这个十九世纪的上尉。我祖母也许会爱上这样一个留着往上翘的八字胡、高高的硬领、宽宽的领带的男人。

"我喜欢'上尉'牌牙膏，"我笑着说。

三天后，狄安娜给了我一个包裹，里面有十支名牌牙膏，她是叫人从意大利捎来的。就这样，在三天时间里，从罗马到洛杉矶，经过墨西哥城，最后到圣地亚哥这个外省小城，我的情人满足了我这个荒唐的、意想不到的要求和愿望。这小小

的几支牙膏，只是我的一点“爱好”，也谈不上是一种追求，却这样放到了我们的卫生间里。我用不到再想要我的意大利牙膏了。它们像是医治牙病的牙医保护神圣阿波洛尼亚从天上给我送来似的。

我看了一眼沉睡中的狄安娜。她眼下正生活在能立即得到满足的世界里。我知道，这样的世界是存在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的年轻人起来造反，含糊不清地说反对消费社会这个暴政。消费社会将购物作为生存的证明。任何一个墨西哥人，即使他世界各地跑得再多，最后还得滞留在消费社会里。墨西哥也是个被需求包围的国家。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世界：任何东西只要想得到，便能立即获得，包括玫瑰色的牙膏。我常对自己说，在拉丁美洲，只有冒险闯入需求的深渊里，艺术才有活力。这当然需要我们付出代价。

三天时间里就从意大利捎来了牙膏。这只是为了满足某种习惯，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愿望，更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古怪的要求。我摇晃了一下脑袋，仿佛为了摆脱或进入狄安娜的梦境。一切都变成了习惯。狄安娜睡在床的右侧，在电话机边。我睡在左侧，旁边有两本书、一个记事本和两根圆珠笔。那天夜里，我躺下后，伸手取来一本书。我抬头一看，目光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目光相遇。我吃了一惊，书跌落在地。习惯被打破了。原来狄安娜在我睡的床边放了一张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相片，他是怀着一片爱心专门送给她的。他那双蓝眼睛毫不含糊的、明快而冷峻的目光像一枚子弹一样向我射过来。他好像在慢吞吞地、有节制地说着话，这种说话的方式更加速了像子弹一样射过来的目光。他嘴里含一根已熄灭了火的雪茄烟，牙齿咬得紧紧的。这仿佛是一张当年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的武士的照片，很像身冒矢石的阿喀琉斯，可他却远离荷马的葡萄酒色的大海而站立着，成了没有水，没有海岸，只有沙漠和干渴的史诗中的人物。没有诗人歌颂这位英雄的光辉事迹。这是他的悲哀之处：没有人歌颂他。克林特·伊斯

特伍德。这个凄苦的英雄黄色的睫毛和眉毛下那双眼睛在盯视着我。原来的习惯被打破了，我应该想到这一点。我应该明白，在狄安娜身边，任何一种习惯都不可能保持很久。她今晚的哭泣是那几次应该哭却没有哭的回忆引起的。

我打算有一天对她问一下这一件事：

“听我说，你是不是只为那几次应该哭而没有哭才哭泣的呀?”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目光阻止我这时将她叫醒，并询问她我已知晓的这件事。她今天哭的原因是因为过去该哭的时候她并没有哭。她不久前在俄勒冈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了一部故事片。那次拍摄的时间相当长，达两个月。当时他们相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权利向她提问，也不能进行打听。她也不能打听有关我的情况。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情人间达成的默契。现代的情人，也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情人，不应该去打听对方过去的情况，诸如跟谁相好过，什么时候相好，关系维持多久。文明的规定是不向对方提任何问题。如果她自己想跟我说些什么，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对她的事我既不表露好奇心，也不露出醋意，当然，也不会显露良好的心情。对这位西部武士的照片我准备保持绝对平静的心态，就像放在床头边保佑我平安的耶稣圣像一样，就随它在那里吧。我绝对没有雅兴去问她为什么。她想说一说有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情况，和为什么他的相片像感恩节的贡品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幽会的这张床的床头，那是她的事。如果凭我一肚子的火气和醋劲儿，我会大吵大叫，会好好地教训教训这个美国小婊子。然而，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能这么任性。这样做，也许正好使她高兴。这样做的结果又会怎样呢?让她生我的气，和我断绝关系，让我离开这里。仅此而已。可是，我对她的真正感情却禁止我做任何有损于我们关系的事，不能使我在她身边这件事处于危险的境地。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我将她过去情人的相片放在一旁，忍受着。我这样做是为了不和她分手。我不想做任何有损于我们良好情意的事

情。可是，她却做了。那张照片是一种挑衅。或者仅仅是一种向我表明的方式，就像她亲自向我表明的那样：我们这次相好之前和相好之后，都还会有和别人相好的可能。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提前中断，但我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会否认我对她强烈的感情吗？我希望永远和她在一起，拥抱着她……

在大发醋劲和断绝关系之间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保持平静，狡辩，文明地作出反应，装作不知有这件事的样子。非常 sans façon[①] 地对待这件事。如果她想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相片挂满整个房间，那就让她这么做吧。我只是将她看作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爱挑衅的小姑娘，看作一个爱开玩笑，或者神经有点毛病的人。她的毛病完全可以被我的耐心和文明成熟的举动治好。我比她大十岁。狄安娜如果对我伸出舌头，我一定吸吮它。

然而，我却无法平静地入睡，我的解释也无法使自己满意。这种解释太简单了，应该还有更复杂的东西。那天清晨五点她醒来，和平时一样要我和她作爱时，我的反应是非常呆板的。完事后，她裹着被单，从床上起来。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又相遇了。他好像在对我说：

“先生，您已寻欢作乐了两星期，您打算什么时候也让我快乐一下呢？”

---

① 法文：随便，随意。

十五

毋庸赘言，那天上午，我连一行字也没有写成。我自己的爱情已神秘地复杂化了，怎么还能去写埃尔南·科尔特斯[①]和拉马林切之间的爱情呢？这个粗暴的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人和被俘的塔巴斯科王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情意呢？除了通过两性关系结成政治联盟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呢？除了肉体关系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吗？狄安娜已去马德雷山拍摄电影了，我在细细思忖着。显然，我并没有给她快乐，我只将欢乐给了自己。

我在短时间内曾认为，自己像所有的男人，特别像拉丁美洲男人一样，只追求个人一时的满足，却丝毫也不顾及女方的快意。我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评判，立即认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对狄安娜·索伦也是非常热情、非常关切的。我的耐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爱情也是如此。我很想使她感到愉快，只是她的欲望也实在太强烈，以致难以使她满足。如果她认为我今天早晨和她作爱时，只是为了使自己快活，往她身上一趴，发泄完了就了事，那就与事实不符了。我每次干那事之前，总要有个“前奏”，先对她爱抚一番，这是两性关系的礼节，目的是让女方也得到满足，让她达到性欲的高潮……一个真正的情人应该善于让男女双方都得到快意，最大限度地得到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的将军。

满足。真正的爱情是双方都十分协调的，协调得像一个人一样……

有时她自己就要我像同性恋一样和她作爱。这一般是通过这样两种方式进行的。我先让她趴在床上，然后从她背后插入阴道；另一种方式是在她肛门涂上润滑剂，拼命往里插，有时差一点将她的肛门都撕裂了。涂的油膏是我给她的。一天夜里，我拿香槟浇她，弄得我们两人全身都是，引起哈哈大笑。上文已经讲过，她也使用水果香味的阴道膏。我用男用洗涤剂涂在她的腋下和大腿间，她也偷偷地将她的香水涂在我的耳后，使我老是闻到这种香味。我有时用我刮胡子的油膏涂在她脸上，将她涂成放在家里的维纳斯女神像一样。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无所事事，我竟将她的腋毛和阴毛都剃下来，放在一只废弃的果酱瓶里……

想起过去干的种种傻事，忍俊不禁。这时，我想起了本·琼森写的喜剧中一个叫波尔波纳的百万富翁。这个好色的人在临终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喜欢女人，也喜欢男人，只要有性器官的人我都喜欢……"

难道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个吗？狄安娜是想再找个男人来一起干吗？她是想三个人一起玩儿？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谁呢？是那个演特技的演员吗？如果她喜欢他，那么，为什么要让我中间插进来呢？她单独和他在一起，不是更好吗？我觉得跟那个老演员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究竟跟谁呢？……

镜子，也许我们还没有利用镜子干那玩意儿呢。

我不敢这样想下去，因为我一看壁橱门上的那面镜子，便见到了演牛仔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反射过来的目光。我立即明白了，知道狄安娜在想什么了。

那天夜里，我们脱光衣服上床后，我觉得她的身躯很凉，便问她有没有作爱的愿望。

"你为什么不问我，我是不是喜欢和你作爱呢？"说完，她裹着被单，将自己的身躯缩成一团。

“那好，我现在就来问你。”

“问什么？”

“你是不是喜欢和我作爱？”

“傻瓜，”她笑起来神采飞扬，两只酒窝深深地露了出来。

“我喜欢以和你性交过的所有男人的名义和你作爱，”我突然对着她的耳根说。

“别这么说，”她微微地发抖。

我搂住了她的腰。

“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对你说。”

“我们是自由的，你我之间什么也不用顾忌。”

“你有使我喜欢的东西。你想我们拥抱时，单独在一起吗？”

“现在我们难道不是单独在一起吗？”

“不是的。我们躺下时，我仿佛觉得从你身上过去许多男人，从你第一个男友到你所有的现在不在这里，但还在起作用的情人……”

我偷眼看了一下《为了一把美元》杂志上的明星照，身上一阵寒战。

“说下去，说下去……”

这时，我已不知自己两只手在做什么，我只知道自己说的话。

“两性关系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吗？”

“不，不……”

“你喜欢不喜欢知道，我拥抱你的时候，脑子里在想着享用过你的所有的男人？”

“你敢这样对我说？”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狄安娜？你不喜欢这样？”

“请你不要对我这样说。”

“如果我这样对你说，你不会感到失望？”

“不会，”她几乎嚷着说，“不会，我喜欢……”

“你是喜欢想跟我睡觉时，和你有过关系的所有的男人也

在跟你睡觉,是吗?”

“我喜欢,我喜欢……”

“我原来以为你不喜欢呢……”

“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觉得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那我们为什么不敢用这样的办法取乐呢? 如果我们喜欢这么做的话?”

“用什么办法? 你说什么?”

“就用这种办法:我要使你想,我是另一个男人,你想像着,我是另一个人……”

“对,我喜欢这样,我都要疯了,快说下去……”

“我希望你所有的情人都在这里,看着我们,看到我抱着你,你也……”

“对,我也希望这样,别停下来,快说下去……”

“你还不感到舒服……”

“今天你使的劲儿真大……”

“忍住点儿,狄安娜,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全都从这面镜子看着我们。他们是在嫉忌我们……”

“告诉我,你也喜欢他们看着我们……”

“你试图让我们单独干这事,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完事后,她对我侧过身来,闭上她那双灰色的(也可能是蓝色的)眼睛,对我说:

“你太缺乏想像力了。”

十六

不管怎么说，我活了这大半辈子，就是为了写作。文学对我来说，几乎从童年开始，就是一生经历的过滤器。从害怕父亲的打骂，到前天晚上的作爱，无论是两性关系，还是政治活动和心灵的活动，对我来说，都是文学的经历。个人的生活经历写成书后，就显得更精彩，更有力量。也许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或者说，实际上正好相反：文学的想像是决定、产生我生活的其他"现实"情况的决定因素。不过，如果真的如此，那我就不了解自己了。我确实想知道，对我来说，现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说，它是由三度空间中的一个方面来确定的。对有些人来说，现实只是客观的具体的世界：椅子就是椅子；山总是在那里；云虽然会飘来飘去，但它是服从物理定律的。这一切就是现实。另一些人则认为，现实只是内在的、主观的东西。人的头脑是一个没有陈设的巨大的房间。随着岁月的流逝，从观念这个家具库里取出家具，慢慢地在这个房间里摆满了家具。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但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头脑的筛选，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主观给无声的具有一致性的客观世界以现实性。我作为个人是通过第三度空间和其他的人、和社会、和我的文化进行接触联系的。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集体的个人，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可能。处于这样的状态，我才感到自己更有成就，更感到满意，和周围世界也更协调一致。也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我才有了自己的

家、女人、两性关系和朋友。……这就是说，对我来说，现实是一颗有三只角的星星：物质、精神和文化。物质现实、主观现实和我个人与世界相接触的现实。这三个方面我不喜欢牺牲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只有这三方面全都具备了，我才可以说，我很幸福。

我们夜间在客厅里的游戏继续进行着，其中的一种叫拼字游戏，就是用写上字母的卡片拼英文单词。先在木板上随意抽取几张卡片，然后，用卡片上的字母组成单词，谁组的单词多，谁就赢。用字母组成单词，语言不同，组的单词也不同。西班牙语的单词元音多，英语的情况正好相反，辅音多。英语里像“W”、“SH”、“TT”、“MM”或“SS”这样的字母或字母的组合，在西班牙文里就没法理解了。反过来说，西班牙语里“Ñ”这个字母对外国人来说，也是非常头疼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西班牙人荒唐古怪的东西，像宗教裁判所一样，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然而，实际上这个很有前途的字母和法语中的“GN”相当，也和葡萄牙文中的“NH”以及难发的英语中的“NY”相似。这一个字母就抵上了上述语言中的两个字母。

狄安娜、莱夫和我三人就像和睦相处的一家人一样用英文字母玩着游戏，消遣解闷。虽说我精通英语，但它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我也不是英语国家的人。我从来没有用英语作过梦。我讲英语时，得在脑子里迅速将西班牙语译成英语。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说的英语里有许多从西班牙语里借用的词，也有不少源于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的词组，这些词组比来自撒克逊语和日耳曼语的词组要多。那天晚上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我面前出现了“wheel”(轮子)这个词，下面有五个空格，要我再组一个词，这样可以赢得不少分。可我只想起了“wheelbarrow”(手推车)这个词，因为我有时候爱哼哼爱尔兰的歌曲《莫里·马罗纳》，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她推着手推车，走过大街小巷。”可是，这个词需要六个空格，再说，我手上也没有拼这个词需要的字母。我只好说“过”，由莱夫接下去

拼词。他很快想到了"house"[1],组成了英文词"wheelhouse"(舵手室)。我说,我不认识这个词。狄安娜嘲笑般对我看了一眼,随即使劲地将我放在纸板上的那些字母全都翻过来,向我表明,我本来可以用"chair"[2] 来填满五个空格,组成"wheel-chair"这个词,意思是"轮椅"。

"就你这个样子还想到美国大学去教书?"她那讥讽的语气令人难以容忍。"你可要当心啊,还是让美国大学生来教你吧。"

"他们真的什么都知道? 还是仅仅是自以为什么都知道?"

"他们知道得比你多,这点你可以肯定,"狄安娜说。莱夫低下头,说我们继续做游戏吧。

接下去还是由莱夫·库伯提议,说我们换一种游戏做吧,以度过单调乏味的夜晚。他说,我们可以设想自己就是瑞普·范·温克尔,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后,国家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说的国家指墨西哥,还是美国?"我问道。我的意思是向他们表明,世界上不止有一个国家。

他们对我看了一眼,仿佛以为我脑子真的有了毛病。

话匣子一打开,库伯不可避免地转到了使美国人非常感兴趣的美国是不是无辜的这个话题上。我总是在问自己,他们什么时候是无辜的呢? 是在屠杀印第安人的时候? 是在他们施展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洲际扩张野心并以为这是天命的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 在墨西哥,我们对那些不向温菲尔德·司科特将军率领的侵略军投降,宁可从查布尔特佩克要塞顶上跳下来自尽的军校学生表示敬意。这些拒绝将国旗交给"无辜"的侵略者的年轻人难道都是邪恶之徒? 美国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它的无辜呢? 是在剥削黑奴劳动的时候? 是在南北战争时期互相残杀的时候? 是在剥削童工和移民并以无疑是

---

① 英语:"房子"。

② "椅子"。

无辜的手段积聚巨大财富的时候？是在蹂躏诸如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这样一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国家的时候？是在将炸弹投向广岛的时候？是在麦卡锡和他的行动小组仅仅由于某种暗示和怀疑而使生灵涂炭的时候？是在他们用毒气毁坏印度尼西亚原始森林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发笑，但嘴里没有说出我对有关瑞普·范·温克尔的游戏提出的问题可能作出的回答。是的，也许美国在越南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是无辜的，就像美国空军司令库铁斯·勒·梅说的："轰炸越南等于回到了穴居时代。"一个从来没有在战争中吃过败仗的国家，却输给了一个亚洲的穷国，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种族主义者的眼中又是人种上劣等的黄种人，实在令人吃惊。

两个美国人说了不少话。我呢，也许由于他们都是演员，心里想，这大名鼎鼎的"无辜论"只是一种设想，一种自我安慰。这种设想特别是由电影促成的。至于文学，从一开始，就从霍桑[①] 的折磨人的清教主义开始，经过爱伦·坡[②] 的夜间噩梦到亨利·詹姆斯[③] 的白昼噩梦，都没有讲到无辜的问题，只是讲到对每个人内在具有的黑暗势力的恐惧。具有敌意的"我"是《梦地》的主人公。这几乎成了优秀文学的定义，成了具有敌意的"我"的史诗……我不知道汤姆·索耶和哈克贝里·费恩[④] 是不是真的天真无辜的，或者仅仅是一种作者田园诗一般的良好愿望而已。根据这种良好的愿望，这两个人物在与家庭(例如汤姆)和河流(例如哈克贝里)的接触过程中，暂时忘记了发财致富、趾高气扬、欺压弱者的神灵赋予的权利。总的说，马克·吐温的作品并不宣扬无辜，他只是个讽刺作家。而讽刺呢，根据它现代创始人基尔凯戈尔[⑤] 的说法，是应该

---

① 美国十九世纪小说家。

② 美国十九世纪小说家、诗人。他的小说属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

③ 美国十九世纪作家。

④ 汤姆和哈克贝里分别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⑤ 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神学家。

加以否定的。他认为，讽刺是“一种反常的发展……就像斯特拉斯堡[1] 的鹅肝一样，会害死人命的。”不过，讽刺也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方式，因为它限制、限定、去除和惩罚我们自以为是，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那些东西。

美国电影确实丝毫也不进行讽刺地鼓吹“无辜论”的神话。我小时候看过的影片都是农村的人物，他们来自乡村小镇，后来到了大城市，冒着巨大的危险，和性（如里连·基什）、和火车头（如布斯特·基顿）、和摩天大楼（如哈罗德·劳埃德）斗争。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看到从感情上看是很纯洁的影片，觉得是一种享受，像弗兰克·卡普拉的电影，讲一个叫德兹先生或叫史密斯先生的勇敢的吉诃德式的人物，以他的天真无邪战胜了腐朽和谎言的力量。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可以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道主义道德政治相匹配。由于爆发了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它不但不是无辜的，而且是邪恶的）进行了斗争，美国人（我们也和他们在一起）完全相信了无辜论的神话。他们认为，凭着自己的本领，两次拯救了世界，打败了邪恶势力，发现并消灭了德皇和希特勒这些极卑鄙的坏蛋。我不知多少次听到过各色各样的美国人说过：“这个世纪我们两次拯救了欧洲。他们应该感恩不尽了。”在他们看来，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国际小说”中说的那样，欧洲是腐败的，而美国是纯洁的。我不信世界上还会有另一个国家，尤其是像美国一样的强国，会像美国那样自以为纯洁无辜，或者会像它那样有意地在这方面进行显示。无论是虚伪的英国人、厚颜无耻的法国人、骄傲自大的德国人（这些丝毫不懂得讽刺的无罪而自行惩罚的德国人）或凶暴的（或令人心酸的）俄国人都不会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纯洁无辜的。美国还宣称，自己的对外政策完全是无私的，几乎是一种慈善的举动。这种说法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当然也包括美国），都是与事实不符的，因此，谁也不会相信。可是，美国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

① 法国一城市。

也使不少人引起认识上的模糊。其实,人们也都明白,美国外交政策遵循的是什么样的利益。他们所无私追求的只是所谓的民主和自由,进行“自我拯救”。

我设想狄安娜小时候在她家乡衣阿华的教堂里听路德宗牧师讲道时的情景。当牧师在她小小年纪的头脑里灌输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都是受到谴责的,是不被接受的,只有耶稣(耶稣自己也没有被接受,所以,他为我们的罪孽死去时,有人就很高兴)收容他们这样的说教时,她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样的教义不是要我们一辈子为耶稣的信仰进行辩护吗?或者说,我们是完全无罪的了,因为我们的罪孽已经在各各他[1]给赎了。

我这么一想,便将老演员的话丢在一边了。他说的瑞普·范·温克尔已经醒来。醒来后,他不认识华盛顿和杰弗逊建立的国家了。莱夫·库伯见到了他亲眼见到的东西。他像清教徒一样认为有必要找到一个能见得到的、能说得出名字的、没有任何疑问的敌人。美国的毛病就是固执地认为,世界分为好人和坏人两部分。库伯常常说,如果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进行斗争,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无法平静地生活。但这次他并没有说出这方面的想法。他只是说,为了保护好人,也得承认坏人。瑞普·范·温克尔醒来后,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好人为了保护自己,也装成坏人的样子了。麦卡锡不再去迫害那些他认为已转入地下的共产党人。他现在使用维辛斯基在苏联只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同样的方法来迫害、凌辱民主党人了。“遭到麦卡锡主义、反美活动委员会和今天开设的其他各种像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法庭迫害的人反倒是像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这样一些人了,”库伯非常沮丧地说。“我们是在自己判决自己。瑞普·范·温克尔真想钻进树洞里,再睡它二十年。可是,他明白,当他再次醒来时,见到的一切还是老样子。”

“这么说,这个国家还是没有达到它理想的高度?”我问和

---

① 耶稣殉难处。

我做游戏的两个伙伴。

“是这样的，”库伯回答说，“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理想的高度。不过，其他国家都是杂乱无章的，而我们是有理想的。这点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总是站在好的这一方面的。我们在哪里，好的方面也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就会发疯。”

“我们永远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家园，”狄安娜非常真诚地说。

我回想起当时她坐在一块小地毯上，交叉着两条腿，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

“托马斯·沃尔夫[1] 有一部小说，标题是 You can't go home again…[2] 你再也不能回家……这是所有美国文学最真实的标题……你离家后，就永远回不去了……”狄安娜对刚才这句话作了补充，她的目光显得很疲惫。

我用目光询问她，她说的是不是她自己的情况，她摇了摇头。

她说，在法国住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发现在加里福尼亚、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新一代美国人。他们愿意献出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但人们不让他们这样做。刚刚过去的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之间理想的对比是很强烈的。另外，她还发现执政的那些人的贪污腐败、弥天大谎和全国各地爆发的暴力行动……狄安娜那天晚上将人们脑子里想的全都说了出来。她讲的都是事实，就像是个中西部的姑娘，和瑞普·范·温克尔一样，去巴黎睡了二十年，回到了美国，正好遇到了六十年代的风暴：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遇害，成千上万来自农村小城镇的年轻小伙子死于亚洲的丛林中，死在越南的战场上，吸毒的士兵们……这些年轻人死得毫无意义，他们是去白白送死的，幸好上前线的不是白人青年，而是黑人和美国的

---

① 美国当代小说家。

② 英文：你再也不能回家。

墨西哥人。他们充当了炮灰。美国国内有一群骗子谎言连篇，说这样做是为了扼制中国，拯救越南的民主，免得多米诺骨牌倒下……约翰逊、尼克松这些人发出来的虚伪的巨大声音只能促使整个一代人的觉醒，结果，肯塔基州的学生起来暴动，拿机枪进行扫射；芝加哥的游行示威者拿石块和军警进行对抗；黑豹党[1] 人遭到了监禁。“这一切都是为什么？”狄安娜突然提高了嗓门，仿佛她自己真的大梦初醒。“不是为了创造财富，不是为了普遍地腐败，当然，成百家承包商和几十家为国防效劳的大公司发了财。这点连我这样的人也清楚。这些家伙的能量大得使人难以理解。他们热爱自己的权力，相信自己的权力既重要，也能持久。天哪，这些白痴认为，他们的权力最要紧，殊不知真正要紧的是那些被派到亚洲原始森林里白白送死的年轻人的生命。这些疯狂的年轻人为了表明他们在那里是对的，点火烧毁了村庄，杀害了当地的百姓。如果不那么干，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不那么干，他们的冲锋枪（生产这些枪支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就业机会）又有什么用呢？这些冲锋枪不是为林顿·约翰逊、为理查德·尼克松、为谎言女神、为婊子政权撑了腰吗？”狄安娜·索伦仿佛从悬崖上走下去，她的声音好像落到了奇异的、空荡荡的深渊里。她似乎只要能不闻不问她永远也没法回去的家园里发生的事情，打算再回去沉睡二十年……美洲的事情是在她梦外发生的。

她按了一下收录机的开关，立即出现了何塞·菲里西亚诺的声音，他唱的歌叫《小娘们，给我点火》。库伯恼火起来，关了收录机。他嘲弄地模仿菲里西亚诺的腔调。我们听了都躺倒在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这是白痴的野蛮的音乐，小娘们，给我点火，”他做了一个摹拟的动作后，便请求告退，准备回房去睡觉。

---

① 黑豹党是美国黑人以极端战斗精神在美国建立黑人权力的组织。

十七

我整天地坐在家里进行写作，感到厌倦了，一天上午，突然出其不意地来到拍摄电影的地方。狄安娜并没有因我事先没有通知她而生气。她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还将我介绍给所有在场的人。她还请我在用汽车拖的活动房子里喝咖啡。这活动房子我们在墨西哥楚鲁布斯科电影制片厂用过。她用狡黠的眼神对我说："眼下我们可就不必像当初那样使用这玩意儿了。""为什么不呢?"我回答说。

我们走出活动房子时，那女化妆师和女美容师都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她。导演也着急。阴沉沉的天好像很快会出太阳。导演闭着一只眼睛，皱着半边脸，通过一台精密的、神秘的仪器望着天空，仿佛在等待上苍的指示，是不是要出去拍摄。他是想抓紧时间拍片，好为公司节省一点经费。毫无疑问，影片公司拍电影完全靠老天的恩施和保佑。

圣地亚哥山上的自然景色随着时隐时现的阳光而变幻莫测。我从平原走向高山，阳光被高山挡住，平原笼罩着巨大的阴影。几个孩子在草地上踢足球。那场面很好笑，临时划上线条的足球场遭到羊群的侵入。于是，那几个乡村足球队员只好停止比赛，变回成原先的牧羊人来了。那是一群毛茸茸的绵羊，卷曲的羊毛犹如古代英国官员头上戴的肮脏的假发。它们急匆匆地从山上下来，走进临时足球场。踢足球的人便对照看羊群的那个孩子吹口哨、谩骂。其中一人向他扑过去，

夺过他的棍棒，向他打去。我赶忙过去将他拦住，并将他们分开，说那个踢足球的男孩长得比羊倌高大，他那样做也太过分了。其他几个踢足球的男孩正在找羊群出气，我也过去对他们进行劝说：

“别打这孩子和羊群了，这也不能怪他嘛。”

“怎么不怪他？”踢足球的那个高个子说，“他太狂妄了。”“他狂什么呀？”“他当过贝尼托·胡亚雷斯[①]。”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很奇怪，先是哈哈一笑，随后又感到万分好奇。我细细地对那个被打的孩子看了一眼，看他的样子也不过十二三岁，长相完全是土著人，两颊就像两片敲碎的瓦罐，双眼眼白很多，露出忧伤的眼神，这像是经历了好几个世纪遗传下来的。他身上穿一件衬衣，头戴棕榈叶编的帽子，脚穿凉鞋，完全是放羊娃的打扮。看他的模样，真和少年时期的贝尼托·胡亚雷斯完全一样。听说胡亚雷斯到十二岁还不会说西班牙语，是个一字不识的牧羊人。以后的情况诸位一定知道了。他当过墨西哥总统，战胜了马克西米里亚诺[②] 和法国人，在美洲是个功勋卓著的人。他还创造了许多警句。在墨西哥上百个城市的许许多多广场上都有他的雕像。胡亚雷斯生下来仿佛就是为了给人塑像似的。这孩子就是制像的模特儿。

我送给孩子一瓶可口可乐。我们一起朝拍摄电影的现场走去。

“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呢？”

“因为我当过胡亚雷斯，他们不高兴。”

“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一年前，英国有家电视公司来这里摄制一部故事

---

① 贝尼托·胡亚雷斯(1806—1872)，墨西哥印第安族政治家，曾两度当选为墨西哥总统。

② 公元一八六四年法国军队占领墨西哥，马克西米里亚诺被任命为墨西哥皇帝，后被胡亚雷斯率领的起义军击败，当了俘虏，并被处死。

片，请他演孩提时代放羊的胡亚雷斯。他只要赶着羊群，在摄影机前走过，就完事了。电视公司给了他十美元作为酬金。别的孩子都在一边看着他。他将赚来的钱买可口可乐给他们喝，剩下的大部分钱就给他父亲了。孩子们都嫉妒他，他们抓住他，使劲地摇晃，并不再理睬他。他问那些英国人，什么时候电影能拍成，他能不能看。他们回答说，一年内可摄制完毕。到时，报上会出广告，电视节目报上也会刊登这方面的消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那些孩子。结果，他们又抓住他的衣领摇晃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在电影里见到你，贝尼托？他们要让你当电影明星了，贝尼托；如果只是谣言怎么办，贝尼托？"

他问我是不是知道那部影片已经举行了首映式，什么时候能在圣地亚哥看到这部电影。如果在圣地亚哥开始放映这部片子，那些小家伙就不会胡言乱语了。

我对他说，对这些事我一无所知。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部影片。

放羊娃紧闭着嘴，一瓶可口可乐只喝了一半。他向我告辞，去照看羊群。

我来到了拍摄电影的现场。特技演员正在摄影机前驯服一匹野马。他穿着演主角那个演员穿的衣服，后者坐在一张折叠椅上喝着饮料，注视着他。导演下令打一枪，让那匹马驹发起野性来，特技演员便开始驯服它。狄安娜坐在主要演员的一旁，特技演员用目光寻找她。导演便叫他停下来，呵斥他，叫他不要朝演员们看，他的演出没有必要得到谁的认可。他应该明白，他是一个人在墨西哥的山上驯服一匹野马。在这样的高度他难道不知道有一种舞台的幻觉，即否认舞台的第四面墙，也就是朝向观众，朝向一座城市，朝向全世界，朝向魔术的那面墙。导演说得越加雄辩。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李·斯特拉斯堡的艺术的门徒，只是没落到(或者如他自己认为的，被推崇到)这样一种艺术的创造者的位置上，在这种艺术中，艺术从来也不应当使自己受重

视。“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协定。在一个布纽埃尔，一个福特，一个希区柯克的手中，这是最好的协定：用一种艺术将一切都说出来，这艺术因为太优秀太强烈，而不显露出来，因为它用技术处理的纯洁淡化了自己。一种和目光极相似的艺术。”

特技演员没有将导演的话当真。他笑了笑，大声地说：

“请那位墨西哥作家来驯马吧。他们墨西哥人都是骑马的高手。”

“不行，”我也大声地回答说，“我不会骑马。可你也不会写一本书。”

他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或者说，他的反应太迟钝了。这一天他接着干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如移动活动房子，捆扎电线，搬运机器，给马上马具，试射步枪，大声地数着作礼炮用的枪弹。他干这一切好像是为了给我留下他办事能干的好印象。而我既不会开车，也不会更换轮胎。然而，他向我显示这方面的才能反倒使我得到安慰。我记得有一次女理发师对我说过，从俄勒冈起，这特技演员就在追求狄安娜。我在圣地亚哥进行写作时，心里老是有怀疑，总想像着他和狄安娜待在活动房子里干些什么。眼下见他只会吹牛，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对手。我确信他连碰也没有碰过狄安娜。

回圣地亚哥的路上，狄安娜偎依在我的肩膀上，抚摸着我的指甲，逗得我心里痒痒的。我们的汽车驶过扮演过胡亚雷斯的那个男孩的身边，我将他扮演胡亚雷斯的事告诉了狄安娜。

“那你是怎样对他说的呢？”

“我对他说了真话，我对那部电影的事一无所知。”

她用鼻音哼了一声，随即松开我的指甲，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你这样做很不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怎么会明白呢？你这个人只会吃现成饭，你不明白什

么是斗争,摆脱困境……"

"狄安娜……"

"你当时应该对他说,你知道这部电影的情况,明白吗?你应该告诉她,你看过这部影片,这是一部好电影,在各地放映,反应良好。而且,很快就会在圣地亚哥放映了。这样,他那些朋友就无话可说了……"

"可这仅仅是幻想而已……"

"电影本来是一种幻想嘛,"仿佛是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声音在叫唤。

"可是,我不想给那个孩子那样的人虚假的希望。这样会更糟。我可以向你起誓,这样会更不好。他会完全失望的。"

"我以为,我们应该拉他一把。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都需要别人帮助我们……"

"你是说,需要给点周济……"

"对,你说得对,是需要给点周济……"

"可不能让他当乞丐呀。我讨厌救济,讨厌慈善事业……"

她仿佛会烧伤自己般脱离了我的接触。她自己身上好像是冰冷的。

"明天我就去找那个孩子。"

"我告诉你吧,你这样做反会使他更倒楣。"

"我去找那部电影,我要将它搞到这里来放映,让那孩子、他家里的人和他的朋友们看看。"

"狄安娜,这么一来,他们会更恨他,会更加妒忌他。不会再有电影……"

"你这个人也太缺乏想像力了。告诉你吧,你完全没有想像力,也不会进行比较……"

"对你来说,什么事情都像从意大利带几支牙膏来那么方便……"

我们转过身去,细细地看着窗外那乏味的、没有色彩的景色。

十八

“你让门开着了。”

“你错了。瞧，门已经关上了。”

“我是指卫生间的门。”

“对，卫生间的门是开的。那又怎么啦？”

“我不是对你说过，卫生间的门别让它开着。”

“问题是此刻我老是想上那里去。”

“为什么呢？”

“为你喜欢的事。我突然想起要为莫克特苏玛[①] 报仇，因为……

“你在撒谎。复仇的事跟你们无关，这是我们的事。”

“拉肚子可不分国界，也与文化无关，你知道吗？”

“你真无聊……”

“卫生间的门是开是关，跟你究竟有什么相干？”

“我只是求你帮个忙嘛。”

“真烦人。幸好你还没有对我发号施令。我是在你家里啊。”

“我没有说这话。我只是请你尊重……”

“尊重你这种怪脾气？”

---

① 墨西哥土著居民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西班牙远征军到达墨西哥后，将他推翻、杀害。

“我是心里不踏实，傻瓜。门有没有关，这对我很要紧。我很害怕，帮一下忙，请尊重我……”

“难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取决于我关上还是开着卫生间的门？”

“这当然是件小事。不过，你确实是在我家……”

“可你在我的国家里呢。”

“在你国家里吃屎，这是真的。”

“我们可以回到衣阿华，吃玻璃纸包的炸肉片和狗肉汉堡包，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胆小。如果你不尊重我，可以另外去搞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只供我使用……”

“我也可以上另一间房间睡觉。”

“我只是请你帮个很小的忙。请你将卫生间的门关上。卫生间的门开着，我感到害怕，明白了吗？”

“可是，窗帘拉开睡觉，你倒不介意呢。”

“这我喜欢。”

“可我不喜欢。烦人的太阳很早就晒进来，不让我睡觉。”

“我借给你一个美国航空公司给的面罩吧。”

“你起得早，可以。不过，我有倒楣的偏头痛，想多睡一下。”

“你可以去药房买一瓶阿斯匹林来嘛。”

“你究竟为什么要拉开窗帘睡觉呢？”

“我在等……”

“等谁？等德拉古拉？”

“有几个夜晚景色宜人，月光照进了卧室，使卧室改变了样子，并将你带进了生活的另一个时刻。也许这种情况还会出现。”

“还会出现？”

“是的。月光照进房间、礼堂，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点你应该相信。”

“你对我说过，不要相信你的经历。”

“只相信我给你提供的形象。”

“请你原谅。我会将门关上的，不让任何一缕月光溜走。”

“谢谢。”

“总有一天夜里，月光会照进来的。”

“会照进来的。我的生活取决于它。”

“我觉得你是想说：我的回忆。”

“你是不是记得你想要复原的一个夜晚？”

“好多个夜晚。”

“不会是好多个夜晚。只有一个夜晚，或者根本就没有。”

“你得好好想想。”

“不，是想像。”

“告诉我，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你别笑。”

“你要什么？”

“雪。”

“就在这里？”

“整年都下雪，一年四季都下雪。没有雪，我就无法进行想像。外面在下雪。一个圆圈。一座圆形的剧院。一座礼堂。一个天窗。一个夜晚。我的身躯靠在舞台上。只有我们两人，他压在我的上面，用他的一只手在寻找着。他撩起我的裙子。”

“是这样吗？”

“他对我一片柔情。任何别的男人都没有他情长意深。”

“是这样吗？”

“他非常耐心地撩起我的裙子，将一只手伸进我的短裤内，在黑暗中寻找……”

“啊。”

“一直到月光照进房内，照亮了我们的全身。月光照亮了我作爱的第一个夜晚，我的爱……”

“啊，啊……”

“是这样的，请快一点。”

“可是，现在没有月亮，真遗憾。”

“什么？”

“我说，现在没有月亮，我们只好等。如果你愿意，我去买一个纸月亮，将它挂在床上。”

“你缺乏想像力，我已对你说过了。”

“喂，别哭，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

“你几乎已经办成了，太可惜了。”

“给你。”

“你干什么？这是什么？”

“一件礼物，是对你送给我的牙膏的还礼。”

“你将我的想像力都毁掉了。你没有这个权利。”

“现在已是早晨三点了。你还得早起呢。你还需要我干什么吗？”

“请你起来关上卫生间的门。”

“晚安。”

十九

圣地亚哥市政府请电影摄制组人员吃饭。殖民地式的市政府大楼的院子里摆满了桌子、椅子,还用彩纸和中国的灯笼进行了装饰。州和市政府的官员们分头作陪:州长先生陪着电影导演,市政府主席陪着演主角的演员和他的女友,狄安娜和我则和军区司令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面貌很像东方人的将军。有人说,法国将军马克西姆·魏冈是夏尔洛特皇后[①] 和一个叫洛贝斯的上校的私生子。洛贝斯上校是马克西米里亚诺皇帝的副官,他曾两次背叛了马克西米里亚诺:首先是指他和皇后私通;紧接着,他又在格雷塔罗给胡亚雷斯率领的军队让道,让他们俘获了这个奥地利籍皇帝。当时,夏尔洛特皇后已去欧洲,向拿破仑三世(另一个背叛者)和教皇庇护九世求援。她在梵蒂冈发了疯,成了公开在教皇的房间内过夜的第一个女人。

她是真的发了疯,还是只是用来掩饰她怀孕、生子的一种手段?皇后被囚禁在城堡里后,再也没有出来。年轻的士官生魏冈是一八六七年在布鲁塞尔出生的,比利时王国政府给

---

① 比利时的夏尔洛特(1840—1927),为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之女,与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即马克西米里亚诺)结婚,马克西米连后被法国人立为墨西哥皇帝,夏尔洛特遂成为墨西哥皇后。马克西米连失利时,夏尔洛特回欧洲求救,后马克西米连被处死,夏尔洛特因绝望而精神失常,最终死于布鲁塞尔。法国将军魏冈一八六七年生于布鲁塞尔,一九六五年卒于巴黎。

他支付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学费,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福煦[①] 的参谋长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是盟军总司令。这位颧骨高耸、鼻子像玛雅人、嘴唇薄得像刀片、上唇留着几根稀稀拉拉的八字胡,面孔长得很像满州人的军人在法国一定很引人注意的。他个儿不高,骨架不大,黑头发略微有点秃顶。我这样详详细细地描述魏冈将军的目的只是为了描写圣地亚哥军区司令奥古斯丁·塞地略将军。我将这位将军和拿破仑三世强加给墨西哥的那个帝国联系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在市政府院子上面的一个阳台上,肯定是由于共和派人士的疏忽,还留有帝国的标记:鹰和蛇;在仙人掌下有一警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圣地亚哥军区司令坐在我的面前和狄安娜的旁边。他怀着好奇心用斜视目光瞧着我们,仿佛他将直视的目光留给庄严的场合似的。我想,他一定是在面对挑战和死亡时,才会使用直视的目光。我确信,此人一定会用直视的目光看着行刑队,下令开枪;或者他也会以同样镇定的姿态面对行刑队射来的子弹。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避免用直视的目光对着任何人,这是因为在我国,人与人之间用直视的目光就是挑战的目光,这会引起强烈的反应。胆子小的人目光下视,或者像歌曲中说的那样,低下脑袋,弯下身躯,从一旁走过。勇敢的人则用目光盯视对方,看谁先低下头。如果两个勇敢的人相遇,其中一人说:“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那情况就严重了。如果改用“你”相称,情况就更严重了。假如再加上一句骂人的话:“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这个乌龟、笨蛋、王八蛋!”那肯定要打起来了。

我对墨西哥人看人的这套习俗十分清楚。所以,我也像塞地略将军看我和狄安娜一样,用斜视的目光看他。当我将目光移到院子里时,发现其他桌子上的人也是用这种目光看着对方。除了摄制组的那些无辜的美国人外,其他的人都是

① 费尔迪南·福煦(1851—1929),法国著名元帅。

这样看人。州长偷眼看着司令，司令也用同样的目光看着州长；市政府主席力图避开上述两人的目光。我看见在院子的一角站着一群年轻人，其中有个小伙子曾在广场上和我说过话。他留着萨巴塔式的胡子，目光忧郁。他叫卡洛斯·奥尔蒂斯，和我同名。

司令的目光紧紧地对着我的目光，和我说话。

“您认识站在那边的那些学生吗?”

我对他说，不认识，只是其中有个别年轻人凑巧看过我的书。

“这里没有书店。”

“太遗憾了，真不像话。”

“我也是这么说的。书得从墨西哥城捎来。”

“唉，这样一来，不是会将外面的东西，也许是调皮捣蛋的东西也带到这里来了吗?”我微笑着，竭力装作和蔼可亲的样子。我一般和政府官员说话，总会露出风趣，甚至有些顽皮的本能。

“不会的。这儿我们知道的一切全都是从报纸上得到的。”

“那你们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少，因为报纸办得很不好。”

“我是说平民。”

他将百姓称为“平民”，这种半文半白的说法使我感到好笑，这促使我想一想这位司令究竟是哪个社会阶层出身。我承认，他的情况是一个谜。墨西哥的阶级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你可以非常容易地分清人们的阶级属性：印第安人、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等。只有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一时难以确认，这不光是由于这部分人原来低贱的社会地位已有所上升，或者他们本人的素质有了提高，而且，也由于他们上升的同时，从他们破了产的祖先(这些祖先也许曾经是古代墨西哥的成千个古老部族的王公贵族、僧侣或武士)那儿继承了一些优秀的成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家里，

 怎么还会有和吵吵嚷嚷、爱慕虚荣、爱出风头、贪婪残忍的富

豪的行为相对立的坚忍、耐心、尊严和谨慎这样良好品德存在呢？事实上，墨西哥有这样两种人，形成了两大阶级：一种人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这种模式由于缺乏正确地面对死亡和神圣事物的文化，并不是墨西哥的东西），变成了庸俗的令人生厌的中产阶级；另一种人则继承了西班牙和土著人的传统，保留了贵族的一些东西。在墨西哥，那些介于土著贵族和西方资产阶级之间的庸俗的中产阶级是最可悲的。这些人和别人打招呼时，拍拍自己的肚皮，或者咋咋呼呼地说："这个打领带的……那个戴帽子的……那个留小胡子的……"

塞地略将军（他的面貌酷似马克西姆·魏冈）似乎跟华金·阿马罗将军来自同一个神秘地方。华金·阿马罗将军在索诺拉山和阿尔瓦罗·奥布莱贡[1]（这是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年轻人，小时候常给我在阿拉莫斯的外祖母送牛奶）的西北军会师。阿马罗将军头上裹着红头巾，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由于他漂亮的白人妻子的关系，他当过马球队员，也由于他本人的聪明才智，他成了从革命中诞生的墨西哥现代军队的创建者，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我认为，塞地略将军和阿马罗将军的经历相似，只是缺乏后者那种浓墨重彩之处。阿马罗是个独眼人，法语说得完美无缺。塞地略将军于一九七〇年在革命队伍中已常常出头露面。他加入革命队伍时，确实还很年轻，但他此时又显得特别老成，因为他继承了千百年来农民那种沉默寡言的品行。狄安娜好奇地看着他。她承认（尽管她没有对我明言）对他不理解。我自以为是理解他的，但对他也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觉得他相当神秘，深不可测。作为一个作家，心里总有些痒痒的，想对当官的戏弄一下。

"一九六八年你们对付那些学生有不少困难吧？"我突然对他这么说，这是有意对他进行挑衅。

"情况和全国差不多。这是一场对政府表示不满的运动，

---

①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期间曾任墨西哥总统。

倒给那些年轻人增添光彩了。”他出人意料地对我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觉得自己从侧面受到了将军的攻击，心里很不痛快。

“他们是造反者，”我对他说，“就像您年轻时一样，我的将军。”

“以后他们就不会造反了，”我倒不自觉地给他铺了下台的台阶，“年轻时听话的人老了会不听话。不过，老了还造反，那就荒唐了。”

我打算说些更尖锐的话，先朝旁边的狄安娜看了一眼。她像个正走进宝塔的满洲官员一样对我微微点了点头。

“真有必要流血吗?”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

他朝州长的那张桌子看了一眼，目光中闪烁着讥讽的火花。

“游行一开始，就有人要我派兵进行镇压。可我只是对他们说，先生们，这里是要流血，但眼下还不是时候。请等一下吧。”

“这就是说，需要看准时机，才能进行镇压。”

“朋友，要知道人们总是喜欢安定和秩序的，那些乱糟糟的局面到头来总会让人讨厌的。极大多数人是赞成稳定的。”

尽管他说话比较客气，但实际上都对我发起了挑战，试图将我置于面对当权人物的不利地位。他这个当权人物掌握着情况和信息。我心里暗暗发笑，他一开始就讲什么书呀，报呀，目的就是为了告诉我，他们得到的用来决定政治行动的真正的情报并不是从西班牙人说的那种“黑色的东西”，即印刷出版物中得到的。

侍者给我们送来了当地的名菜，谈话被打断了。那是红烧猪腿和猪爪。我真不愿看那些美国人见了这道名菜后脸部的表情——吃惊，厌恶，害怕，难以相信。究竟吃不吃呢? 这是美国人在墨西哥面临的抉择。我有意朝狄安娜看了一眼，想请她尝一尝这道热气腾腾的菜肴，不要跟其他的美国人一样。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早已对她说过：

“我这个人无论在你们的国家里，还是在自己的国家总是有什么吃什么，吃得不舒服，就自己进行调理。可你们这些美国人，一见到墨西哥饭菜就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可怜相。为什么我们能够适应两种饮食文化，你们却只习惯于一种，而且，总指望到其他任何地方也能舒舒服服地遇到自己的饮食文化呢？”

狄安娜尝了尝猪爪。坐在一旁的州长见到电影明星尝了本地引以为骄傲的菜肴，便像犬吠一样大笑起来。

“有些人政治上不老练，办事急躁，最后，把事情全办糟了。”将军说话不像刚才那样小心翼翼了，而且，话中讥讽的意味更浓。他竭力避免看州长，但州长刚才的笑声他是没法充耳不闻的。州长刚才笑的原因一是心情愉快，其二也可能由于这时进来了马里亚奇[①] 乐队，演唱了《女黑人之歌》这首必唱的歌曲。“我心爱的小黑妞儿，两只纸一样的眼睛在空中飞。”和蔼可亲的州长低声地哼唱着。

“如果掌了权，就可以避免这方面的错误了，”我有计划地进行挑衅。

“谁掌了权？”

“你们，军人们嘛。”

塞地略将军第一次张大了眼睛，额头上那几道深深的皱纹全都舒展开了。

“不会的，老兄，除非堂贝尼托·胡亚雷斯从坟墓里爬出来，在墓地的周围走上两圈。”

我想起了在英国人拍摄的那部电影里扮演过贝尼托·胡亚雷斯的那个孩子。

“您的意思是说，墨西哥军队不同于阿根廷军队。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共和政体，是吧？”

“我是想说，我们是一支从革命中来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

① 墨西哥著名的民间乐队。

“可是，如果需要的话，就对人民开枪。”

“如果政府下令，我是指文官政府，”将军连眼都没有眨一下地说。可我觉得自己已伤害了他，因为我已触及到了他的要害。对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发生的事情的回忆是军队的耻辱。他们想忘掉这件事，不谈这件事。不过，塞地略对我说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想告诉我，他们只服从命令，他们的名誉还是洁白的。

“可你们也不应该干警察干的事，或者当猎犬嘛，”我对他说。说完，我又后悔了。这倒不是考虑我自己，我是考虑到我的美国朋友和狄安娜。我违反了自己定下的规则(这条规则我已对大学生卡洛斯·奥尔蒂斯说过)：我没有权利在政治上连累别人。

我后悔的原因还由于我将他们和警察，和雇用的杀手相比，这是对他们的侮辱。我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说自己真会挑起事端。然而，就像以往常常发生的那样，我这个人越是起誓不介入政治，政治却越是要我介入。

“您对一九六八年发生的事持强烈批评的态度，这我清楚，”他一边擦去嘴唇上猪腿的佐料，一边说。

“对这样的事，我真不知用什么言词表示内心的气愤，”我火上来了，难以自制地说。

“请告诉您的女朋友，让她当心点，”这个墨西哥武士顷刻间变成了真正的凶神。那天夜里，在他周围那些人的生命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请告诉您的女朋友，让她当心点，”这话就是将军说的吗？为了驱散任何疑团，塞地略做了我害怕的那件事。他对狄安娜看了一眼，是用直视的目光看她的，未加任何掩饰，也没有羞怯的表示。他的眼神露出了野蛮的凶光，连我见了都感到害怕。在他的眼神中，我还见到了淫欲和屠杀的欲望，见到了被长久控制住的，看到被自己战胜的猎物就要扑上去的那种凶残的本性。他喜欢狄安娜，威胁她，却又讨厌我们——狄安娜和我。这时，司令的目光向我们

表露了强烈的社会仇恨、残酷的阶级对抗和敌意。这种仇恨随着这位军人不断地向其他赴宴的人(市政府主席、州长和当地的一些社会名流)投过去的目光,而像海涛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保镖们见到了塞地略的目光,像得到了一块圣饼一样,似乎觉得上帝的精神和躯体都附在了自己的身上。他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时而分开,时而集中,时而朝前走,时而朝后退,双手按在暗藏武器的腰部,这样一直持续到了司令合上了眼皮,这意味着向他们下了"要安静"的命令。这命令就是从那双习惯于进行发号施令的眼睛里发出的,而他们则应该不折不扣地服从和执行。

这件事就像突然掀起来的海浪一样,很快就退潮了。紧张的情绪只持续了一瞬间,那些保镖又三五成群地围成一圈,抽起烟来。州长是个无能之辈,他满口胡言,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市政府主席叫侍者上咖啡。可是,我内心深处刚才将军的话引起的恐惧还没有消失。而且,我心里明白,这种恐惧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下去,一直到我离开圣地亚哥之后。这不但对我的爱情,而且对我的工作和安宁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你在墨西哥是得当心点,"我在向狄安娜表示歉意时对她说。明天清晨五时她得起床。我们就站起身来,在院子外慢慢地走着。"你要是卷进政治纠纷中去,就永远也出不来了。"

她无所畏惧地瞧着我。好像我劝她小心点是对她的侮辱。

然而,我朝院子的一角看去,见到那一群学生,发现他们的行为和保镖们完全不同,这使我感到高兴。没有出现可能的混淆。卡洛斯·奥尔蒂斯和将军及他的保镖们完全不一样。那天夜里,我发现他们是新人,和塞地略之流不同,这使我得到安慰,也许他们也有同感……然而,将军的这句话不但使狄安娜得不到安宁,也使别人感到不快。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好莱坞女演员会给一个墨西哥将军造成什么麻

烦，会给他挑动起什么，又会干预他什么呢？

"你觉得这里的气氛够沉闷的吧，"我对狄安娜说。

"是够沉闷的。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你明白吗？"

"我也不明白。"

"由于我们相爱，准是使他们妒忌了，"她哈哈地笑了起来。

"说得对，准是这样。"

在我的脑海里，奥古斯丁·塞地略将军的那些话还在轰然作响。

"请告诉您的女朋友，让她当心点。如果她愿意的话，下午两点上俱乐部去跟我吃饭。就在这里不远，在阿尔马斯广场附近。"

二十

为了对狄安娜赠送我几支牙膏进行回报，也为了让她原谅我对那个牧羊娃的态度，一天下午，天气闷热，觉得无聊，我便出门想给她买点什么。下午圣地亚哥街上空无一人。天是灰蒙蒙的，阳光散乱地照在石凳上。城里可供遮阳的树木或凉棚十分稀少。走了十来个街区，我便感到疲惫不堪，头脑发晕。我将身躯靠在一家商店的松木门旁休息。抬头朝里一望，发现里面有许多珠宝。原来这是一家古董商店。不知什么原因，这家商店没有招牌。奥萨卡有的饭店、瓜达拉哈拉有的书店、瓜纳华托有的酒吧没有招牌。店主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他们一定以为，真正的顾客用不到宣传也会去那里的。墨西哥这些不对外张扬的商店的店主认为，铺天盖地的广告只会在顾客的心目中降低商品的质量。在墨西哥的的确确有这样一些不声不响地商店，它们不作广告，只有顾客购货的习惯认得它们和承认它们，在这里酝酿着继续着烹饪、传说、回忆、言谈，也就是所有的正在消失的东西，霓虹灯几乎不宣传这一切。

在那家古董店里，有许多上一个世纪的家具。有些家庭现代化了，或者从外地搬到了首都，就将这些上个世纪末的宝贝丢掉了。这里有藤椅、大镜子、铺着大理石面的五斗橱、脸盆架和各种绘画：有的画面是有关狩猎的，有的是有关食品的静物画。店主朝我走来。他是个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

人，小眼睛，穿一件条子无领内衣，没有系领带。不过，马甲口袋上那条怀表的链条是金子的。我对他笑了笑，问他生意好不好。“我只是搞收藏，”他说，“免得这些东西给毁掉了。”“我能看看吗？”“请自便。”

我在一个书架上见到许多招贴画和版画，都已相当古旧。我不知道法国远洋货轮“诺曼第”号的广告为什么会到了这里，那广告的线条还相当富有艺术性。这里还有我小时候在墨西哥城“伊利思”电影院看到过的米高梅电影《船上发生的哗变》、《大地母亲》、《马利亚·安东尼塔》的广告……有一张粗糙的、相当坚固的纸。我用手摸了一下，这张纸比那些招贴画还保存得完好。我又闻了一下气味，然后，拿过来仔细地看了看，原来这是一幅何塞·瓜达鲁贝·波萨达[1] 的版画，收藏在这古董店里，还保存得相当完好。版画下面注明，由安东尼奥·巴内加斯·阿罗约的印刷厂印制，地点是圣特雷莎街一号，一九〇六年印。我仿佛在维也纳阿尔贝尔蒂纳古董店取出一张卢卡斯·克拉纳赫的版画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张版画。我作这样的比喻没有错，因为这位十六世纪的德国版画家和墨西哥省的那个版画家（他死于一九一三年）颇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虽离得较远，但却是确实无疑的。将这两位版画家维系在一起的是死神的舞蹈和人类难以摆脱的题材：死亡。

版画家波萨达用简洁、直接、残忍却又雅致的技法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画中有一位身穿黑衣、长裙，手拿手枪的女士。她刚刚杀死了另一个同样身穿黑衣、长裙，拿着手枪的女士。显然，第一个女士比第二个女士先下手。那个杀了人的女人背对着阳台（阳台的门是开着的）。她是在大白天行凶杀人的。那个被杀的女人被一条蛇紧紧地缠住，缠得她喘不过气来。这使人产生疑问，她究竟是不是被那个推测中的情敌杀死的。也许根据波萨达在其他场合里表现的手法，用蛇紧紧地缠住女人的躯体，这意味着她是个癫痫病患者。被杀害

① 墨西哥版画家。

的女人后面是一张吃人魔鬼露出獠牙的大嘴，但它实际上是马戏团的入口处。蝙蝠、鬼怪、没有得到超度的亡魂和各种妖魔从这张大嘴里飞进飞出。这群魔乱舞的场面是一场噩梦，而一个身穿黑衣的高雅的女士被另一个模样相似，几乎可以作她替身的女士杀死，这也是群魔乱舞的场面的组成部分，死亡、笑、游戏、新闻，一切相混杂……

那个身穿马甲、身材矮小的店主对这张版画的要价很低。我都差一点打算加倍付给他钱，作为礼物，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我想等到吃完晚饭，便将这张版画送给狄安娜。可是，那天夜里她很劳累，饭后没过多久便沉沉入睡。我看了一会书，随后也跟她一样上床睡了，准备第二天早上将画送给他。睡了一会，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见狄安娜全身战抖地坐在我的身边。

"怎么啦，狄安娜？"

"刚才做了一个梦。"

我轻声地问她做了什么梦，她跟我讲了下面的情况：有个身穿黑衣的女人对她开了一枪，她痉挛了几下，很快就死去了。当时她也是穿的黑衣。

"还有什么情况吗？"

"就是这些了。"

"有没有蛇缠住你的身躯？"

"你说什么呀？别的没有什么，我只看到一小块天空，是从窗子里看出去的。"

"那个杀害你的女人背对着阳台，阳台的门是开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狄安娜这个梦使我深感不安，我又贸然问她，在梦中她的后面是不是开着一张巨大的可怕的嘴，蝙蝠在里面飞进飞出。

"没有，也没有蛇缠住我。请你别拿弗洛伊德那一套来对待我。我已对你说过，我不喜欢弗洛伊德那一套。我早已对你说过了，有朝一日你听人说，我这个乡下来的可怜的女孩子已被一时取得的成绩所淹没了，你也别相信。你不要相信那

个被德国籍的专横的导演虐待的无辜女人的历史。你只相信你自己根据我们的关系而作出的有关我的想像。”

“有许多想像是你亲口对我说的,用不到我再进行想像了。”

“这么说,有关我的事,你就什么也别相信了。”

二十一

对狄安娜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不合理的要求(卫生间的门要永远关着,窗帘要永远拉开,让照在雪地上的月光射进窗来)我决定不予满足。她说我缺乏想像力,我感到不高兴。我倒是喜欢和她一起,对未来进行想像,而对与我无关的她的过去进行病态式的想像,我不感兴趣。这里有个自尊心的问题,同时,也怕对狄安娜过去的回顾会使我们陷入对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追忆中。我认为,处于这样的状态也是很奇妙的:我这个墨西哥男人假定有一个沉甸甸的过去,而她这个中西部的美国女人却假定已记不起往事。难道正因为如此,她才希望打开记忆匣,一个真正的记忆宝库,请我和她一起回忆往事?毫无疑问,情况准是这样。然而,我此时却不想屈服于那些虚荣心极强的有怪脾气的女人。我讨厌女人的虚荣心和怪脾气。我不但要消除这些东西,而且,如果女人们不听我的,我还会给她们点颜色看看。有一次,我和墨西哥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一起去塔斯科,她对旅馆的房间不满意,认为太破烂了。我就说她太任性,太缺乏适应力,太缺乏想像力和冒险精神。实际上,我是在对她说,别那么娇气了,还不是我带你来度周末的吗。我早已下了决心,不让任何任性的、爱虚荣的、骄傲的墨西哥女人驾凌于我之上。恰恰相反,我要驾凌于她们之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年轻的时候,她们对我伤害得太厉害了。我仅仅是由于家贫,而我的那些情敌有

钱,我女友们的父母就将我从可供选择的丈夫的名单中抹掉了。我那些女友都很软弱,很爱虚荣,很容易被父母亲说服。眼下既然是她们来找到我,我就来个以牙还牙,尽管知道这样做对我自己的伤害比对她们还大。我这次拒绝狄安娜提出的和她一起回忆往事,实际上,还是和我过去那些女友在我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有关。可是,她可不是墨西哥的女孩,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我那样做,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也想尽快地纠正这个错误,让她明白,我可以满足她关上卫生间门的愿望和帮助她回忆那个雪后月光之夜的要求。她对我的态度感到奇怪,有时很生气,但她还是请求我关上卫生间的门,还责备我,讽刺我,因为我不帮助她恢复失去了的记忆。有一句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时期的俗语说:在后宫发号施令的不是太监,而是苏丹。她的第二种态度使我确信这是一个基本信条。不过,狄安娜在提出请求时,总是低三下四的,语气也很柔和甜蜜:请关上卫生间的门。于是,我就觉得不应该拒绝她的要求。我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的,她这么一请求,我就动了心。如果有人对我下命令,我反倒不干。我和父亲相处得很好,非常好,只有一点不太融洽。我这个人不太注意整洁,这使他不高兴。他是德国女人的儿子,常以准时、整洁而自豪。他的柜子、文件、作息时间都是规律生活的范例。而我呢?总是在自己的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纸张,肮脏衬衫在地板上丢得到处都是。有一天,还当着他的面先穿上鞋子,然后,又费劲地穿上裤子。这使他厌恶,不悦,甚至视为一种挑衅。但是,他并没有责备我,反而对我十分亲切,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他知道我的毛病,但他接受了这个现实,原谅了我。他从来没有对我下过命令,我也没有接受过谁的命令。我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生活,不听从谁的支配,充其量也只是部分地听从他人的安排,却保持一定的自由。我的生活虽有些杂乱,但我的头脑却很有条理。尽管我的书桌上堆满了稿纸、书籍和信件,可我知道(也只有我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仿佛我头脑里装了一部雷达似的,虽说我的稿纸和书籍堆得

像比萨斜塔一样，但我能很快地、正确无误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有时，那座斜塔会倒下，但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还是一清二楚。人的感情是无法条理化的，不能说，什么感情有条有理，什么感情杂乱无章。感情也很难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即使有，也很快会消失。这就像鲜花的香味。表面看来，花的香味是有形式的。例如，玫瑰花香的形式就是玫瑰花，晚香玉香味的形式就是晚香玉。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玫瑰花的形状并不等于它的香味。香味和感情十分相似。感情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现实，但却是世界上最捉摸不定的。我在头脑里有时会进行自责，因为我在对待狄安娜·索伦这样的女人犯了错误，在感情上过于放纵自己。我确信，她对我很有感情，很亲热，我能爱上她，也太幸运了。所以，如果需要的话，尽管她很任性，很爱想像，但我也应该依从她。

另一个夜晚，她醒来后，情况和过去有了不同。她说，她想像自己进入一间大客厅，以为里面满屋子都是人，因为从远处她就听到了说话声、笑声、音乐和碰杯的声音。但是，一进去她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只听到像是用塔夫绸制的长裙子发出的吱吱声。她开始大声叫嚷，好让外面的人听到。我醒来了，我想到我赠送给她的那张版画。

二十二

狄安娜那种奇怪的要求和夜间受的惊吓慢慢地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如果夜里听到她在翻身，我也不再予以理睬。要是她从床上起来，我就半睡半醒地想像她在拉开窗帘，在关卫生间的门。她要是在我的噩梦中出现，那总是穿着黑衣，面对阳台站着，另一个穿同样衣服的女人对她开枪。

在这奇奇怪怪的梦境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音乐。那一切全都出现在点缀着几声枪响的漫长的寂静中。一天夜里，狄安娜的声音将我吵醒。那声音很遥远，非同寻常。她在轻声地哼唱着一支歌曲。那种声音好像不是她的，是另一个来自远方的人的。那声音也许已经死去，随着时间的消逝已被遗忘，它利用夜晚这一神秘的时刻恢复自己的存在，回来占有了她的声音。

我当时的感觉和平常完全不一样。我很惊恐，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身上。我原本头脑昏昏沉沉的，这时完全清醒过来，听着她，看着她。那天夜里是满月，皎洁的月光照进了敞开的窗户，我看得一清二楚。狄安娜坐在窗前，身穿白色睡衣，在低声地吟唱一首歌曲。这首歌我很快就听清了，它是年轻歌手狄娜·杜纳尔的成名之作，歌名叫《再对我做一次爱》。

狄安娜手上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她是对着一样东西唱的。显然，她是对着电话机的话筒。我原先头脑里涌现的是一个

女人被满月的月光撩拨得惶惶然的形象。这时，突然感到又沉痛又怀疑，上面说的那个形象被驱散了，眼中见到的仿佛是一只孤单单的母狼正朝夜间的女神，也就是它的复仇女神阿尔特弥斯，即与她同名的狄安娜嗥叫。

如果开始时向我的头袭来的一阵沉痛使我觉得她发疯了，那么，紧接着像尖刀一样向我刺来的一阵醋意却又提醒我，她是在对着什么人歌唱……我该不该对她醋劲大发，满腔怒火地打断她，不让她唱下去呢？这时，小心谨慎战胜了名誉，而好奇心又战胜了上述两者。我既不是哈姆雷特，也不是奥赛罗，那天晚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欧庇梅特奥[1]，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想阻止那件事情的发生，也不想对那件事开一眼，闭一眼。如果我对此事听之任之，不理不睬，就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打开了"潘多拉匣子"。

我装作睡着了，没有再听她唱歌。不久，我感到她那热烘烘的身躯又躺倒在我的身边，却令人惊奇地离我远了一点，而且也不像往常一样，拿她的两只脚勾住我的双脚。

我真想知道狄安娜早晨三点在跟谁说话，跟谁对着电话机唱狄娜·杜纳尔的歌曲。这样的愿望我要抑制到什么时候呢？从那天夜里起，她每天深更半夜坐在月光如洗的房间内说话。开始时，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使人难以理解（也可能是她在模仿别人的声音，因为狄安娜善于模仿，或者是她被狄安娜附身，我不知道），但每天夜里，随着月光的渐渐消逝，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也听得越来越清楚。她首先唱《再对我做一次爱》，接着，由唱歌到说话，声音还是那么深沉，那么柔和，就像天鹅绒一般。这声音似乎不是狄安娜的。她正常的声音来自上部，来自明亮的眼神，更多的来自柔软雪白的胸部；夜里的声音却好像来自腹部，甚至来自卵巢。她说的事

---

[1] 欧庇梅特奥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和潘多拉结婚后，出于好奇，打开了潘多拉匣子。结果，所有的坏东西全都跑了出来，布满大地。

情，如果没有听到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不管他在哪里）提了什么问题，或者作了什么回答，我是无法理解的……

我回想起她托人从意大利捎来的那几支“上尉”牌牙膏。我想她准能和地球上任一角落的人通长途电话。想猜也猜不中，我只好听着，心里越来越不安。我听到狄安娜以不属于她的声音说了一句无法理解的话：

“Who takes care of me?[①] 谁关心我？”

我知道她不是指的我。她对我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请你关心我。她是在向另一个或另一些男人提出要求。此人是她的情人，还是她的父母亲，还是她的丈夫？她和丈夫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墨西哥半夜三时，巴黎时间正好是中午。可是，我知道，这边讲话的女人仿佛也不是狄安娜，这点她说得非常明白。一天夜里，她说：“我是狄娜。”另一天夜里，她又说：“我是阿雷塔。”后来又说：“我是比莉……”我明白她提到这些人的名字的含义。比莉·霍利代是所有爵士乐女歌手中最伤感的一个。我们内心的痛苦自己不敢唱，不敢听，她以我们的名义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她就像个黑皮肤的女性基督，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罪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got the moon above me
but no one to love me
lover man, where can you be?[②]

阿雷塔·富兰克林是个欢乐的歌手。她在赎罪的集体仪式中，也就是取消我们用过的旧名，并给予我们一个新的、洁净的、闪闪发光的名字的再洗礼仪式上唱歌。

---

① 英文：是唯一你必须懂得的人类。

② 英文：让月亮照在我的头顶
但不要让人爱我
我的情人，你在哪里？

A woman's only human you've got to understand[①]

狄娜·杜纳尔是个受伤害、受欺凌的女人,是社会、偏见和大男子主义的牺牲品;她也是个对自己自由、洁净的未来抱有希望的年轻女人。她希望将来以欢乐充满世界。

You might as well face it:
you're addicted to love[②]

每唱完一支歌,我就听到她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反复吟唱的、已刻印在脑子里的某一歌曲的歌词,而是她与他人进行对话(对我来说,是狄安娜在月光下的独白)的片断。

"什么?我是女白人。"

他们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又回答些什么?谁对她提出问题?狄安娜对着电话机话筒说,"你要使我将自己看作另一个女人,"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其中究竟包含着什么隐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内心感到烦恼,使我和情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由于我执着地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想弄清楚狄安娜在跟谁说话,这想法打断了我的早上工作时间,不让我工作,使我的文学创作进入低潮。我没精打采地修改着已经写好的一页页初稿,总感自己写的东西淡而无味,十分机械,缺乏感情。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成了一个谜。狄安娜是我猜不透的谜,我自己也成了猜不透的谜,我们两人都成了难解的谜。

我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夜晚的到来,以便弄清个中的秘密。

可是,我不敢在床上打断狄安娜和他人进行的秘密的对

① 英文:女人是唯一你必须懂得的人类。

② 英文:你最好应该面对它:
因为你已沉湎于爱情

话。如果我这样做，只会引起她的惊恐，甚至中断我们的关系。我承认自己太胆小，我再一次面对将会失去我爱恋的情人的现实。要是我从床上起来，朝她走去，将她的电话机话筒夺过来，就像戏剧中荡妇的丈夫那样，要她说出和谁在说话，跟谁在胡搞，那么，我想我可能会一无所得。

我只能降低自己的身分，偷偷地翻看狄安娜的物品，看看能不能发现她随意记下的一个人名、一个电话号码、一封信，或其他任何能指明她的神秘的夜间对话者的东西。我打开了抽屉、手袋、旅行包，将手指像黑色的蠕虫一样伸进短裤、袜子和各种各样难以详述的内衣内裤(这些东西她总有一天会让我看见，但眼下我却只能用手去触摸它们，就好像它们是破布、该丢弃的垃圾一样)中间。这样做时，我感到自己很肮脏、很卑鄙、很可耻……

我想她应该给我机会，总会在哪一天晚上给我机会。我可以肯定，她会请我共享这个秘密。

二十三

老演员莱夫·库伯那天夜里情绪相当消沉。他回忆了过去,对已经消逝的时光十分留恋。他感到自己被他的时代抛弃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背弃了什么。他背弃了自己的承诺,背弃了乐观情绪。在他提到三十年代的人名、作品和社会组织时,总有一种留恋和蔑视的心情。是的,那是一种又留恋又蔑视的心情。有时,他在自言自语,有时,他在对我们说话。许下的愿太多了,都没有兑现。他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对我们说话。他说:"我们也没有理由让那些承诺兑现。"

那天夜里,他原本想通过在客厅里做的一种游戏(我们想通过这种游戏,解除待在圣地亚哥的寂寞和烦恼),发抒上面讲到的那种感情。由于没有得到狄安娜和我的回应(因为我们两人都高傲固执,在那被掩盖住的,从不在白天提及的夜间打电话之谜中,就像我知道她一样,她肯定也已经知道了我),莱夫·库伯在我们没有对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地对他为什么会对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提供了共产党员的名单一事作了说明。他的话说得很简洁、明快。

"无论是委员会的那些成员,还是共产党员,都不值得我尊敬。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些卑鄙的家伙,都是靠说谎过日子的。我为什么要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作出牺牲呢?难道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为了不让自己饿死?我不是个无耻的小人,你们也别将我想像成这样的人。我的表现跟他们——

审问我的右派法西斯分子和那些从来没有帮过我的忙的左派法西斯分子——一样。我是有选择的,这是真的。对那些弱者和易受到伤害的人,我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些人如果让他们在莫斯科,一定会像这帮子人在华盛顿对付我一样地对待我。我向当局提供的就是这些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罪有应得。我为什么成为他们你争我斗的流氓行为的替罪羊呢?"

"你能估计到对那些你不愿伤害的人,你的行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呢?"我问道。

"我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单是别人提供的。如果有人遭到了伤害,那不是我害了他们。我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没有伤害我自己。我承认这一点。"

"在美国有一点不好。如果有人说你叛国,所有的人全都会相信。在苏联,情况正好相反,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维辛斯基没有任何威信,麦卡锡倒还有人相信。"

上面这段话是我说的。狄安娜听了,接下去说:

"我丈夫总是说,美国的自由派人士只会谴责社会的不公正,却不知怎样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们谴责,却不行动。"

"我看过他写的书,"我说,"他还说,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不愿意承担他们行动产生的后果。"

此刻是不是应该从容不迫地问她,夜里在电话里和她进行交谈的就是她丈夫吗?如果不是他,她会作出什么反应呢?会不会引起轩然大波?我又一次沉默了。老演员正在回忆三十年代他在纽约剧团剧院激动人心的舞台经历及观众和演员间水乳交融的情景。那时,正是我青少年时期……

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界线已不复存在。坐在观众席上的人也是演员。他们受到精彩演出的感染,不知不觉地和舞台上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在舞台上由演员们演出的悲剧令人沉痛地变成了观众们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中的悲剧。演员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也难以逃脱自己在舞台上表演过的命运。弗兰西斯·法默尔是个头发像成熟的麦子一样金黄色

的女演员，她最后因酗酒、沦为娼妓、发疯而结束自己的一生，她是被活活烧死的。约翰·加菲尔德由于长期愤怒，损坏了健康，在做爱时死去。

“你不羡慕他吗?”狄安娜说。

“简·爱德加·布隆贝格、克里夫·奥德茨、加勒·松德尔加德等人都是受到了迫害，被那些像着了魔的杀手杀害的……”

“奥德茨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结了婚，”我回忆道，“她叫路易斯·莱纳尔，是个被人们称为‘当代的杜塞’[1] 的维也纳女人。为什么要叫她杜塞呢? 为什么不叫她原来的名字路易斯·莱纳尔呢? 路易斯·莱纳尔是个绝代佳人，但也是个脆弱的、有气无力的、被世人伤害的女人，因为她想成为……”

“另一个女人，”狄安娜说，“你明白吗? 她想成为另一个女人，想成为杜塞，想成为贝尔纳尔特[2]，而不想当她自己……”

“你是在说你自己，”我鼓起勇气说。

“我在说所有的女演员，”狄安娜无可奈何地说。

“是的，所有的女演员都想成为另一个女人，或者不当演员，”莱夫插言道。

“不，”狄安娜露出吃惊的眼神说，“不光是这么一回事。拒绝充当你应该充当的角色，只充当耳朵里听到过的那些人物……”

“你拒绝充当应该充当的角色，你只充当耳朵里听到过的那些人物，”我重复了她刚才说的两个无人称句，将它们加上了人称“你”。

她刚才说那样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回答我向她提出的问题：你凌晨三点电话里在跟谁说话? 我的问题没有得到直接答复。老演员感到她和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便将话题又拉回去了：

---

① 意大利女演员。

② 法国女演员。

“听说路易斯·莱纳尔对克里夫·奥德茨说过几句很有意义的话。她对他说，她母亲怀孕七月就生下她来。以后，她一直想将欠缺的那两个月找回来。她说：‘我从你身上找到了。’然而，他是个很左的左派。他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总罢工给了我欠缺的两个月。’他没有说爱情，而是说罢工。他将妻子的话接过去当自己的政治口号。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欠缺的月份。无论是两个月，还是九个月，都是一回事。我们都想得到更多的东西，都想成为另一些人。狄安娜说得对……奥德茨为了提出政治口号，牺牲了他妻子的利益。”

“狄安娜想将自己伪装起来，也想将我们伪装起来，”我讥讽地说，“她请你住到这里来，也是想掩盖我和她的同居关系。尽管这是事实，而且众人皆知，但她还是想进行伪装，你知道吗？她这样做是为了成为另一个女人，为了在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为她在银幕中没有扮演好……我讨厌那些想被人们看成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女人。”

“晚安，”莱夫突然站起来，以蔑视的目光瞧着我说。

“不，你不要走。你不知道吗？我们和狄安娜是住在同一个修道院里，你是修道院院长，而我是个才进修道院的修士。或者说，我们是个民间艺术团体，你是个吟唱诗人，我是个编写故事的人，阿苏塞娜当女仆。不过，这里没人通奸，这怎么可能呢？这事人们已经知晓。大家上这里来是隐居的，不是来拥抱的。肮脏的修道院……”

“我宁可听讨厌的摇滚乐，也不愿听你这些胡言乱语。晚安，狄安娜。”

“晚安，莱夫，”她流露出不安但又无可奈何的眼神。

我也学着她的腔调说：

“唉，我已邀请谁上我这里来同住呢？”

“去睡觉吧，亲爱的。今天你喝多了。”

二十四

我的确多喝了几杯，但我并没有沉沉入睡，周围发生的事我全清楚。那天夜里，她又起来了。她好像有意不回头看我一眼，看看我是不是睡着了。她走出卧室，窗帘已经拉开，月光自由自在地洒落到黑色的旧电话机上。我听见轻微的拨号声。我也从床上起来，慢慢朝月光照明处走去。我伸出手，准备拿起卧室里的电话机，但我又害怕地停止。她会不会发现我的行动呢？她这时是不是在另一个房间里打电话呢？我有没有权利偷听私人电话？我已经偷偷地在她的行李袋内、抽屉里、内衣里寻找过……我现在这样做会使她生气的。

我还是拿起卧室内电话分机的听筒，听到两个人的说话声。狄安娜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但我已在前几夜偷听过几次，已能猜得出来。这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一个时代，为的是占有她自己的声音……我有点陷入幻境了。实际上，女演员狄安娜·索伦只是在演一个她永远也不可能在银幕里演出的角色。这是一个女黑人的声音，她是在和一个男黑人说话，这点是很清楚的。虽说是一个白人在模仿黑人说话，就像狄安娜在模仿女黑人说话那样，但听起来确是黑人的声音。我的意思是说，这声音是那个想成为黑人（只想成为黑人）的人的声音。这是我在驱散我正增长的痛苦的迷雾时获得的印象……现在我明白了前几个夜晚在卧室里听到的那些话的含义。当时，她说过“你得让我将自己看成另一个女人。”

“什么？我是个女白人。”这样的话。

“你得变成女黑人。”

“怎么？我是女白人。”

“你会明白，这和你有关。”

“可我做不到。”

“不行，阿雷塔，你别这么固执。我不是要你改变肤色。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跟你在一起，”已经变成阿雷塔的狄安娜说，“为了能和你在一起，睡在你的床上，我愿意献出一切。”

“你不能这样做，宝贝。你已被关在笼子里，我已出了笼子……”

“我没有说笼子。我是说床，你和我……”

“你将我们释放出来吧，阿雷塔。将黑人释放出来，他不喜欢女白人，因为她背叛了自己的母亲。将白人释放出来吧，他不喜欢女黑人，因为她抛弃了偏见。将黑人释放出来吧，他喜欢女白人，替父报仇。将白人释放出来吧，他喜欢女黑人，只是为了侮辱她、抛弃她、随心所欲地奴役她。宝贝，你把这些事做完了，我就是你的了……”

“我得设法改变自己的灵魂，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我的心肝。”

“你做不到。”

“为什么？我难道没有……”

黑人将电话挂上了，可是，狄安娜还拿着电话听筒听着。我也急急地挂上电话，怀着强烈的负疚的心情，朝床上走去。然而，第二天夜里，我又情不自禁地继续偷听中断了的，但又一夜一夜地继续下去的谈话。

……她对他说，她要设法改变自己的灵魂，他却说，你办不到。她请他不要这样将她看死，不要这样不公正。但是，他还是坚持说，“你不行，从内心深处，你总以为我们这些黑人想变成白人，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成为黑人。”狄安娜·索伦说，她希望大家都得到公正的待遇。她还告诉那个黑人说，她反对

种族主义,她曾为反对种族主义参加过游行示威,这点他是知道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将她视为黑人而接纳她呢?他纵声大笑,这笑声也许会将洛杉矶到圣地亚哥这一带正睡着的鸟儿都惊醒。“你希望让我们也能进国家俱乐部,也能进豪华的旅馆,也能进麦当劳餐馆,可我们不想进去。我们倒愿意让他们将我们排除在外,我们倒巴不得让他们对我们说:别进来,你们和我们不同。我们讨厌你们,你们身上有臭味,模样太丑,像猴子;你们太愚蠢,是另一种人。他喘着粗气说,每次听到那些白皮肤的自由派人士或慈善家谈什么反对种族主义,他就恨不得将他们阉割掉,让他们吃下自己的睾丸。

“我不想成为你们这样的人!我不想成为你们这样的人!”

……次日夜晚,她对他说,她只希望成为另一个女人,使她恢复真正的模样。每个人有自己的目标。他有他的目标,她也有自己的目标。

“请你尊重我,说到底,我是个演员,不是政治家……”

那男人哈哈大笑。

“那你就好好地干你的事业吧,别玩火了。你得明白一点,如果不彻底和人类分离,不单独待着,谁也看不清自己是什么样子……”

她几乎哭泣着对他说,她不能那样做,他让她那样做是办不到的。他侮辱她,叫她骚货,是白皮肤的贱货……她似乎高兴地叹了一口气。

“那你应该是纯种的黑人,非洲的黑人,而不是被带到这里来和白人混杂的黑人。即使这样,你也不能和你的同种人分开……”

“住口!阿雷塔!住口,婊子……”

狄安娜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他说,在美洲没有纯种黑人,所有的黑人也都是白人的后代……

“我这样说,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说这话是让你想一想,你我之间有共同的东西……”

“住口，婊子！你身上没有一滴黑人的血，你没有混血种的儿子……”

她说，她喜欢这样说，但不是为了赢得分数：

“我不想利用女人的身分在争论中赢你。”

“婊子，白人混蛋……”

……次日夜晚，他打电话给她，请她原谅。他低三下四地对她进行了解释，但我觉得他的态度可疑。他说，她是想改变制度。接着，他又补充说（态度还是那样低三下四，但语带讥讽，像是小桑波的声音），“你真好，富有同情心，但太虚伪了。”他说，她不明白，制度是不能改变的。他慢慢地恢复了原来的咄咄逼人的腔调说，制度只能破坏。她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听出对方嘲弄的口气，真诚、激动地说，她想帮助他们。

“可是，我认为我不知道怎么帮助……”

“你可以这样开始：不要记着我是个黑白混血种人。”

“你是的，我喜欢这样，我爱你这样，这点你觉得不重要吗？”

她希望他对她说，他也像自己的祖先一样爱上她了，他也在白皮肤姑娘面前退让了，他也想和她生个黑白混血种的儿子。她希望他问她，她觉得怎么样？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吗？她可不能到处去大叫大嚷，说她不干，说她不是杂种，这是一种污蔑，除非是雅利安人、白种人和北欧人，其他人种的儿子她一概都不要……

“我也要辱骂所有的黑人，”那个不在场的黑白混血种人以深沉的语气说，“我要辱骂所有的黑人，他们只能是非洲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血统，情不自禁地找了白皮肤的女人当老婆，生了几个肤色像咖啡加牛奶的孩子。你说一说这件事，婊子，你想一想这件事，你打我一记耳光。尽管你离我很远，阿雷塔，我向你起誓，我能感觉到你这一记耳光。你打得重一点，因为你离我很远。你现在跟一个男白人睡在一起，从这里我看得很清楚。加里福尼亚和墨西哥之间距离虽远，但我能看得清，能闻到你那个黄头发的混帐男人的气味，能对他吐唾

液……”

“你别说出名字，别说出地名……”

“你别这么傻，他们全知道，全都录了音。你怎么这样心不在焉？”

“我是阿雷塔，我名叫阿雷塔。”

“你要成为女黑人。”

“怎么？我是女白人。”

“你将会明白这事与你有关。你不成为女黑人，我不能接受你。”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行。Fuck off, bitch…①”

……翌日晚间，这是最后一次通话。他的语气非常平静，说狄安娜的错误是相信人人都有过错，包括她自己，包括那些压迫者。这样一来，反而变得人人都是无辜的了。不对，那些贫民区的孩子、吸毒成瘾的母亲、被迫进行偷盗的父亲和被三K党阉割的男人才是被压迫的，是被压迫者，而不是那些可怜的压迫人的家伙。

“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女黑人吗，阿雷塔？你知道吗，在这个国家，只有黑人犯了罪才应该受到处罚？你知道吗，只有白人受到欺压，才会引起震动，黑人遭受伤害是不会引起震动的。所以，我请你装成一个黑人受害者的样子，阿雷塔，你将会发现，人们会将你像母狗一样拉到公路的一边，卡车会从你身上压过去，你会变成鲜血淋淋的一堆烂肉。你如果是黑人，犯了罪就要按黑人进行处罚；你如果是个黑人，受了伤害，就谁也不会同情你。”

那黑人哈哈大笑，随即又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的手颤抖着，偷偷地挂上电话，就像每天夜里一样，比狄安娜先回到床上。我装作睡着的样子，狄安娜以为我睡得很深。她默默地回来躺下。我觉得她很快地进入梦乡了。尽管那天夜里她遭

① 英文：滚开，母狗……。

到辱骂、指责，她还是很满意，感到很轻松。我觉得卧室突然变得像冰冻一样寒冷，令人全身发抖。我张大着眼睛，成了卧室这块天地的俘虏。我像羊倌数小羊一样多次掂量着我们之间的情意，觉得拿我的感情和我刚刚听到的那种情意相比，我的感情毫无价值。听到狄安娜和那黑人之间的情缘，我应该承认，我的感情是不会持久的。也许我应该体面地结束现状，离开狄安娜，回到墨西哥城过以前的日子。那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自己的情意明显地减少了，但同时又慢慢地、无意地形成了另一种想法。这种想法虽比较模糊，却是从我的头脑里产生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文明生活尊重法律，野蛮生活蔑视法律。我不想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连想也不进一步去想，因为这和我因知道狄安娜有一个黑人情人所引起的痛苦不相一致。尽管如此，但我一想到黑人占了优势，就像想到白人占了优势一样感到厌恶。我不能受制于和狄安娜通话的那个陌生人。我用不到对狄安娜说，我不是“瘪三”，我适应不了黑人街上的那种节奏……我愿意成为真诚的人，我倒愿意和曾经扮演过胡亚雷斯的那个穿草鞋的牧羊娃在一起。我宁可帮助这个小胡亚雷斯，帮助他成为他曾经扮演过的那种人：白领的印第安人、懂得拿破仑法典的萨波特卡[①]人，一个笛卡尔派律师，一个共和党的讼棍而不是一个黄教信徒，一个讼师而不是与大自然和死亡打交道的巫师，一个给无生命物灌注生命的人，一个主宰众多不能自制的事物的人：总之是贫穷苦难中的大富翁。可是，我曾经为小胡亚雷斯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事也没有做。狄安娜的那个黑人（我决定称他为黑豹党人）很了解我，我却不了解他。他也许比我本人更了解我自己。他知道，如果我愿意，可以将他的一切全都夺过来，全夺过来。在美国历史上，黑人被阉割、绞死和私刑处死的很多。这些无辜的黑人都可以写成一部列传。那黑豹党人决定自己

---

① 拉丁美洲一土著居民。

不再成为牺牲品。当白皮肤的亚伯拉罕[1] 将尖刀刺进他黑皮肤的儿子依萨克的胸口时，上帝是永远不会挡住那只杀人的手的。

① 《圣经》中的犹太人祖先。

二十五

整个上午我过得很不痛快。到吃中饭时，我决定到俱乐部去转一圈，看看奥古斯丁·塞地略将军是不是和平时一样在那里。他按照老习惯，每天午餐前饮一杯白兰地。他请我坐下和他同饮。我喜欢喝啤酒，因为墨西哥的啤酒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啤酒都好。这使我感到自己有点沙文主义思想。不过，我还是感谢这样的感觉。我记得狄安娜曾就詹姆斯·保尔德文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由于都是美国人，他们对自己和相互间的了解胜过任何一个欧洲人对他们中任何一人的了解。对墨西哥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那天夜里，将军和我之间产生了阶级仇恨。但今天下午，情况正好相反。啤酒提起了我的精神，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要了两瓶"特华康"。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喝不到这种矿泉水。他请我吃饭，我们吃的完全是墨西哥餐，吃饭的方式也是墨西哥式。我们知道，只有墨西哥人才喜欢吃玉米。我们拿起一张热气腾腾的玉米饼（得选一张薄一点的），将它摊在手掌上，上面涂上辣椒酱，加上一些菜豆，然后，卷起来吃。我们不但一起吃地道的墨西哥饭，还说带有墨西哥腔（如爱用指小词）的西班牙语。这样，就为和他谈及我所关心的话题创造了合适的气氛。狄安娜和那个黑豹党人那种狂热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对话还在我耳中嗡嗡作响。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摆脱这一切。

“我的将军，那天夜里您说我的女朋友得当心点。为什么？”

“我的朋友，是这么回事。在职业上我可不是个疑神疑鬼的人，我也不喜欢对人跟踪盯梢。不过，无论这里还是那边，捣乱分子不少，这点请您能理解我。所以，我们希望索伦小姐不要由于自己行为不慎，自己也卷了进去。”

“您是指那边的黑豹党和这边的联盟游击队，是吗？”

“不完全是。我的意思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到处都是。所以，得当心点。这就是我想说的。”

“那我得怎么办呢？”

“您是内务部办公室负责人的朋友嘛。”

“您是指马里奥·莫亚·巴伦西亚吧。我们是中学的同学。他是我亲密的老朋友。”

“您上墨西哥城去看看他吧。另外，得注意点，看好您的女朋友。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嘛。”

当天夜里，狄安娜回来后，我对她说，准备次日去墨西哥城，因为业务上有些事要去那里处理一下。这次为了跟她上圣地亚哥来，很多事情都干了一半就丢下了。用不了几天，至多一星期便能回来。她忧伤地看着我，尽量想猜出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她以为我已猜中了她的秘密。反正往后的结局有好几种可能。谁知道呢？难道我们间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难道我会一去不复返？难道我妻子、女儿和在首都的利益将我拉向墨西哥城？

“我将所有的东西都留在这里：我的书籍、稿纸和打字机……”

“你将几支牙膏带走吧。”

她眼神中的忧伤丝毫也没有减少。

“我只带去一支，其余的东西全部留在这里作抵押。”

“作抵押？我喜欢这样。也许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了作抵押。”

“你可不能将上帝想像成犹太高利贷者。”

“不会的,我相信上帝,非常相信,你知道吗?我不能想像上帝让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成为庸碌之辈。”

“我爱你,狄安娜,”我对她说,并亲吻她。

二十六

到墨西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我的朋友路易斯·布纽埃尔① 打电话，约他见一次面。以前我每个月总要去看望他一两次，一般是在下午四时到六时。和他聊天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也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布纽埃尔不但是世纪的见证人（他和世纪同行，生于一九〇〇年），也是本世纪最具有创造力的人之一。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美的散文和其他的语言明快的文章。他们在语言方面要求明快得“自动进行写作”。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除了掀起一阵波浪外，对理性主义文化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将那肯定曾激励过拉伯雷和维庸的疯狂的气息还给它。像西班牙的布纽埃尔和德国的马克斯·埃尔恩斯特② 这样一些没有理论的超现实主义者却将本国的文化融入他们的艺术中。他们的一切都立足于遥远的回忆和古代的土地上，使往事具有现实的意义。通过重新想起这些，真正的现代性出现了：往事的外表，对发展带来的骄傲的提醒。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作家、流浪汉小说、塞万提斯和戈雅③ 是布纽埃尔超现实主义的父亲，而夜间超限度的想像和德国的神话故事则是埃尔恩斯特超现

①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电影导演。

② 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后加入法国国籍。

③ 十八世纪西班牙画家。

实主义的母亲。

布纽埃尔在巴耶区的家没有什么特征。不过，没有特征也是它的特征吧。这是一幢红砖三层楼房，跟世界各地中产阶级任何住宅没有两样。他家的客厅有点像牙科医生的诊所。尽管我从来没有走进这位艺术家的卧室去看过，但我知道他喜欢看未加装饰的砖墙，喜欢睡在地板上，至多睡在上面没有放弹簧垫子的木板床上。他这种苦行者般的生活方式和他那种严格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是相符的。对有些人来说，他的道德观是清教徒式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僧侣禁欲主义式的。他家里除了他年轻时（二十年代）由达利[1] 画的一幅肖像画外，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和达利反目成仇，但路易斯还是将这幅肖像画挂在前厅，一来是对自己年轻时代的怀念，二来，也是对已经消逝的友谊的回顾……

他常常在一家小酒吧招待客人。那家酒吧的柜台可以和利物浦港酒吧的柜台相媲美。它的设施跟纽约广场橡树酒吧（布纽埃尔喜欢在那儿喝他说的“世界上最好的马提尼酒”）一样好。这次他让人给我配制了一种味道好又能醉人的酒。他说：

“我每天得喝一公升酒精，总有一天会被酒精杀死的。”

“可您的气色很好，”我说。我钦佩他已七十高龄，还有这么强壮的身体：腰背笔直，胸部肌肉发达；两条膀子虽瘦一些，但很有劲。

“我刚刚去看过医生。我身上的病不少：肺气肿、肠炎、高胆固醇和前列腺肥大。这些病分开来看，我还是健康的；如果一起向我袭来，我就完了。”

平时他穿一件无袖运动衫，这使他那个像农夫和哲学家的脑袋显得更光秃了。一个秃脑袋，加上七十高龄，满脸皱纹，这使他的外貌很像毕加索，也像德·法耶[2] 和奥尔德加·

---

① 西班牙画家。

② 西班牙作曲家。

伊·加塞特[1]。西班牙的那些名人到晚年都像退休的斗牛士。布纽埃尔和戈雅是同乡，都是阿拉贡人。那里的人一般都比较固执，也特别喜欢幻想，爱做梦。他们梦见群魔乱舞，人和动物、昆虫进行对话。众所周知，蚂蚁是一种最善于进行相互交流的动物，它们的交流方式是长距离的心灵感应。我认为，路易斯·布纽埃尔是个对昆虫学很感兴趣的人。他们阿拉贡人就像蚂蚁一样，能够超越时空，通过心灵感应进行相互交流。他们通过梦幻、巫术和击鼓保持接触联系。

那天下午我去看他，他对我不太满意。他毫无保留地主张夫妻要忠诚，要白头到老。通过婚约结合在一起的一男一女结果又违反了婚约，对此他是难以容忍的。他公开责备我抛弃路易莎·古斯曼。他很喜欢她，在他导演的一两部电影里，她还演过角色。然而，在称赞夫妻关系的同时，布纽埃尔也不掩饰对性行为的恐惧。在他执导的影片里，很少见到裸体的镜头，除非剧情发展特别需要；也见不到接吻的场面，他认为这是“不端的行为”；更见不到通奸的场面。他的影片只有某种欲望，但在黄金时代的花园里流露出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他认为，这样才能保持炽烈的感情。

我看着他两只绿眼珠，它们似乎遥远得像我从来没有航行过的大海。通过他那双眼睛我似乎见到特里斯坦的那条船驶过去。特里斯坦是布纽埃尔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个精神恋爱的英雄。中世纪是布纽埃尔真正的时代，是他最自然的时代，他的目光就在这个时代里驰骋，只是偶尔在我们这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停留一下。我们应该将他看成、理解成过去时代的流亡者，从十八世纪来的外国人。他几乎赤身露体般地来到我们身边，只穿一件无袖运动衫，就像个只有一块遮羞布的深山老林中的隐修士。

路易斯·布纽埃尔从已消逝了的那个时代带来了性的观念。这次与他见面，他又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性是动

---

[1] 西班牙近代哲学家、文论家。

物的本性，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性是"兽性"。布纽埃尔说："性是一只毛茸茸的蜘蛛，是一只将什么东西都吞进肚里的塔兰图拉毒蜘蛛，也是一个进去了永远出不来的黑洞。"他耳朵已聋（这点他也像戈雅），所以，在他的影片里不配音乐，除非本来就有的，如电台里播放的音乐，街上拉手风琴卖唱的人和滑雪站上的乐队演奏的音乐。在他耳聋前拍摄的影片充斥着瓦格纳的 Liebestraum① 乐曲，有的甜甜蜜蜜，激情无限；有的如暴风骤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② 的音乐是歌颂精神恋爱的大合唱，那里没有性这个塔兰图拉毒蜘蛛。

"可是，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③ 却禁止精神恋爱，说只有让欲望越来越炽烈，激情才会越来越强烈……"

"现在您知道了吧，这就是性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具有刺激性之物的原因。没有罪孽的性就像没有放盐的鸡蛋一样。"

我每次总是落进他设下的圈套。布纽埃尔宣扬贞洁，目的是为了增大快乐、欲望和对爱情的躯体的渴求。他是圣奥古斯丁的读者。他明白，堕落意味着爱情的法则遭到了破坏。爱情有一条法则，那就是热爱上帝。人类爱自己就破坏了爱上帝的法则，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而且，越走越远，通过性的黑洞，走到死亡这个最后的洞穴。回到爱情意味着要经过贞洁之途。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得到帮助，如果让我们单独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从肉欲和肉欲的自我满足这个地狱中回到上帝身边，就像脱离地球引力一样难。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人就能飞起来了。

"那谁帮助我们呢？"我问布纽埃尔。

"当权者永远不可能，"他激动地说，"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界的权贵绝对不可能帮助我们。只有那些下等人、叛逆者、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孩子和恋爱着的人……才能帮助

---

① 德文：爱情梦想。

② 瓦格纳的歌剧作品。

③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神父。

我们。”

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着激情。我脑海里浮现了他影片中的人物：被抛弃的孩子、热恋中的情侣、遭唾骂的乞丐、由于笃信基督而受蔑视的神父等。这些人都放弃了世间的虚荣，只等待着兄弟般的拥抱。“那些叛逆者也帮助我们吗？”我问布纽埃尔。

“如果他们不服从任何政权，如果他们不抱任何私利。”路易斯回答了我的问题。

这些日子布纽埃尔正在酝酿一个电影剧本，但一直还没有动笔。这是一个有关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拉瓦萧尔的故事。他早先是个窃贼和杀人犯。他在法国的一个省里杀死了一个卖旧衣服的老人和一个年迈的隐士，还尸奸了一个伯爵夫人。另外，他还用匕首杀害了两个老处女，她们是一个铁匠铺的女主人。他干这一切都不是为了金钱。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宣称，他从隐士那里抢了钱，从铁匠铺那两个老处女那里也抢了钱，还偷盗了那个伯爵夫人陪葬的首饰珠宝。他这样是为了给无政府主义事业提供资助。

无政府主义者们没有为他祝福。后来，拉瓦萧尔移居巴黎，并找了一个叫西蒙（绰号叫“松糕”）的人当助手，开始制造炸弹，将它安放在法官家门口。不幸的是，“松糕”搞错了法官家的门，法官没有被炸死，遭殃的是几个行人。“这件事的本身就完全不是为了金钱，”布纽埃尔评论说。

只是等到拉瓦萧尔于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一日被处决后，无政府主义者才宣布他为自己人，并追认他为烈士，还创造了一个动词 ravacholizar[①]，意思是炸成碎片；还谱写了一首美丽的歌曲 Dansons la ravachole vive le son de l'explosion![②]

“走上断头台时，他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他是个私生子。由于脸色太苍白，他常常涂胭脂。”

---

① 这个词由“Ravachol”（拉瓦萧尔）加动词的后缀“izar”组成。

② 法文：让我们跳起拉瓦萧尔舞，爆炸声万岁！

“您赞成他的行为吗，路易斯？”

“理论上我赞成。”

“这怎么解释？”

“我的意思是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美好、崇高、自由的思想，它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在自己的头上，没有政权统治自己，没有锁链。这种思想太美好了，但就是太难实现，只能是思想上的乌托邦。否则，我们都变成兽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将我们引向死亡的黑洞。革命、无政府主义和自由都是思想上的奖赏，它们占有的唯一的位置是我们的头脑。”

他说，最美好的想法就是炸掉卢浮宫，让人类和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统统完蛋。不过，这只能是一种想法，却不能付诸行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划清思想和行动的界线呢？是什么迫使我们将思想变成行动，并使我们陷于失败和绝望？难道光进行幻想还不够吗？如果我们将每天晚上做的梦都变成现实，或者惩罚梦中见到的坏人坏事，那我们就都变成疯子了。难道有人能将梦枪毙吗？”

“是有这样的人，”我对他说，“不过，不是用枪，而是用矛。阿兹特克皇帝莫克特苏玛将梦中见到帝国的崩溃和征服者的到来的人全都召集起来，下令将他们统统刺死……”

他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七时。我得告退了。阿兹特克人的事他不感兴趣。他认为，墨西哥城是一座有着飞檐和破碎玻璃的保护墙。

二十七

我坐在我家的大客厅里，坐在我妻子路易莎·古斯曼的面前。我家在圣安赫尔区(这个区的路面全用石板铺成)。这房子我和妻子已住了十年了。我们每人手中都拿了一杯威士忌，互相对视着，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双方可能想的一样，也可能想的不一样。酒杯很沉，肚子大大的，底部很厚，像大西洋马尾藻海海底的章鱼眼睛一样突出。她怀里还抱着一只长毛绒熊猫。

我看着她思忖着。我对自己说，应该在自己的后半生做一点和过去不同的事情。我就是在想着这方面的事。然而，看她坐在我的对面，想着她的心事，就像我想自己的心事一样，我就希望开门见山，对她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路易莎·古斯曼性格比较孤僻，这些年来她不参加我的社交活动，也不干预我的财务方面的开支。从表面上看，她是不贪钱财的。她支持我的文学创作，对我作为一个作家和读书人，她在时间方面从不来抢占。她特别不对我的性生活横加阻拦。她认为，在这方面不闻不问，反倒会促使我回到她的身边。她便是这样的人。

这时，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就像她看着我一样，头脑中开始回忆起件件往事。我知道，每次发生什么事，她总是看得比我远。我第一本书出版后，反响较大，但她并不过分恭维我。二十九岁时我就有了点名气，但我自己并不感到太高兴，因为

我明白,文学创作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写得好时,我随时准备写得不好;写得不好时,我认为下次可能会写好。总之,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得冒很大的风险。我并不相信人们对我的赞扬声,因为我心里明白,还远远没有达到我自己设想的目标。我也对人们对我的攻击不加理会。我听着朋友们的声音,他们都对我进行鼓励。我听着我自己的声音,并且我只听到这声音:

"你别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便沾沾自喜。你下次取得这样的成绩就不容易了。你要对自己提出挑战。你由于目标定得太高而失败了,这也比目标定得过低而取得胜利强。不要只做稳操胜券的事,要敢于冒风险。"

我已不记得在我们相处的哪一个时期,路易莎感到我不满足现状,希望和她在一起,取得更大的成绩,也就是文学冒险中与之相当的色情成分。或者是野心。记得我们相爱一个星期后,有个相当有名气的墨西哥作家去拜访她,并对她说,她应该爱他,不应该爱我。想起这段往事,我们笑破了肚子。

"我这个作家比你的男朋友更有名、更漂亮,也更优秀,"他对她说。

令路易莎和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大作家跟她和我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他像发高烧说胡话一样的求婚失败了,但他见面时那一脸和蔼的微笑并没有改变。另外,我们也知道,他那种无止境的雄心也没有变。他的雄心壮志是有良好的基础的。尽管他自己对此有些悲观,但他肯定能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成就和荣誉。路易莎对我说(或者说,她向我证实),做一个有人情味的普通人比成为一个光荣的作家更有意义。不过,有时做一个通情达理的普通人比在文学方面出名更不容易。

现在,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我没有必要告诉她,我无法离开狄安娜·索伦。她也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怀里抱着那只长毛绒熊猫,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好像在指责我,在我们的关系中,我对她太不通人情了;还指责我那么轻易地拿文学创作

来掩盖我对她的残忍态度。她的两只眼睛似乎在对我说：

“你已经不是那种富有人情味的人了。过去你是那样的人，对你那种婚外恋情我没有说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你对自己也不尊重。你也不尊重跟你睡觉的那些女人。你利用她们作为文学的借口，我不想继续成为这样的借口。”

“这是你的过错造成的。当初我第一次和别的女人有关系时，你就应该说，就到此为止吧。”

“你真坏，怎么能要我……”

“多年来，你默认了我的不忠……”

“对不起了。现在我可没有所有女性的那种胡思乱想，想入非非……”

“你说得对，为了保持我们的爱情，我们就结束它吧……”

她用力将烟灰缸般沉重的酒杯朝我扔来，打中了我的下嘴唇。我以忧伤的眼神朝那只忧伤的熊猫看了一眼，并站起来抚摸一下疼痛的下唇，永远地离开了那里。

二十八

我没有见到马里奥·莫亚，他在布加勒斯特参加人口会议，过两星期后才能回来。我耸了耸肩膀。我想那件事也不是那么急。再说，有那么两星期左右时间，在圣地亚哥拍摄外景也可以结束了，我们也可以回到……狄安娜会去哪里呢？我又去哪里呢？我们能继续在一起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她丈夫在巴黎等候她。在洛杉矶，还有一个凌晨三点钟和她打电话的“黑豹党”在等她。在杰弗逊市，还有一个理想化了的已失去联系的男朋友。这是个中西部的特里斯坦，现在也许由于啤酒饮得过量，已是个大腹便便的药剂师了。

我不抱什么幻想。她不会和我去美国田园诗般的布满常春藤的乡村。我只是不愿意让我们一起在圣地亚哥度过的这段时光中断。至于今后呢？我们也可能会在墨西哥城住上几天，也可能在巴黎见上一面……我还幻想和她一起去我们都十分喜爱的海岛——马略卡岛过一个夏天。不久前，我曾和我的好友、女作家艾莱娜·西克苏在那里待过几天，狄安娜和伊万在那里还有房子……在飞回杜兰戈的途中，我想得很多，只是没有想到在未来的两星期时间里失去她后，将会怎样。在我的脑子里，一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一会又出现那样的可能性。我这次成为她情人是因为她真正的 Lover[1] ——黑豹

① 英文：恋人，情人。

党的首领没有被准许进入墨西哥。我是不是应该早一点跟她冷落，提前中断和她的关系呢？在这方面我是不是应该采取主动，免得由她来中断关系，将我抛弃，忘记我们之间的情意呢？

我从墨西哥城给她打过两次电话。在电话里我很难和她进行交流。看不见跟自己说话的人，我总感到非常不耐烦，很不愉快。我不能通过脸部表情来加强说话的语气。我也不知道和我说话的人只是一个人，还是有人相伴；穿上了衣服，还是赤身露体；是化了妆，还是卸了妆。谎言是进步付出的代价。科学技术越发达，我们在道德和想像力方面付出的代价越大，我们会随时听到谎言。

"我刚刚洗好淋浴，现在还是赤身露体的。我正准备出去。请原谅。我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

"我爱你，狄安娜。"

"话说得好听，说漂亮话不用费劲。"

"我想念你。"

"可你又不在这里，得了吧。"

"我星期五回去，我们一起去度周末。"

"我等得急死了，再见。"

我来不及告诉她，我怕她会出事，她要当心点。正因为如此，我才上墨西哥打听情况。我是为了保护她。我和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的关系非常糟，在那里我只有一个朋友，他是我的中学老同学，叫马里奥·莫亚，是内务部副部长，眼下他不在国内。

"我是为你的事才上这里来的，狄安娜，我在这里也是为了你。"我本来想这样大声地对她说。但由于对事情的处理还没有把握，"就别急着对她说了，"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关心的是和我一样急匆匆说话的这个女人脸部的表情怎样。科技的发展下一步是不是能使电话机前有个屏幕，可以看到和我说话的那个人的表情呢？如果那样的话，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打电话时，我们就得衣冠楚楚，头发梳得精光，还得化好妆。

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才大梦初醒，得迅速弄乱自己的头发："亲爱的，你把我给吵醒了，我刚才一个人睡得正香。"这时，身边有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身穿短裤，留着八字胡。他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着电视里的足球赛。

这时我头脑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狄安娜像一件艺术品，只有毁掉才能占有。性的问题和艺术一样，欢乐的中断就像吃了迷魂药，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这状态是情感和艺术的羊水。我能通过毁掉迷恋之物(即狄安娜)摆脱迷恋吗？换句话说，我是不是该采取主动，和她分手？还是应该立即使可能继续的欢快牢固地处于其唯一的气氛中，即模棱两可的气氛，也就是既能是"是"，也能是"不"的气氛中，任何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所有的一切都处在可能性的奇妙境地，在这境地中，一个事件或一种情感的变化在增多并呈扇形展开，从而在使我们的自由变为富裕的同时，也损害了它。

飞机于下午五时在圣地亚哥机场着陆。我始终未能对自己的问题作出答复。

从机场到狄安娜住处这段路程这一次对我来说特别长。随着商店关门打烊，像金属瀑布一样发出巨响的帘子拉上，城市那种令人生厌的气氛又出现了。只是见到摇晃着的树木和慢慢地笼罩着城市的群山的越来越大的阴影，才使人略感舒畅。我发现路旁的火鸡在惊恐地奔跑，露出围墙墙头的仙人掌上挂满了情人们的标记和名字，还写着"阿加比托爱科迪利亚"这样的字样。另外，还有一颗颗连系在一起的纸糊的心。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车子开得这么慢？"

"在进行游行，"司机说，"大学生又在进行抗议示威了。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地进行学习呢？搞得乱七八糟的。"

中心广场上闻到了硝烟的气味，天空笼罩着令人生厌的乌云。人们朝街口跑去，咳嗽着，有的拿手帕，有的拿衣服和报纸捂着鼻子。我想像这时州长一定站在窗口后面狂叫。这时，我见到学生领袖卡洛斯·奥尔蒂斯跑了过去，头上流着血。

“先生,请您关上车窗的门,坐好。”

汽车转了一个“U”字形的圈子,朝我临时住的那间房子(那里有我的书籍和稿纸)所在的那个区驰去。我觉得圣地亚哥的景色越来越暗淡了,城市居民的脸也看不清楚……

二十九

阿苏塞娜的脸部表情使我产生了怀疑。平时她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所以，谁也弄不清她的喜怒哀乐。上文我已讲过，有时我们谈得非常亲切。由于我们都说西班牙语，我们更贴近一些。有些诗句如“昨日已逝，明天还未来临”我们都在西班牙语中小学里学过。

我还讲过，我对她很尊重，因为她能自尊自重，为能做好在这个世界上她应该做好的事情而自豪。在搬迁到圣地亚哥的好莱坞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她是唯一的一个西班牙女人。她既不自怜，也没有向上爬的强烈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她高于她的女主人。她不想成为另一个女人，她已经是另一个女人了，这另一个女人就是她。

她在半明半暗的房子里迎接我，房子里显得出奇的寂静。她的脸部表情和平时一样，露出对住在这座房子里的另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1] 的同情和关切。开始时，我非常忧伤，就像诗人鲁道夫问他的伙伴，为什么默默无言地走来走去，为什么哭泣。“咪咪死了！”[2] 阿苏塞娜这次肯定也无意识地隐瞒着什么，她隐瞒的事情也许有点像死讯。

“狄安娜呢？”我原本想大声地问她，但实际上声音很轻，

---

① 指作者本人。

② 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中的情节。

仿佛生怕打断给圣母做的九日祭似的。

“你在这里等她吧，她马上就来，”阿苏塞娜回答说。她让我在客厅里等她。

夜幕已经降下。莱夫·库伯不在家。他和平时一样，在酒吧的柜台上为自己调制鸡尾酒。在野外拍摄影片很辛苦，他需要喝点鸡尾酒。卧室的门关着。可是，我的衣服在卧室里，那几根意大利牙膏在卫生间。我不耐烦地、生气地朝走廊的一端走去，那里放着我的打字机、稿纸和书籍。好像有人碰触过这些东西了，因为它们都很整齐地、对称地放成好几堆。

我又回去找阿苏塞娜，认为不应该违背我的写作习惯。阿苏塞娜没有找到，却发现我的情人狄安娜·索伦在那里，她仿佛被夜晚即将来临时走廊上暗淡的光线分为两部分，即一半是亮的，一半是暗的，就像安格尔[①] 有关女性画中的人物形象。她朝我走来，但她的身躯仍分为明暗两部分，明的一半丝毫也不让给暗的那一部分，暗的那一部分也不对明的一半相让。明暗的对比异常明显，连她那金黄色的短发也如此：靠窗的那部分看起来是白色的，靠墙的那一部分是黑色的。原来那迷人的风采由于她这一身打扮而不见了。这时，她穿一件玫瑰红带夹里的完全是在家里穿的长袍，扣子一直扣到喉头，脚穿一双带长毛绒的拖鞋。狄安娜·索伦的模样像一朵倒置的蘑菇，也像一枚大头钉……

并不是由于她像玩魔术一样突然在半明半暗中出现，也不是我出于本能而将她描绘的奇奇怪怪的外形阻止我走过去将她搂在怀里，像过去那样拥抱她、亲吻她。她没有走到我身前，在半道上就停止了，在身边的一张单人沙发(这是这简朴的房子里最像样的一件家具)上坐了下来，并着力地看了我一眼。我在工作台对面的一把藤椅上坐下后，抱着双臂，没有开口。也许狄安娜已猜中我在想些什么，也许她和我一样，在思考着用什么方法结束我们的爱情，接下去又将会怎样。我想

---

① 十九世纪法国画家。

首先告诉她，我这次墨西哥之行没有任何结果，我也没有去打听塞地略将军向我暗示的联邦调查局可能造成的威胁。我正准备说话，她却抢在我的前面，急急忙忙地说道：

“请原谅，我已经另有情人了。”

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惊慌，控制住内心的愤怒和好奇……

“他在美国吧？”我问道，但不敢向她提起我冒冒失失地在电话里偷听到的情况。

“就在本地。”

“谁？”我问道。现在我不敢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会回来，我只是在心里说，一个“黑豹党”目前至少还不会被允准进入墨西哥国境。“是那个特技演员？”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开始嘲笑自己。想到年老的莱夫·库伯可能睡在我的床上，睡在狄安娜的身旁，我更觉得自己好笑。

“卡洛斯·奥尔蒂斯。”

“卡洛斯·奥尔蒂斯？”

“那个大学生。你是在这个城市见过他。他说他认识你，敬佩你，还跟你说过话。”

“如果他恨我，不跟我说话，又会怎么样呢？”我竭力装出一副笑脸。

“对不起了。”

“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我们得好好谈谈。”

“我不喜欢进行解释。”

我生气地站起来，说：

“是得好好谈谈。”

“如果你想谈，那就谈吧。”

“为什么，狄安娜？我原本以为我们在一起是很幸福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关系是要结束的。”

“可不能这样突然结束呀，也不能在拍完电影前，跟一个小伙子……”

“比我还年轻，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这无关紧要。”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是伤害了你,侮辱了你?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做吗?”

“我们的爱情还没有完结嘛,还没有枯竭嘛,是这个原因……”

“我不认为我们的关系还有发展的余地。”

“狄安娜,我把自己能给的全都给你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可以一起到大学去工作,”我笨拙地说,我被感情上突然的冲击弄糊涂了。

看来她这样粗暴地丝毫也不念及我们原来感情地回答我,也是有道理的。

“你也别那样天真了。让我去那个布满常春藤的破烂的小城待下去,你疯了吧?”

“为什么说我疯了呢?你不也是从小城镇里出来的吗?难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给自己提供一个回家的机会,然后,再以全新的姿态从那里出来?”

“亲爱的,你在说胡话了。在那个小城镇里我闷得透不过气来,早已千方百计想离开了。”

我和颜悦色地询问她。我认为她也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她说了一些使我喜欢的话。她说,不要误解她的意思。她感到在杰弗逊城闷得慌的原因不仅是这个城市太小,而且也由于城市周围的大自然太辽阔了。这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世界。

“那么,在你选中的这个世界里,”我问她,“你感到受到保护了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狄安娜,是吗?你是不是需要得到别人的保护,得到某个教派,得到善良的人,得到黑豹党,豪富阶层,革命党和任何能大叫大嚷、哭哭笑笑、闹得鸡飞狗跳的人的保护?你一定喜欢这样吧?而这正是我这个成天坐在走廊的角落里搞写作的人不可能给你的。”

我正在做荒唐的事,我难以控制自己,做出连我自己也感到厌恶的事。怪不得狄安娜会这样对待我。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我大声地对她说,“你的问题就在这里。我听到你在电话里和一个黑人讲话,你想成为另一个女人。你想跟别人一样受苦,成为另一个女人。你以为谁也没有黑人受的苦多。你到什么时候才会明白,你这个傻瓜,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白人也不例外?”

“卡洛斯正在向我指明这一点。”

“卡洛斯?”我不仅像自己的声音,也像自己灵魂的回声般对她说,但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刚才还见到卡洛斯,他受了伤,参加了市中心的游行。

“他看过你的书,”她冷冷地说。

“他吗? 你刚才不是说过了。”

“我才不看你的书呢。我原来以为你是个真正的革命家,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但情况并非如此。你只说不做,就像美国那些自由派人士一样。”

“你真是发疯了,你什么也不明白。文学创作本身就是行动,而且是唯一的行动。你写到死亡时,总没有必要自己去死吧。你也没有必要在对监狱进行描述时,让自己关进牢里。你让人白白枪毙了杀死了,有什么用呢。这样就不能再写书了。”

“切·格瓦拉不是去让人杀害的吗?”

“他是个烈士,是个英雄嘛。比起他来,作家就平凡得多了,狄安娜,”我一直非常激动地对她说,不过,现在也许已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卡洛斯能上山去战斗,你却不能。”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你打算跟他去? 你准备去当他的女兵?”

“不,他的基地在这里,在这里进行斗争。不过,他不会永远跟我走的。”

“这样你可以更舒服些,是吧? 你知道,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不会跟你走的,除非他不去做一名战士,而是变成一个靠

你的钱过日子的人。可怜的狄安娜，你想成为另一个女人吗？你想成为世界革命的助产士？你想扮演与马尔科姆·埃克斯结婚的圣女贞德这样的角色吗？那你听我对你说吧。你得努力做个好演员。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亲爱的。你只是个懦弱的平平常常的演员。你是想通过大发雷霆来摆脱作为平庸无奇的演员的境地。你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地扮演让你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呢？你为什么不想扮演电影中的角色，却要扮演你只听人说起过的那种角色呢？"

"你什么也不明白。跟你我已经过够了。"

"我们一起过了一个月零三个星期加四天……"

"我已经看透了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我本应该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当时我认为你跟别人不一样，以为你的思想和行动跟马尔罗[①] 一样……"

"看在上帝分上，别作这样令人讨厌的比较。"

"你真天真，你也很正派。天真、正派，也很有文化！"

"这都纯粹是缺点，全让你看到了……"

"这不是缺点。我对你的文化水平非常敬佩，这是真的。这是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非常坚实。而且经典，当教授，经典的。"

"谢谢。"

"相反，那个小伙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这么恶狠狠地说过话，那粗野的样子，好像准备让我看一看月亮那被遮盖的一面。"那小伙子毛病可多啦：身上有恶臭；牙齿坏了，得去看牙医；吃饭那个样子非常难看。总之，这个人一点也不雅，粗鲁得不得了。我怕他会打我。尽管这样，尽管他有这么多毛病，我还是喜欢他，我觉得他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现在我需要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需要一个使我回到贫民窟，回到肮脏的地方去的人；他使我感到自己微不足道，迫使我从底

---

① 法国当代作家、政治家，曾积极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一九六五年曾代表戴高乐总统访问过中国。

层出来，重新参加斗争；迫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需要赢得一切……”

我跑过去拥抱她，我已忍不住了。她哭着，也使劲地抱着我。她一边抽泣，一边说：“你真疯了，我没有找黑人，也没有找游击队员。我只是想找一个跟你不一样的男人。我讨厌像你这样一本正经、有文化的人。我不喜欢名作家，不喜欢那种正经、高雅、西方式的人，尽管你自以为完全是个墨西哥人；我也不喜欢我丈夫那样的欧洲人。你是我丈夫的翻版，是伊万·格拉威的重现。这样的人我讨厌，我讨厌，我讨厌！我丈夫至少还参加过战争，被犹太人、顽童和穷人追打过，他是从俄国逃出来的。你呢？你逃避过什么吗？你受过什么威胁吗？你一直有着现成摆好的餐桌，总是跟随着我的后面，想赶上我，赶上我的想像力……你是我丈夫的翻版，只是伊万·格拉威比你更出名、更像欧洲人、更有文化、更雅，也是个更好的作家罢了。”

她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的眼泪咽进肚里。

“我不能容忍你这样的男人。”

她离开我，背朝着我，向柜台走去。我跟随着她。她双手颤抖着，给自己调了一杯冰镇威士忌加苏打。她还是背对着我说：

“请原谅，我并不想伤害你。”

“你好好喝吧，别为我担心，”我对她说，并将一只手放在她肩上。我做错了。

“别碰我。”

“我会想念你的，我会为你哭泣。”

“我不会这样，”她最后看了我一眼，这是她所有的目光——欢乐的、明亮的、疲惫的、空旷的、转瞬即逝的、孤单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利他主义的、修道院里的、妓院里的、幸运的、倒楣的和死亡的目光的总和。

她奇妙地、梦幻般地、几乎疯了一样地眨了几次眼睛，然后，说了下面的话：

"不要为我哭泣。十年后，你的这个 gamine[①] 就要成为四十多岁的老太婆了。你跟一个大屁股、短腿的鸫鸟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吗？感谢上帝，让你及时地离开了我。愿上帝保佑你，消灾祛病。再见。Desolé[②]。"

"Desolé。"

阿苏塞娜帮我整理好我的东西。我从卧室内取出自己的衣服。我用眼神问阿苏塞娜，那个大学生在不在那里。我们不说话也能沟通。她摇了摇头，表示否定。我不需要她帮我的忙。她倒是很愿意帮我的忙，免得我感到孤单，或者感到被人赶走，受人欺骗，遭人冷落。不过，她也知道，我不需要她的帮助。我使她感到，我很感谢她。我在将书籍、纸张、钢笔等物放进文件包里，并小心地包扎好打字机的同时，还跟她说了几句话。

"她也曾经是个初见世面的人。所以，喜欢帮助那些新手。"

我笑了笑。

"革命的助产士。这我已对她说过了。"

"她日子过得很烦。我说这话是认真的。她感到有人在迫害她。"

"我认为她是有道理的。过去我有时认为她神经过敏。现在我开始认为，她这样想是有道理的。这小伙子插进来，只会使她的生活更加复杂。"

"狄安娜喜欢冒险，你没有给她冒险的机会。"

"她也让我知道了这一点。请你告诉她，让她当心点。我这次去墨西哥城一事无成，未能给她帮上一点忙。但愿她和她新的情人过得很好。"

阿苏塞娜叹了口气，说：

"漂亮的女人并不想找个好看的男人。"

---

① 法文：调皮的女孩。

② 法文：对不起。遗憾。

我认为她说的这句话很残酷。我想像角色已经变换了。阿苏塞娜和一个美男子,这样的组合是不公正的。男人又赢了,女人从来不会赢。

在走廊里,我遇到了莱夫·库伯。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只是挤了挤眼。

阿苏塞娜快步赶到街上,将一样东西交给了我。

"这是你忘在屋里的。"

这是一只装满毛发的果酱瓶。

三十

忌恨杀死爱情，却杀不死情欲。这是不忠实的爱情对你真正的惩罚。你恨那个跟你中断了恋爱关系的女人，但心里总是想着她，因为她虽背弃了你，但你对她还是有感情的。这就是我和狄安娜的情况。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藕断丝连。我的理智对我进行强烈的谴责，但我却难以做到安于现状，将她忘掉。我还是想着她，满怀醋意。

二月的一个黄昏，在黑暗中我对圣地亚哥的那套住宅投以最后一瞥。它已变成了一座难以攻克的城堡。这套我过去可以随意进出，曾经每天在其中写作的房子，眼下对我来说已毫无关系，这使我对它产生厌恶感。我真恨不得像当年罗马人对伊比利亚的努曼西亚① 一样，将它包围，烧毁；也想和罗马军团对犹太人的麦萨达城一样，来一次大屠杀。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对它看了一眼，表示告别；同时，又在它周围转了一圈，似乎自己尽管难以进入狄安娜的心灵，但还想走进这套我们共同拥有过的房子。

命运将这个女人给了我，别的男人不可能从我这里将她夺走。那个我认为政见和自己相同的左派学生，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更做不到这一点……从市中心飘来一阵催人泪下的

---

① 古代西班牙一城市。公元前一三四年被罗马军队包围。城内居民奋勇抵抗，宁死不降。次年，城市被焚毁。

煤气的臭味。我这时真想让军队将我那个情敌抓起来，希望塞地略将军亲手将他的睾丸割掉。如果他逃跑了，我总有一天会找到他，并亲手将他杀死。想到这里，我冷笑一声，自言自语地说：

“我看还是让政府来对付他吧。”

诺尔曼·梅勒① 说，各种妒意就像一条画廊，而吃醋的人就是看管画廊的人。我回忆着和狄安娜相处的每一个时刻。现在，我的位置已被那个年轻的学生占有，他用我那种姿势，享受着我曾经享用过的乐趣，嘴里满是桃子的香味，还得到了狄安娜那种无比美好的爱抚。他已变成了映照女猎手倩影的湖水的唯一欣赏者。

妒意仿佛是我们的生命中的另一种生命。我原本可以坐上飞机，飞回首都，给朋友们打个电话，就可以重新投入写作。可是，现在我过的却是另一种日子。尽管这种日子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有它自身的特点。我们生命中的这种生命在肉体上表现出来。正如俗话所说，它在我们的肚子里给我们玩杂技。我们和松弛的阿泰依德一同出现在肚子里，这是事实，一阵狂野的、苦涩的、暴怒的潮水鼓荡着，向上升，又从心脏下降到肠胃，再从肠胃降到残废、无用、在战斗中受了伤的性器官。人们想要给可怜的阴茎挂上一枚奖章，然后是一个花圈。可是潮水并不庆贺任何事，也不在身体的任何部位逗留长久时间，它像毒液一样流遍全身。它的目的不是要催毁身体，而是要纠缠它，压榨它，以使身体的最坏的汁液上升到头部，凝固成绿色的坚硬的，就像蛇的鳞片一样，在我们的舌头上，在我们的呼吸中，在我们的目光里……

开始时，和狄安娜中断关系使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排除在生活之外，那感觉像是死了一个亲爱的人。只是这样的痛苦是可以表达出来的，而嫉妒的痛苦只能埋在心里使之暗淡，将它毒杀，以避免同情和变得可笑。你如果说出来，只会引起旁

① 美国当代作家。

人的取笑。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在这个不幸的时期里，我们公开做的每一件事（走路、说话、看）都会成为他人的笑料。嫉妒和青少年时期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使我们脱离了生活，过不好日子。不过，奇怪的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过不好日子倒不是像青少年一样怕被他人取笑，我是为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而感到伤心。狄安娜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我已过了四十岁，而我的情敌却只有二十四五岁。狄安娜今年三十二岁。我暗自发笑。一次，我在意大利想和一个十八岁的美国姑娘走进一家舞厅。门卫拦住我，说：

“这里只许年轻人进去。”

“我是她父亲，”我无所畏惧地说。

当年我只有三十五岁。现在，舞厅的门恐怕都得向我关上了。狄安娜说，她这样做，是为了我好，因为十年后，她就是个骨质稀疏的大屁股女人了。深感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对她说，她不会那样的，她可以成为另一种人，如果她愿意，如果她能专心地从事她的事业，不去扮演演员以外的角色……想到这里，我又想让自己相信自身拥有的长处。我只要认真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再过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不会老。这就是文学的威力。要做到这一点，条件是将文学的威力和其他的力量结合起来。我的情况呢，上文已经讲过，开始时的力量已经遭到了损失。在这方面，我很像狄安娜。我文学的圣火就像狄安娜演圣女贞德时的圣火一样，白白地消耗掉了，开始时的那种气势消失了。怎么样才能使那种火焰重新燃烧起来呢？

我带着一叠无用的稿纸从圣地亚哥返回。我将写好的初稿冷漠地看了一遍。此时的内心正在抽搐，正在燃烧。我知道，这些稿纸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还想千方百计予以出版。我在书稿里写的东西都有一个政治目的。如果没有人去阅读这些东西，我能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我是有意地在欺骗自己。我需要像作家一样进行自我欺骗，以便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下去。在我难以平静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

信念。作家的“读者”不在那里，这真正的读者正在等待他希望能读到的东西。这样的“读者”是作家通过想像加以创造的，以便让他阅读作者“需要”写的东西，而不是人们指望他写的东西。这样的读者在哪里？他躲藏起来了吗？需要去找他。他还没有出生？那就需要耐心地等他出生。作家啊，你把酒瓶丢进大海吧。你要有信心，不要背弃自己的诺言。尽管今天没有人读你的书，也要有耐心，等着吧。即使人们不喜欢你，也要有愿望……

这些话可永远也不能对狄安娜·索伦说。如果对她说了，她一定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对那些成熟的女演员来说，肯定会有重要的角色让她们演。”

狄安娜认为那是无稽之谈，是因为像她这样的人很难正确对待自己取得的成绩。

当初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特别喜爱她。现在，我又喜爱她了。想到了这一点，我就不那么嫉妒了，我就能正确地对待和她的分离，正确地对待和以前那样的生活的中断，正确地对待被她逐出家门。我现在和她的距离又缩小了一些。我认为她是一个最终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女人。她是一个命中注定要过孤寂的、流亡生活的外国女人；是个注定要感到绝望，得不到宽恕，最后再次陷入孤寂的女政治积极分子；她也是一个命中注定要堕落、被人遗忘并再次永远陷入孤寂的成熟的女演员。狄安娜·索伦的历史是她一再陷于孤寂的历史。狄安娜是个孤寂的女猎手。

她和我都有这样的共识吗？答案只有一个。我愿为她献出一切，而她却什么也不愿为我献出。

接受这样的现实表明我已永远地离开了狄安娜，抛弃我们将会重逢，或者再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浪漫的想法……也许我们之间只存在着一条联系的纽带。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事写成小说，让那些想摆脱目前的恋爱关系，但又不想伤害任何人的人阅读。不过，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我想到了路易莎。就在我对狄安娜的妒意吞食着我的同时，我对狄安娜的爱情也在死去。这种爱情我想还给路易莎。和她在一起我没有任何妒意。她能接受我向她毫不掩饰地表示的三角爱情。实际上，我再次欺骗了自己。

的确，路易莎再次接受了我们协定的条款。这不是她软弱和顺从的表示，她是很坚强的。尽管我们之间发生了种种历时短暂的情况，但我们的协定却始终是有效的。我们有一个家，一个女儿，一群朋友。这一切都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能一天天地维持下去，而和狄安娜在一起，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说，我只是自己欺骗了自己，将来还会出现难以抗拒的诱惑。那些外国女演员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会感到寂寞无聊。她们想找人做伴，但不愿担风险。她们之间常常提到男人的名字，说某人在印度，某人在日本，某人在墨西哥。“绅士们会请你出去散步，他们都长得仪表堂堂，聪明多情，行为谨慎……”见到这么些美男靓女在街上走过，怎么能禁得住诱惑呢？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这个年满四十的人也是女演员们提到的那些男人中的一个。我怎么能拒绝这种镜子中的游戏呢？在这游戏中，激情和妒意，欲望与爱情，青春与老年，爱情的协定与魔鬼的协定，就像在镜中看到的图象中的图象中的图象一样，相互映照着。但愿最后审判日[①] 晚一点到来吧，让我好多享受一天青春，多享受一天性爱、妒意和欲望……但也多享受一天我和路易莎订的君子协定。我能指望多久？

路易莎没有欺骗自己。“他总会回到我的身边的，”她常常这样对我们的朋友说。她知道，在不断涌现的波涛中，沉淀着一种必要的稳定。有了这种稳定，爱情和欲望平平和和地连在一起，而不需要妒意来增加情欲，或是需要罪过来感激爱情。长着一张极其漂亮的混血种女人脸蛋的路易莎耐心地等待着这不可避免的一天的到来。到那时，只要一个女人就能为我提供我需要的一切。只要一个女人，不过，这女人不

---

① 或译“世界末日”。

是她。

狄安娜走了。她是在墨西哥的雨季开始,空气在一天之内时而像水晶一样,时而像金子一样的时候走的。

三十一

狄安娜·索伦这出戏的最后部分我是在报上看到的。

她离开墨西哥时已怀了孕。这点我当时并不知道,而联邦调查局却十分清楚。他们掌握了这样的情报后,决定毁掉狄安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她是好莱坞“激进分子”中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她有一定的知名度,她为激进分子的事业提供自己的名望和资助。我认识狄安娜时,她已是黑豹党党徒的支持者。我在上文已经叙述了我在夜里如何通过电话获悉她和黑豹党的关系。我对她支持黑豹党的情况略知一二,而联邦调查局却对其中的细节不甚清楚。我想,美国的广大民众对马丁·路德·金的融合政策和马尔科姆·埃克斯的分裂政策是分得清的。我认为,在我讲到的那个年代里,许多美国白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我的朋友)都支持金为实现进步的理想而进行的抗议示威。他主张通过黑人争得白人享有的权利,让黑人逐渐地融合到美国的白人社会中。马尔科姆·埃克斯的主张正好相反,他鼓吹黑人和白人分开,建立一个与白人世界相对立的国家,因为白人世界不接受社会的公正。如果白人世界本身也是不公正的,那么,怎么会公正地对待黑人世界呢?说到底,这两个世界被肤色分隔开,却被痛苦、暴力、吸毒和贫困连在一起。

这种对立需要一座桥梁。狄安娜在巴黎认识了詹姆士·保尔德文。这个作家至少在两个方面和她有相似之处:流亡

国外，十分孤寂；想寻找一个美国人，建立兄弟般的友情。保尔德文在两个极端之间，倡导永远怀疑论，有意把水搅浑，让谁也不信能轻易地取得公正；或让人相信，种族的不平等是命中注定的。这是同一种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保尔德文不主张黑人受屈辱或白人发善心式的融合。他也不认为，黑人之间的团结是与白人进行斗争的一个环节。他认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应该亲如兄弟，仅此而已。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你看着我，”保尔德文对狄安娜说，“你看着我，并就藏在我黑皮肤下的生活、愿望和人道等问题扪心自问……”

从狄安娜夜间进行的多次谈话看，我认为她是这样想的。她希望坚定地进行反对种族主义和白人伪善的斗争，但她也坚决反对黑人世界和白人世界彻底分开。我认识狄安娜后，便认为她这样做的道理是很清楚的。狄安娜·索伦想成为另一个女人，实际上是想恢复她原来的样子。她铤而走险，将黑人理想化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联邦调查局和克格勃、中央情报局、盖世太保或皮诺切特的国家情报局一样，需要使世界变得简单些，以便清楚地指明敌人，将他们毫不含糊地消灭。各种政治警察机构是现代世界及其利益的保镖。这些机构中的人为了保持住自己的职业和经费，为了养家糊口，需要找到自己的敌人。

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华盛顿作出决定，认为狄安娜·索伦完全可以充当这个角色。她有名望，人也长得漂亮，又是白人，还扮演过从事激进事业的圣女贞德这个人物（当初我叫狄安娜为革命的助产士，想不到我这个比喻竟残酷地变成了现实），因此，就成了联邦调查局暗中注意的对象。侦探机构正在等待毁掉她的时机。这里有一个机会的问题。狄安娜·索伦是容易被毁的，毁掉她比谁都容易。她认为，社会不公正不仅可以通过政治来进行斗争，还可以通过性，通过爱情等浪漫的手段进行斗争。这使她成为非常容易受攻击的人。当情报

 机构获悉她已在墨西哥期间（或稍后一些时候）怀了孕，便认

为利用她的弱点，对付她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我终于明白奥古斯丁·塞地略将军那时节提出的警告。我咒骂自己当时没能在墨西哥城找到马里奥·莫亚；或者说，当时太相信狄安娜了，有时又太瞧不起她了（说她是偏执狂）；后来又不应该醋劲大发，不能自拔。不过，说到底，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再说，上面说的这一切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难道我是她父亲吗？当然不是。当时我们也是小心翼翼的。而在与狄安娜的关系方面顶替我的那个卡洛斯·奥尔蒂斯也很小心，这是非常可能的。她将他看成革命英雄，而将我视为她丈夫令人讨厌的翻版。

然而，一个墨西哥革命者是不可能有充分的象征力量让美国广大的清教徒式的、民主的白人民众作出反应的。这就如同是与马龙·白兰度生一个儿子——萨巴塔万岁！一种可效仿的异国经验。一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也可能是灰色的）电影明星，她是瑞典移民的后代，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是喝着加苏打的矿泉水，看着米凯·罗纳的电影长大的；她毕业于当地的高中，是当地的足球队员们都喜欢的女朋友，其中有个健壮、有劲的小伙子特别喜欢她；她托神灵的庇佑，在有二十万人[①] 参加竞争的情况下，被选中扮演一个圣女的角色；她富有、自由自在，和一个名人结婚，受白皮肤上帝青睐，居然屈尊来到了各种种族的人混杂的下层。一个有一定地位的女白人竟投到一个男黑人的怀里，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果生了孩子，那就是个“穆拉托”。一般地说，“穆拉托”是男白人和女黑人的产物。男的可能是种植园的主人，出于一时冲动……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父亲是白人，即家长是白人。可是，如果一个女白人当了家长，生了一大堆私生子呀，混血儿呀，那就会使人厌恶，就连头脑非常自由化的人也会感到恶心。所以，这样做是不行的……

联邦调查局很有耐心。他们一直等到狄安娜的肚子大得

① 上文说是一万八千人。

一目了然。批准污蔑狄安娜的计划使用了以下的言词:“狄安娜·索伦对黑豹党进行资助,应该受到惩处。目前她已怀孕,是×××(她情人的名字已被删去)干的,这为我们提供了良机。”

联邦调查局采用了如下手段。

洛杉矶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电影方面的专栏作家中散布谣言,并散发一封由一个杜撰的人签名的信,内容如下:

“我很想念你。我记得,我还欠你一份情呢。告诉你吧,上周我在巴黎,偶然见到了狄安娜·索伦,她现在肚子已很大了……开始时,我还以为她和伊万破镜重圆了。可是,她却跟我说了心里话,说孩子的父亲是黑豹党的某人(名字已被删去)。正如你知道的那样,这年轻女人十分活跃。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让你首先知道……”

好莱坞电影界的专栏作家撰文重复这一谣传:“即日讯:著名女演员D小姐即将分娩。据云,孩子的父亲系黑豹党头目。”消息四散传播,达到极高的可信程度,获得了比《圣经》还多的尊重。同时,这一则小消息还在一份美国在全球发行的周刊上发表。这是在圣地亚哥广场边的药房里都能买到的美国两种周刊之一。当年我去那里买牙膏,有个年轻学生走过来,请我过去跟那群学生谈谈……

“对不起,”当时我对他这样说,现在觉得好笑,“我不想牵连我的美国朋友。我是她邀请来的客人……”

那家周刊首次点了狄安娜的名。她和伊万控告那家杂志犯诬蔑罪,他们因此可能得到了大约一万多美元的赔偿。

据我所知,接下去的情况是,狄安娜早产,而且是剖腹产。孩子出生三天后,就死了。

产后一周,狄安娜从巴黎飞到杰弗逊城埋葬孩子。她将孩子的尸体在殡仪馆进行展示,小城的人全都去看了,因为他们想弄清孩子是什么肤色。

“不是白种人。”

“可也不是黑人。脸部的特征不是黑人。”

“谁知道她会跟一个黑白混血种人有关系呢，他们也太会骗人了。”

“你怎么知道这孩子真的是狄安娜的呢？将那个生下来的小黑人丢在垃圾桶里不就得了吗？”

“你的意思是买了一个白孩子的尸体，拿到这里来展示？”

“那得花多少钱？”

“这样做合法吗？”

“你好好地看看吧，这可是个白皮肤的孩子。”

“你别弄错了，这孩子的皮肤是黑乎乎的。”

“那谁是孩子的父亲呢？”

“她丈夫说是……”

这话在排队看孩子的好奇的人们中引起一阵哄笑。

狄安娜·索伦没有理睬他们。她正忙着给安放在白色棺材里的婴儿的尸体拍照。她给死孩子拍了一百八十张相片。

三十二

我是在七十年代末认识伊万·格拉威的。我们一起在我们都认识的女友加夫列拉·凡·苏伦在荷兰乡村的城堡里度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加夫列拉是个讨人喜欢的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爱好园艺，是英国公园优秀的设计师卢塞尔·派格的朋友。她还写了一本有关卢塞尔·派格的专著。

城堡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在荷兰的平原上看起来，更是个庞然大物，像一座山一样耸立着。加夫列拉决定使荷兰平原上宁静、牛羊成群的自然景观看起来更广阔、更完整、更漂亮，她想通过富有巴罗克式的想像的一系列建筑达到上述目的。

加夫列拉家的花园有许多奇妙的东西，其中尤以高大的树篱筑成的呈完整的几何图形、总的形状像蜗牛的迷宫最为突出。这迷宫只有站立在城堡的顶端才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走进迷宫，便立即迷失方向，也看不清它的形状了。加夫列拉一共邀请了三十位客人。我们都先后走进了这座迷宫，辨不清东南西北，一直等到性格活泼、聪颖的女主人笑嘻嘻地进来，才将我们领了出来。

我妻子向来害怕走进找不到出口的地方。她没有参加迷宫的“探险”，陪着加夫列拉参观佛朗斯·赫尔斯·德·哈莱姆博物馆。我有意让自己迷失方向，所以，参加了“探险”。我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使自己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其次，我认为，怀

着能走出来的勇气走进迷宫，那肯定会成为迷宫里的那个牛头怪的俘虏。相反，迷失方向后，如果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那一定会使牛头怪感到高兴，消除它的疑虑，使它变成盟友。当年忒修斯能这么干就好了。

我当时没有遇到阿里阿德涅的那条线。不过，当我在迷宫中和伊万·格拉威面对面地碰上后，我就想，狄安娜·索伦就是那条线。凭着这条线，我们当时能互相信任。其实，我在加夫列拉家星期五那顿丰盛的午餐和晚上的晚餐上已见到过他。晚上，主人要求我们穿晚礼装，在男人中，只有伊万是个例外。他穿一件我只能和照片上见到的斯大林或毛泽东的服装相比的上装，那是一件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的灰色长袖外套，衣服显得特别长。它的样子也不完全像七十年代在第三世界流行的那种所谓毛式服装或尼赫鲁式服装。不过，伊万·格拉威的服装仿佛真的是在红场上买的，或者是从哪一个政治局委员那里继承下来的。我最后一次见到这种服装是在早已被人们忘记了的那个马林科夫[1] 的照片上。赫鲁晓夫后来就穿西装，打领带。伊万·格拉威穿那样的服装(他在城堡的三个晚上一直没有脱下来)或许出于对已经丧失的那块俄国天地的怀旧，这里面既有幽默的成分，也有伤感的成分……

我们再次见面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不可能以别的方式互相说话了，”伊万说，“我们只好在迷宫里见面了。”“为什么？”我问道，“我从来没有对谁说起过什么，也没有谁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再说，我们是在另一个国家。那娼妇已经死了。”我突然这样说，既出于好奇，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也确实想促使伊万在迷宫里这短促的时间里对这件事作出反应。我感到，我们待在这个人造的、谁冒冒失失地走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迷宫里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在里面待的时间比机场海关出口处待的时间还短，真使人感到惊奇。

“问题是你还不了解爱上这样的女人的难处。对她你既

---

① 五十年代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总书记。

帮不了忙，也无法改变她，更不能舍弃她，"他说。

我同意他的说法。狄安娜对我来说，已属于与我无关的往事的一部分了。八年前，我就和我新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她是个健康、具有现代气息、积极、非常漂亮的、独立的年轻女人。我们已有两个孩子。我们的性关系、爱情关系和个人关系是建立在独立的，谁也不依附谁的基础上的。我们都知道，要继续保持我们的关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将这种关系看成是非常保险的、已经习以为常的、无需作出任何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远远地离开了狄安娜，远远地离开了往事，我觉得反与我喜爱的已得到恢复的文学创作离得更近了。我没有将在圣地亚哥狄安娜身边写的那些文稿焚烧掉。我在这些草稿的基础上，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和信心，一举写成了正在等待着我，召唤我，能给我一生最大的喜悦的作品。我一直不想将这部作品写完。和我以往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拥有的读者最多。这些聪明的、与我接近的、经常阅读的读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部小说出版后，我拥有了自己真正的读者。他们都想有所创造，有所发现，他们想从我的小说里找到社会结构最不稳定的人物，找到不是心理上枯竭，而是生活上无依无靠的人们。在我的小说里，交流和思考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的，语言、历史和时代都是重要的因素，就像人物一样；我的小说是时间相交，人物相聚的地方。否则，这些人物是永远无法接触的。

伊万·格拉威和我相遇态度相当亲切。我对他谈起马洛[①] 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他没有生气。"我们都是作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接着，他又说，关于狄安娜的命运，我应该明白两件事。他和她都没有对联邦调查局的污蔑（说他们白人的基因中突然产生了种族主义）表示抗议。毫无疑问，联邦调查局是打了这张牌。对联邦调查局提出抗议可以理解为自己对黑皮肤的婴儿产生厌恶感。他们（狄安娜和伊万）已看

① 十六世纪英国剧作家。

到了这一圈套。令狄安娜生气的是联邦调查局在两性关系上大做文章，将她说成是泄欲的工具，说成是饥不择食，就连黑人也要的白种女人。“说到底，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孩子的父亲并不是黑人，这点你我都很清楚。那婴儿也不是黑人。”

“难道有必要将孩子的尸体在杰弗逊城展示吗？我以为她倒不在乎周围的人会对这件事说些什么。”

“有这个必要，因为她不想让人们说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原本是个活泼、平和的乡村小镇上出生的姑娘，在中产阶级家庭里过着安定的生活，过着圣诞节和感恩节……”

“那她也有必要对孩子的尸体拍照吗？我认为……”

“她想为自己的死留下证据。就为这个目的。她想知道，将来自己死了，尸体运回小城后人们会对她怎样；她想趁自己还活着时看看人们的表情，听听人们会说些什么。这婴儿可以理解为狄安娜的替身。这孩子是无辜的，是纯洁的狄安娜的再世。你已看到了吧，这娼妇早已想死了，随时准备着死。”

“对不起，Je suis désolé[1]，”我说，又想起了狄安娜。

他挤压了一下我的手臂。

“她是想通过政治之外的自己并不理解的东西来反对压迫。她以为，两性关系和浪漫的生活将是她对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两性关系本来就乱得很)作出的贡献。她不知道，事物会引起连锁反应，你见到了吗？叛逆导致两性关系的混乱，两性关系混乱引起酗酒，酗酒导致吸毒，吸毒引发恐怖、暴力、疯狂……”

“这么说来，应该将她看成是不想抵制，看成是一个对自己没有准备的世界的坏事缺乏抵制能力的乡村小城的女孩子……”

“也不是这么回事。反正我当时是爱她的。对不起，我现在仍爱她。”

---

① 法文：很抱歉。

“我现在已不爱她了。”

“她真是够天真的。我多次告诫过她，那些民主政府都知道，控制革命运动的最好方法是再创造一个革命运动，不像专制政府那样动刀动枪。民主政府的办法是创造一个运动，控制它，使自己拥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敌人。她从来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落入圈套。联邦调查局决定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捅她一刀。”

“我以为你会保护她的。”

“我当然要保护她啊，亲爱的朋友。狄安娜·索伦可是个有理想的人物。她承担着她这一代人的理想，但是，她无法战胜腐朽的社会和道德败坏的政府。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你应该这样看她这个人。”

这时，我们听到了加夫列拉愉快的声音，她已走进迷宫来寻找我们，叫我们去吃饭……

三十三

有关狄安娜之死的一种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是那个加泰罗尼亚女秘书阿苏塞娜告诉我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巴塞罗纳的码头和她偶然相遇。我是去那里看望一个朋友的。她叫卡门·巴塞尔斯，是个出版商，想请她出点钱。我想请她对厄瓜多尔小说家马塞罗·切利波加进行资助。除了我和何塞·多诺索[1]外，这位作家已被大家忘了。这太不公平了。他眼下在基多外交部当名小职员。这高原地区使他憋气，加上事务缠身，使他难以从事写作。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阿苏塞娜的出现使我回忆起在墨西哥相处的日子和她总是那么体体面面的模样给我带来的愉快的感觉。我们朝恩惠广场（我就在那里下榻）走去的同时，她低着脑袋，对我讲述了有关狄安娜和她自己的一些情况。她说话很严肃，很客观，没有伤感的情调。

阿苏塞娜陪狄安娜去美国，在杰弗逊城埋葬了婴儿。在巴黎飞往纽约，再到衣阿华的途中，狄安娜一直非常平静，脸上露出淡淡的、几乎难以觉察到的微笑，心里想着和她同行的装在白色棺木里的婴儿的尸体。她这条线路已经飞行了十几次。从肯尼迪机场飞回戴高乐机场的途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狄安娜说自己去上厕所。过了三分钟，她裸露着全

① 当代智利作家。

身，从飞机上的厕所走出来，大叫大嚷地在飞机的过道上奔跑。当时谁也不敢碰她，不敢拦住她。后来，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将她拦住，并拿一块被单裹住了她的身躯，让她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这时，她突然又平静下来了，只是眼睛一个劲地盯视着头等舱里坐在阿苏塞娜旁边的那个黑人旅客的眼睛。阿苏塞娜给她服了几片镇静剂，并向空姐保证说，在以后的途中，狄安娜会平静地睡着。

之后，狄安娜在巴黎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她和伊万在拉斯帕伊大道旁同住一套公寓房，但和他已不再保持夫妻关系。她常常去巴黎的酒吧和旅馆寻找年轻人，特别是那些玩世不恭、吸毒的嬉皮士。那时，她也已开始吸毒，这自然是她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女人必然会走的一步。吸毒和酗酒属同一范畴。狄安娜这时又酗酒，又吸毒。

听了阿苏塞娜的叙述，我终于弄明白了这个和我短时间相处的情人的真实情况。她什么都喜爱，但不是吝啬地或者利己主义地喜爱，恰恰相反，她不但对自己慷慨，而且对她接触过的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人也非常大方。无论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乡村里的人、好莱坞的人、她丈夫让她认识的巴黎知识界人士、六十年代的那些叛逆者、自由派人士还是黑豹党人和墨西哥的革命者，她都相处得不错，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谁也没有觉得她讨厌，或者认为她和她的过去不相一致。过去是她还没有完成的义务，这义务即使她失败了，也应该承担。

"正因为这样，她才什么也舍不得抛弃，还带了孩子的尸体回衣阿华，是吗？"

"我也说不清，"阿苏塞娜简洁地回答说，"不过，狄安娜确实受了不少罪。她卷进旋涡去后，便永远也出不来了，当然也不会卷进另一个旋涡了。"

她想保持苗条的体形好回去拍电影。节食进行得太快，她身体变得很虚弱。她增大了酒量，多饮酒，以消除内心的恐惧。饮酒过量使她全身浮肿。她不再饮酒，却增加了吸毒量，想用这种办法减肥。她在几家医院住过院。住院期间，她总

是重复地做一些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阿苏塞娜每天去看望她，见她从床上起来，进卫生间大小便，吃早餐，在洗脸池里洗衣服，打扫床铺，然后又躺下。每干完一件事，或者说，每过两三小时，她就得吸一次毒，这大大地损伤了她的健康。打扫完房间后，她便躺下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她又起来上厕所，这样，新一轮重复性的动作又开始了。

她常常看着阿苏塞娜，态度和情绪相当复杂。她是偷偷地看这个加泰罗尼亚女人的，为的是肯定对方也在看自己，以便弄清自己在干些什么，尤其是自己在说些什么，对方是不是同意自己的言行，是不是赞赏自己作的努力和每一个行动的重要意义……

狄安娜在巴黎附近的一家收容所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收容所在河边，从那里往外看，只能透过带铁栅栏的窗子看到工厂的烟囱。在那里狄安娜又开始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的容颜，仿佛试图回忆起自己的存在。她用手按摩脸部，这样的按摩每天都进行。她就用这种办法保留住了脸容，否则，它早就毁掉了。

可是，有一天阿苏塞娜发现狄安娜的手指并没有沿着脸部四周移动，倒好像是在脸部画着什么。这种情况阿苏塞娜越是朝前走去，便看得越清楚。阿苏塞娜不想去惊动她，只是怀着又惊又忧的心情观察了好几天，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狄安娜的目光继续注视着窗边的那面镜子。原来这女人是用手指在自己的脸部勾勒工厂烟囱的轮廓。她喜欢外部世界，想创造它。可是，她只能对着结满霜的镜子用手指在脸部将它画下来。

她躯体内部已经死了，内部比外部死得早。陪伴她的那些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她的保镖，或者是她的看守。他们也陪她吸毒。她今天将这些人看作朋友，明天又将他们看作敌人。她逃离他们，去里昂站、奥斯特利茨站和北站[①] 等客运

---

① 里昂站、奥斯特利茨站和北站都是巴黎的火车站名。

车站前面那些旅馆前厅找一些不认识的人。那些只有微不足道的、无名的、商业旅行者的车站。这些人是谁呢？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辎重的性爱，任何东西都不会真正地进入到她的生活中，因为她什么也不放开，而过量的行装已经更重更昂贵了……

“她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简单一些。后来，她就只吃狗吃的食物。”

“谁也不给她工作。她在构思一部奇怪的电影，”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巴塞罗纳码头上一家咖啡馆里阿苏塞娜对我说。“在这部电影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所有的事又同时发生，同时出现了四个场景，这些场景里没有人，只有地点、色彩和感觉。第一个场景是沙漠，那是墨西哥；另一个场景都是石头，那是巴黎；又一个场景都是光线，非常多，那是洛杉矶；最后一个场景是雪和夜晚，那是衣阿华。狄安娜将这些场景统一起来，变成一部电影。这样，她就走进电影里去。”

“你知道吗，阿苏塞娜？我想回过头去，到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去再看一遍。这是最后一次。”

这是狄安娜对阿苏塞娜说的最后一次话。

三十四

七十年代末，一天夜里，我在巴黎一家餐馆和狄安娜相遇。她盯着我微笑了一下，但没有将我认出来。她已形同死人，只是还没有合上双眼。她的微笑不对着任何人，她的目光也漫无目标。一具可怜的肉体。一副病态的美貌。想起她这个样子，我头脑里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当时能不能帮她一把呢？她到了那个地步，见了我也认不出来，我是不是有责任呢？要是当时有一个美国中西部的小伙子，能使她永远幸福吗？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生命没有得到净化呢？对于无法进行解释的事物我也不能解释，周围的人们也不能进行解释。

三十五

几年后，我坐上了从洛杉矶直飞纽约的飞机。我刚刚在加里福尼亚几所大学作了一系列的讲座，这次决定多花点钱，坐在飞机的头等舱里，好让自己在六个半小时的飞行时间里休息得舒服一些。头等舱里的旅客很少。我们大家就坐后，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专门将一名衣着华丽的妇女领到头等舱前排就坐(当时有这样的服务方式)。这是一个穿着短裙的女黑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既高雅又俗气的香水味儿。她的腿很长，肌肉非常完美，乳房十分发达，只是肚子像做了母亲一样，也像被征服的非洲和美洲的女神。脖子的肌肉绷得很紧，表明这头母狮(她的模样很像一头母狮，因为她的头发像狮鬃，五彩缤纷，红、黄、黑，各种颜色都有)过去饱尝艰辛。我当然认识她。她叫狄娜·杜纳尔，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痛苦和谦逊，她没有摆大明星那种不可一世的架子。她那一双缺乏睡眠的眼睛仿佛在对自己说：“我没有权利那样做，尽管我是有这个资格的。”她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旅客，但却希望我们在她唱的歌曲中的人性方面引起共鸣。她坐在第一排靠窗的座位上，脱下鞋子，带上墨镜。一位空中小姐殷勤地给她盖上一条柔软的毛毯，让这位歌手能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以消除疲劳。

我不想一个劲地看着她，不想成为好奇的人，也不想做这种不该做的事。我只是想起了狄安娜·索伦过去不停地听着

的那首歌，Who takes care of me? 谁关心我，并再次向这头仿佛裹在自己的毛皮里的睡着了的母狮投去一瞥。我对这位曾经被人瞧不起，受到过打击和嘲弄的女人表示敬佩。她出人头地后，却没有对欺侮过她的人进行报复。她没有要求处死什么人，也没有要求将任何人投入监狱。她用自己的声音、躯体和灵魂赢得自身价值，改变世界，却又不牺牲上述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她的艺术、她的种族和她的精神……可怜的狄安娜，你貌似强大，却在反对世界弊端的斗争中不能自卫；了不起的狄娜，你看起来很弱小，却学会了保护自己以免受世界各种势力的侵害……

三十六

过了好多年，利用去美国中西部作巡回演讲的机会，我到衣阿华去了一趟。当初狄安娜曾对我提出请求，说："你得帮我再创造我的家乡。"我对她说不，"我跟这件事不相干。""我家乡的模样你在许多电影里见到过吧，"她笑着说，她知道我喜欢看电影。"见到过，所以，我知道，"我对她说。在电影中见到过的那个小城镇总是那个样子。米高梅电影制片厂常在那里拍电影，高中的女生们都爱上了导演米克·罗纳。米克·罗纳在粮仓内拍电影。这小城镇有一条主要街道，还有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理发店、自来水厂、伍尔沃思家的店、地方性报社、教堂和镇政府，取代了英雄时期留下来的监狱、酒吧和妓院。我又对她说，这一切她和我都认为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银幕中亲眼见到了。这是从中欧过来的犹太移民创造的神话，他们想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对美国的理想形象：它永远是个田园诗般的和平无辜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孩子们在街上骑着自行车分报，恋爱中的男女拉着手荡秋千。宇宙是个巨大的毛茸茸的物体，它的毛修剪得十分整齐；它几乎是无边的，它的边也许就是汤姆·索耶有一天漆的白色围墙。

一九八五年，我在马迪松大学工作。我的朋友开车送我去衣阿华时，我发现那神话是真的，尽管人们不可能知道，这座小城镇是不是模仿好莱坞，或者说，好莱坞比人们设想的还更具有真实性。法院主宰着杰弗逊城的生活。那是一幢新希

腊式的有飞檐的楼房，还有几座雕像。主要街道的样子完全在意料中，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建筑，有鞋铺、药房，还有一家肯德基炸鸡店，门口是那个随处可见的桑德斯上校塑像。另外，还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和一家酒吧。

“中学。你得给我说说中学的情况，”狄安娜曾经对我说过。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跟你说的这些毫不相干，你怎么想……”

年轻人常常在酒吧相聚喝啤酒。他们长得高大健壮，谈着那个星期六(我就在那天来到狄安娜的故乡)做的事情。他们出去捕猎浣熊，这是当地年轻人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这种食肉动物原来的产地就是美洲。阿尔贡金① 人对这种兽类有个很难记的叫法：阿罗乌切贡。浣熊的特性是昼伏夜出，毛皮是灰黄色的，尾巴上有若干个黑圈，耳朵小，直竖，前爪很像人的双手，纤细得像钢琴家的手。它的脸好像戴着威尼斯的黑色面具，仿佛戴上这“面具”，爬起树来，特别利索。浣熊几乎什么东西都能吃。进食前，先得洗一洗食物。浣熊在树洞里做窝。戴着“面具”的浣熊冬天睡的时间很长，但不冬眠。只需七十天就能生育五六只小浣熊。小浣熊十分可爱，非常调皮；到老了就像个孤独的老爷爷一样容易发怒。浣熊的食性很杂，蛋、玉米、瓜果，什么都吃。由于它损害庄稼，农民们都捕猎它。老浣熊脾气坏，善逃跑；小浣熊容易被捕猎。不过，不管老的，还是小的，一旦被圈在畜栏里，就会变得野性十足；到水里，浣熊十分可怕，会将对手拖入水中溺死。

衣阿华周围的丘陵地、山上和草地上都盛产浣熊。那里都是黑土，大片大片的牧草千百万年来一直在腐烂着，土地非常肥沃。年轻人做事，有时做一些有趣的事，有时做一些不愉快的事。在他们看来，数学太抽象，地理又太具体，而且，都讲一些与己无关的事。例如，墨西哥在什么地方呀，塞纳加尔和

---

① 北美土著居民中的一种。

满洲在什么地方呀，谁住在那里呀，这一切与自己有什么相干？难道这些地方还住人吗？什么“达戈斯”[1]人呀，“尼格尔斯”[2]人呀，你见到过这些人吗？相反，药房可是男女约会的地方，谈情说爱就从拿两根吸管同饮一罐樱桃可口可乐开始，就像安迪·哈迪导演的那些电影里见到的那样。接着，又在星期六晚上在电影院里继续，情侣们两只汗淋淋的手握在一起，同时，吃着爆玉米花，眼睛看着银幕上那一对男女。银幕上那一对男女也握着手，他们好像在想像着另外两个年轻人……

“他们在体育馆里打篮球，你得去看看。你很容易想像起他们，他们总是那个样，从不改变。”

历史课是最令人厌腻的了，总是说“从前”怎样怎样，就像永久的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全是死的，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活人，除非一切都被搬到银幕上，自己变成了克拉克·盖勃尔和费雯·利。这样才是历史，虽说都是谎言。现实可能只是一种幻象，每星期跟女朋友喝巧克力苏打水，上电影院去看更多的幻象。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将在那里结婚，在那里生活下去。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好小伙子，将来也都是好丈夫、好父亲。他们一般只和过去的已成年的女朋友结婚。过分的两性关系将导致性生活的终结，浪漫生活的死亡，就像月亮永远熄灭一样。

出去捕猎浣熊的那群年轻人显得激动万分。枪枝显然是他们阳刚之气的延伸。他们拿出枪来，擦得雪亮，装上子弹，让自己的伙伴们看，就像让他们看自己的生殖器一样。足球场更衣室那些暗示性的动作在用枪枝(在美国枪枝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因为在美国得到枪枝，携带枪枝是宪法规定的神圣权利)进行狩猎时，也是允许的……

“请你再回过头到中学校舍去一下吧……”

---

① 南欧人。

② 澳洲黑人。

那些猎狗像瞎了眼一样。耳朵虽大，但耷拉着，它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种感官上：嗅觉。它们又瞎又聋，身上全是扁虱。小伙子们打完猎，对着篝火边喝啤酒，边替猎狗捉扁虱取乐。

“这是一幢五十年代建造的楼房，现代化，但不高……”

又瞎又聋的猎狗有时失去了嗅的对象，就迷路了。这时，只要将主人的外套放在草地上，从不失误的猎狗就会回到主人的身边。这是真实的世界。这是美好的、确实的、具体的、能理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猎狗能回到主人放外套的地方。年轻人互相拥抱，纵声大笑，饮酒，在肋部胳肢，就像在进行淋浴时拿毛巾去打对方一样（他们竭力避免看对方的下身）。有枪就足够了。他们能互看对方的枪，也能触摸伙伴的枪。他们在一起，对着篝火剥去浣熊的皮。然后，带着血淋淋的胜利品和耳聋的猎狗回到了小镇。

“在楼房的一旁有个剧场，你一定要去看看……”

年轻人中，有一人与众不同。他觉得出去捕猎浣熊，剥浣熊的皮没有什么意义。过去，小伙子们常常穿浣熊皮大衣踢足球，现在已不穿了。过去，荒凉的西部猎人拿浣熊的毛皮做帽子，现在也不做了。过去这里有真正的男子汉。要成为真正的男子汉，需要学会在衣阿华打猎。当年那里只有野牛，现在没有了。

“那个年轻人送给我一枚五分硬币，硬币一面是只野牛，另一面是个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这枚硬币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对我说，要保存好，真是怪事。首先，野牛和印第安人消失了；接着，代表野牛和印第安人的那种硬币也不见了。眼下那种硬币一边是一位头戴假发的杰出的绅士，他是不能碰一碰的，是神圣的美国人托马斯·杰弗逊[①]；另一边是专门为他建造的家，在蒙的塞约。他是启蒙时期的人物。”

---

① 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九年期间任美国总统。

“最后的一只野牛是谁杀死的呢?”赠送硬币的那个年轻人问狄安娜。“当年这块土地上全是野牛,是谁呢?究竟是谁将最后一只野牛捕杀了?……”

在整个美国,电线杆全都是用金属制的,而这里还有木制的,仿佛没有木头的声音,电线不会说话似的。我在狄安娜的故乡度过的那个夜晚,是个黑洞洞的夜晚,心里在想念着她。我下榻的那个客房里,窗户敞开着。我觉得自己因天太黑,看不见东西,就像那些瞎眼的猎狗一样,只是没有猎狗那样的嗅觉。不过,这时我竖起了耳朵,竭力想在黑暗寂静中听到些什么。人们会议论她吗?会回想起她父亲当年送她上飞往洛杉矶的飞机的情景吗?那时节她是一个留着栗色长发的十七岁的小姑娘。人们还会想起她坐着一辆凯迪拉克敞篷汽车,裹着貂皮大衣回乡时的情形吗?只是她的头发已像士兵一样剪得很短,还像明星一样染成黄色了。她就这个样子在街上散步,走过主要街道。街道的两旁是药房、鞋铺、法院和中学校舍。

“你到剧院去,在那里等到月亮出来。我们等一会。你将会撩起我的裙子,再抚摸一下我的阴部。你将脱去我的短裤。月亮出来时,你就要取走我的童贞。”

她和别的女孩一样,是个不起眼的姑娘,只是那一双唯一的、无与伦比的灰色(也可能是蓝色的)眼睛与众不同。我不知道狄安娜那一双眼睛能不能永远地活下去,永远地注视着她父母和亲友们的眼睛?我看了一眼衣阿华一些老年人的眼睛,他们慈祥、单纯、返老还童的目光再次使我吃惊,尽管他们的头发已斑白似霜,脸上的皱纹就像公路(当年的野牛曾在建造公路的地方奔跑过)图一样。这些胡须像玉米须一样花白、柔软的老人当年就是那些残忍的、麻木不仁的、每星期六都出去捕杀浣熊的年轻人吗?他们就是那些嗜血成性、凶残地杀死最后一头野牛的人吗?

“现在这样很好,抱住我。当月光透过剧院的玻璃射进来后,你抱住我,卢克,就像第一次一样抱住我,让我像刚才一样

感到舒服，像刚才一样全身颤抖，我的爱，我的爱……”

那天夜里，月亮在衣阿华露脸时，我透过霍华兹·约翰逊旅社的窗子看到了它。我确信，卢克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已变成什么样的人，一定会以她的名义，用纸剪一轮明月，让人们将它悬挂在天上。这是她的纸月亮。

星期天早上，我就得离开衣阿华。天一亮，我就想起她曾请我一定得去教堂看看，听听布道。

我每次走进新教的教堂，总有些害怕，因为那不是我信仰的宗教① 的教堂。教堂内没有任何装饰品，只是清教式似的一片白色。只有像法利赛② 人的陵墓一样涂成白色，才能更好地将世界的罪过推给他人，推到与自己不同的人身上。没有装饰使上帝和信徒们享受不到巴罗克式的风采。我对这种虚假的做法感到害怕。

牧师走上讲道台。我笨拙地将他比作我认识的演员，例如：《莫比·狄克》中的奥尔逊·威尔士，《圣弗朗西斯戈》中的斯宾沙·特拉希，《圣玛利亚钟声》中的宾·克罗斯比和《钟声的奇迹》中的富兰克·西纳特拉。想起好莱坞喜欢奇思异想，竟然创造出拳击神父、歌手神父以及其他种种假想的角色，不由得暗自发笑。这个白头发、脸像斧劈一样的小个子男人几乎是一块人肉圣饼。他脸无血色，苍白得像上等面粉。我过了好一会才感到他那两只像黑色的弹子一样的眼睛内发出的炭火般的热。他的声音仿佛不是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的。慢慢地被他的话吸引住了，我开始相信，他的声音只是另一种遥远的、永久的声音的通道。那种声音在阐述路德宗教③ 的教义，要我们从根本上相信上帝，因为上帝为人类作辩护，上帝接受人类，因为人类相信，自己是可以被接受的，尽管他们具有不可接受性。人类怎么会相信，上帝会接受人类的全部罪

① 墨西哥人一般信奉天主教，而美国人一般信奉新教。
② 古代犹太教一个教派的成员。
③ 十六世纪欧洲进行了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成立了新教。

孽(这些罪孽即使最清白的人也都会隐藏在内心世界,或者像粪便一样排泄到外部物质世界)?具有信仰的人相信,由于上帝的恩典,自己会被接受,自己的罪行会以耶稣的名义得到宽宥。耶稣之死使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得到了宽恕。教会对这样的信念规定的代价是每个信徒都要完完全全地服从神灵的意志。这就要做到虔诚,而不能凭理性,理性只会导致绝望。要合理地理解上帝也会替不公正的人或事进行辩护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信徒们抱着《福音书》,心里明白:《福音书》里说,上帝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而不是根据信徒们的是非功过来为他们进行辩护的。"这就是你们在本星期天要完全加以理解的一点。你们应该明白,上帝宽恕你们,是因为上帝很公正,而不是你们很公正。你们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功绩可以让上帝原谅,就连原谅你们打死一只苍蝇,踩死一只蚂蚁也不可能。你们错误地认为,上帝是公正的。不,公正不是上帝的特点,而是上帝赐予的东西,是上帝恩赐之物。你们自己永远不可能给予自己公正,也不可能给予他人公正。即使你们本人很公正,不通过上帝,你们也不可能将公道给任何人。我下面说的话会亵渎神明:你们可以认为,上帝也像你们那样不公正;或者以为,你们自己也会像上帝一样公正。你们这样想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关系。你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给予公道,即使上帝自己并不公正。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你们权利,尽管上帝在创造你们的时候,已经违背了权利。亲爱的信徒们,你们应该具有这样的信念,应该有勇气了解上帝的真理:正义和公道是上帝给的,不是自行产生的,也不是相互给予的。人类本不应该得到公道,公道是上帝决定给予的时候赐给我们的。但是,上帝自己也不公正。上帝只有权力,只有宽恕的权力,尽管上帝自己也不值得宽恕。他怎么能得到宽恕呢,如果他自己也犯了错误,创造了这么一些贪婪好色的人,创造了这么一些杀人放火的罪犯、忘恩负义之徒、蠢人和自我毁灭的人?我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而创造这样的人,上帝不也有责任吗?你们要永远记住这一点,我的兄弟姐

妹们，你们应该有勇气带着我们这种不可能的却又很严格的信仰生活下去。你们应该想一想自己不值得宽恕，却又有权利宽恕我们的上帝。不要失望，要等待，要有信心。”

布完道，神父微笑了一下，又纵声大笑。他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免得发出声来。

听完弥撒后，我在狄安娜·索伦出生和成长的杰弗逊城各个街道跑了一遍。白头发、蓝眼睛的老人们坐在门廊下摇晃着身躯。他们的目光显得很天真，天真得既不关心地理，也不关心历史。他们是那样单纯，甚至都不想知道政府领导人在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住着“达戈斯人”、“尼格尔斯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地方究竟干了些什么。一双双无辜的眼睛，夜晚来临后，便注视着悬挂在衣阿华这个小镇上空的那个纸月亮。他们给托马斯·杰弗逊写空白委任状，因为他是白人，是高雅的人，尽管他拥有奴隶。他比他们这些人加在一起还聪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选他当总统。“每次我们只选一个总统，我们应该相信他，将他的头像刻在山上，刻印在钱币上，将两边分别是印第安人像和野牛图的钱币抛向天空，看看它们会落到什么地方。大地是广阔无边的，像奴隶一样是黑色的，像共产党人一样霉烂，像墨西哥人一样潮湿；大地在继续长大，在结果，在腐烂。千百年来大地一直在腐烂。”

那是她的纸月亮，就是她成为成年女性的神秘的一天见到的那一个，这是在狄安娜，衣阿华这块黑色的、腐烂的土地上的孤寂的女猎手，手执一支箭和一张弓离开之前。那是她的纸月亮，就是照亮了野牛最终全部被捕杀的那个夜晚的那一轮明月。那时，年轻人骑着马，在夜里开枪射击，一直射到月亮熄灭。就是这个月亮，照亮了怒气冲冲地朝树洞巢穴奔去的那些浣熊，因为它们受到了杀死草原上最后一头野牛的那些年轻人的追逐。他们带着猎狗集体行猎。高叫着在月光的照耀下，胜利地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枪。而她呢，只是孤单单地行猎，她希望月光也同样地照到自己身上，希望任性的、由于创造了她而负有罪责的上帝同情之光也照到她身上。

我可以肯定，那神父是想到了这一切才笑的。他原本想哈哈大笑，以便让自己舒服一些，摆脱自身的烦恼。但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那天夜里，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东部开始上涨，又从密苏里州向西部上涨。它的每个支流的水也向堤外溢出，不但将衣阿华的土地全部淹没，而且，从奥塞俄拉到波塔摩托米埃，从维纳巴戈到阿帕诺斯那一带土地也淹了。大水冲走了带着泥浆的房屋、马车、木制电线杆、新希腊式的柱子、已经成熟的麦子、像独眼巨人的眼睛那么大的土豆和长着像旗帜一样鸡冠的公鸡，将野牛的踪迹冲去，将那些绝望的浣熊淹死。大水使被淹没的草原沉沉入睡，以使它重新回到了印第安人国家原来的名字，衣阿华：沉睡的国家，却又受到白人国家这个反义词的监视；衣阿华：鹰隼的眼睛。这是个时而懒洋洋地想睡觉，时而又很警觉的国家。土地向下沉，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谁也不能回去了。

三十七

狄安娜·索伦死了。人们在巴黎一条小巷子里的一辆雷诺车中发现她已腐烂的尸体。她的尸体在那里已两个星期。她身上裹着萨尔蒂约制造的毛料披风。这是不是当年在圣地亚哥跟我一起去买的那一件呢？报上说，她身边只有一只空的矿泉水瓶子和一本有关自杀的书。巴黎警察局不得不打电话给防疫站，让防疫站派人给发现狄安娜与死神关在一起达两个星期的躯体的那条小巷子消毒。她的遗物全都让香烟烧成一个个小洞。我问自己，不知她死了后，是不是会感到舒服一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
作者＝富恩特斯 Ｆｕｅｎｔｅｓ
页数＝１９１
ＳＳ号＝１０６７０５１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年